班台莱耶夫著

表

附《文件》





表

附《文件》

〔苏联〕班台莱耶夫著

王　汶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目　　次

前　言……………………………………………………………… *1*

表………………………………………………………………………… *1*
文　件……………………………………………………………… *123*

前　　言

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非常关心祖国少年儿童的成长，即使在极为紧张、繁忙的战斗岁月里，他也没有忘记给孩子们寻找精神食粮。《表》就是鲁迅先生选中的一本优秀的儿童读物。他克服了许多困难，从德译本（并参考日译本）转译了这篇小说，使中国广大读者得到了很大的益处。

连卡·班台莱耶夫于一九〇八年出生在俄国彼得堡一个旧教徒家庭里。他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木材商。他的父亲当过军官，后又改行经商。由于不满现状，他开始酗酒胡闹，性情日益暴躁。这使得连卡·班台莱耶夫的母亲痛苦异常。连卡·班台莱耶夫的童年就是在这种沉闷而不幸的家庭中度过的。

连卡·班台莱耶夫八岁时，他的父亲不幸死在外地，母亲体弱多病，以教书为职业，抚养他们兄妹三人。十月革命前后，母亲带着他们兄妹辗转各

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在十三岁那年，竟与母亲失散，流落街头，和小偷、流氓、骗子及其他流浪儿打了几年交道，自己也参与了盗窃诈骗的活动，并且一心幻想当个职业强盗。

后来，他被送进苏维埃政府所办的少年教养院和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社会劳教学校。他在那个学校里呆了三年，终于被培养成为一个身心健康的新人。

连卡·班台莱耶夫从小喜欢读文学作品。他四岁时，就主动要求成年人教他识字。他学会看书后，便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所能弄到的一切文学作品。八岁时，他已经读完了他母亲的全部藏书，包括莫泊桑的小说和俄罗斯古典文学名著。

他离开社会劳教学校后，学过放映电影，当过皮鞋匠、小厨子和图书馆管理员，最后成为一个作家。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连卡·班台莱耶夫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短篇的特写、小品文和电影评论等。

后来，他又决定跟他的同学格·别雷赫合写一本书，描述社会劳教学校的生活。书写成后，他们

将手稿交给一位“权威”，但没有受到重视。这位“权威”怀疑地问道:“你们这两个小孩子想干什么?你们写了一本书？”

连卡·班台莱耶夫和别雷赫感到很难为情，丢下手稿就走了，事后连问也不敢再去问一声。想不到几个月后，他们的作品要出版了。出版社在彼得堡到处寻找这两位年轻的作者。原来手稿到了儿童读物作家马尔夏克（1887—1964）手里。马尔夏克立刻转交给高尔基审阅。

他们的这部作品就叫《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劳教共和国》。此后，连卡·班台莱耶夫还写过自传体的中篇小说《连卡·班台莱耶夫》、短篇小说、童话以及与高尔基会面的回忆录等。短篇小说的内容有歌颂苏联英雄的，有刻划勇敢、坚定、沉着、能干的革命少年的，有描写流浪儿在苏维埃政府的关怀和教育下的转变的，等等。

《表》是连卡·班台莱耶夫的早期作品之一。作者以明朗、有趣、活泼、简洁的文笔，描写一个失去双亲、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彼奇卡，他为饥饿所迫，当了小偷，趁机骗取了一个醉汉的金表。小说以这块金表为线索，描述了彼奇卡从偷表到自觉还

表的生动曲折的过程。作者深入而细腻地刻划了彼奇卡特有的儿童心理，使人感到真实可信。

《文件》写一位少年红军战士在被白匪俘虏的险恶境况下，勇敢机智地逃出了敌人的魔掌，并及时把一项重要文件中的军事机密向上级机关作了报告。

这两篇小说都是根据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的班台莱耶夫《中短篇小说选》翻译的。插图据苏联儿童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表》单行本复制，系波德利亚斯卡娅所作。

译　者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于天津

表

彼奇卡[1]·瓦列特出事儿啦。

有一天，彼奇卡在市场上闲逛，一路胡思乱想。彼奇卡又懊恼，又伤心，——他肚子饿了，可是连买几个香肠头儿的钱都没有。

也没处弄去。

肚子可饿极了。

彼奇卡试了试去偷一个秤砣。人家没让他偷成功，反倒用秤砣照他后脑勺轻轻敲了一下子。

彼奇卡只好往前走去。

他试了试去偷一只桶。桶也没偷成。只好撇下桶，又往前走。

忽然他看见一位乡下大娘。这位浑圆滚胖的乡下大娘站在大街拐角上卖小面包。她罗筐里的小面

① 正式名字是彼得，彼奇卡（以及后文的彼恰）是他的小名。——译者。

包，个个烤得皮儿焦黄，热气腾腾地直冒烟儿。

彼奇卡简直发抖了，走到跟前去。其实他也没干什么特别事儿，只不过拿起一个小面包，闻了闻，然后放在衣袋里。他连句气人的话都没向乡下大娘说，转过身，就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可是胖大娘追了过来，大喊大叫，一把抓住彼奇卡的肩膀，嚷道：

“小偷！把面包还给我！”

“什么面包呀？”彼奇卡问了一句，又继续往前走。

这时候已经围上一大群人。一个人掐住彼奇卡的脖子；另一个人用膝盖从后面朝他一顶，把他拱倒在地上，毒打一顿。接着，这群人把彼奇卡拉到警察局去，交给市场的巡查队。

拉到了以后，就去见队长，说：

“是这么，这么一回事儿。您见见他吧：一个小扒手。偷了一个小面包。”

队长没有工夫，他没见彼奇卡，只吩咐把彼奇卡关在禁闭室里。

于是，把彼奇卡往禁闭室里一塞，说：

“老老实实在这儿呆着！”



在禁闭室里，彼奇卡坐在一条又脏又破的板凳上，一动也不动，两眼望着窗户。窗户上有栅栏。栅栏外面是天空。天空是那样的晴朗，明净，蓝得象水兵的衣服领子。

彼奇卡瞅着天空，满脑子都是些不高兴的想法。不愉快极了。

“唉，”彼奇卡心想，“这辈子真倒霉，我这个流浪汉又落网了。情况很不妙。为了那么个小面包。”

心里实在不愉快。要是一个人从前天起，就没闻见过面包的味儿，能愉快得了么？蹲在监牢里熬时间，能愉快得了么？傻坐在这儿欣赏天空，有意思么？如果为了什么正事，倒也罢了，可是——呸！只不过为了一个小面包。

彼奇卡心里当然不好受。他眯缝起两只眼睛，决定听天由命。刚下定决心，忽然听见有人在敲什么。还敲得挺响。不是敲门，是敲墙，敲木头隔板。

彼奇卡站了起来，睁大眼睛，竖起耳朵仔细听。

肯定是有人用拳头捶隔板，想砸破它。

彼奇卡走到墙跟前，趴在墙缝上看。他看见石头墙壁、一条板凳、带栅栏的窗户。地上扔着一些烟

头。连个人影儿也没有。空荡荡的。他怎么也不明白，敲墙的声音是打哪儿传来的。

“是什么鬼在这儿敲呢？”彼奇卡想道。“也许在钉钉子？再不然是打臭虫？……”

他正这么想的时候，听见一阵低低的大粗嗓音。是一个人正粗声粗气、含胡不清地在屋角里喊叫：

“救救我吧！妈妈呀！”

彼奇卡奔到屋角里的炉子旁边。炉子附近有一条板缝。彼奇卡看见从板缝里伸出一个鼻子，鼻子底下一翘一翘的是胡子。一只乌黑的斜眼睛悲伤地向彼奇卡望着。

“妈妈呀！”大粗嗓子哼哼唧唧地嚷着。“心肝宝贝儿！看上帝面上，放我出去吧！”

那只眼睛象只蟑螂似的，在缝里爬来爬去。

“这怪物是干什么的呀？”彼奇卡心里想。“是疯子？还是醉鬼？准是喝醉了，——多大的酒味儿……呸！”

酒味儿还真冲鼻子。满屋里都是酒味儿，谁知道是自酿的酒，还是伏特加酒，反正挺强烈的。

“妈妈呀！”那个醉汉呜呜地叫唤着。“妈妈呀！”

彼奇卡站在那儿看着。他一点也不高兴跟喝醉

了的人说话。要在别的时候，他准得跟他搭上腔，可是这会儿，心里怪腻味的。他只说了一句：

“你嚷什么？”

“放我出去吧，心肝！”醉汉说，“放我出去吧，宝贝儿！”

他忽然尖声怪叫起来：

“大人呀，同志先生呀！放我出去吧！我的孩子们等着我呐！”

彼奇卡觉得可笑极了。

“傻瓜，”他说，“我自己也跟你一样，叫人关起来了，我怎么放你出去呢？你脑子清楚么？”

这时候，彼奇卡忽然看见那个醉汉把手从板缝里伸过来了。他那只手上长了许多瘊子的手掌，托着一只表，一只金表。真正的金表。还带表链子。表链子上有各式各样的小玩艺儿和里里拉拉垂挂着的装饰物。

醉汉的那只斜眼睛一翻一翻的。他压低声音说：

“首长同志！您放我出去，我就把这只表送给您。您瞧，多好的表……滴答滴答地响呢……”

真的，表在滴答嘀答地响。

彼奇卡的心也跟着滴答滴答地响。

彼奇卡把表一把抓了过来，跑到墙角的窗口那儿。他快活得气也喘不上来了，血忽地涌到小脑瓜里来了。

醉汉却挥起那只手，放声大叫。

他大叫一声：

“救命呀！”

他跺着脚，口齿不清地狂喊乱叫起来：

“救命呀！抢人啦！抢人啦！”

彼奇卡吓坏了，拔腿就跑。血一下子又流回到彼奇卡的脚里来了。他用手指头急急忙忙地抓着表链子，抓得表链子上各式各样的小玩艺儿一阵乱晃，垂挂着的装饰物一阵叮当乱响。有这样那样的小象、小狗、小马蹄掌，还有一块形状象梨的绿莹莹的绿宝石。

彼奇卡将表链子连同所有的乱七八糟没用的玩艺儿一起揪下来，塞给醉汉。

“给你！”他说，“请拿去吧！”

这时候醉汉已经醉糊涂了，他把表给忘了，收下表链子。

“谢谢！”他说。“谢谢，心肝宝贝儿！……”

他说着，还把手从板缝里伸过来，想抚摸一下彼奇卡。又把嘴唇从板缝里噘过来，象只小猪似地啧啧地发出亲嘴的声音:

“妈——妈呀!”

彼奇卡又跑到窗口。血又忽地涌到小脑袋瓜里来了。脑袋里嗡嗡的直响。

“嘿，”彼奇卡想道，“真走运!”

他放开拳头，看看那只表。栅栏外面，晴朗的天空上出太阳了。金表在彼奇卡手里闪闪放光。他朝表呵了一口气，金子就变浑浊了。用破袖子一擦，它又闪闪放光了。彼奇卡也容光焕发了。

“聪明人说得对，”他心想，“可以因祸得福。我得到了这样一件东西。这东西，随便哪个旧货店都能出五十个卢布收购。什么五十个卢布呀……还要多！……”

彼奇卡的头都发昏了。他开始幻想。

“头一件事，”他心想，“我得买个白面包。一个顶大的白面包。再买点猪油。白面包夹猪油吃；还喝可可茶。然后买一整根香肠。买点上等香烟。再买几件衣裳……肥裤脚的裤子、上衣、带条纹的汗衫……半高腰皮鞋。咳！光在这儿想有什么用，现

在我得想法逃出去，别的就……”

一切都很好。只有一件事情太糟糕——彼奇卡是被拘留着。他蹲在禁闭室里，就象罐子里的老鼠一样：窗户上有栅栏，门反锁着。幸福在他手里，可惜人逃不出去。小伙子简直被人焊住动不了啦。

“唉，”彼奇卡心想，“怎么都好。管他呢，好歹熬到晚上再说……反正死不了。到晚上，市场一收摊儿，他们就会放我出去的。”

晚上就会放他出去，这彼奇卡是知道的。不是头一回了。以前也出过事儿。不过，还得等多久，才能熬到晚上啊！太阳还在天上游荡呢。

他最后又看了一眼那只表，然后把它藏在破破烂烂的衣袋里。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把衣袋挽成个结，才算放心了。

隔板那边，没有人嚷，也没有人敲墙了。门锁喀答一响，彼奇卡连眼睛都没来得及眨巴一下，禁闭室的门就打开了，一个皮肤黝黑、头发卷曲的年轻警察走了进来，对他说：

“喂，公民，请你出去吧！”

彼奇卡高兴极了，高兴得甚至有些惊慌失措。他一跃而起。提了提裤子。赶紧走出禁闭室，卷头发警

察在外面跟着。

“公民，”他说，“去见队长。”

“好……”

彼奇卡去见队长。队长坐在一张绿色的桌子后面，手里拿着一张公文，摆弄着玩。他身上的军便服敞着怀儿，脖子红红的，直冒热气。队长在抽烟卷，朝天花板喷着烟圈儿。

“你好哇，”他说，“小扒手。”

“你好。”彼奇卡回答。

他规规矩矩地站在那儿，老老实实的。笑容满面、毫无恶意地望着队长。队长还在喷烟圈儿，一边看文件。

“好公民，”他说道，“你说说，你是哪一年生的？”

“我不知道是哪一年生的，”彼奇卡回答。“反正我十一岁。”

“那么请你说说，你是第几次到我这儿来作客人了？好象是第七次吧？”

“不对，”彼奇卡回答，“好象才第五次。”

“你没说瞎话吗？”

“也可能说瞎话……我不知道。您比我清楚。”

彼奇卡不想争论。跟队长争论，是自找倒霉。第

七次就第七次吧。计较这个有什么用处?

他心想:“不争论,还少耽误点时间。可以快点放我出去。”

队长把文件放在桌子上,用手“啪”地把它一合,说道:

“我的判决是这样的:原谅你年幼无知,送你到少年教养院去。懂了吗?”

彼奇卡惊叫一声,身子一阵摇晃,手脚都麻了。队长的话好象用砖头在彼奇卡的脑壳子上敲了一下似的,把他打昏了。他没想到会跟他说这种话,完全没预料到。

不过他立刻清醒过来,抬起头,说道:

“好吧,可以……”

“你同意了?”队长问道。他还是笑嘻嘻的,仿佛不明白彼奇卡心里有多难过,多伤心,不明白彼奇卡实在笑不出来了,不明白彼奇卡有多么想哭。

唉呀,彼奇卡,彼奇卡,你真叫不走运呀,彼恰·瓦列特!

哪知还有更糟的事情。这回他才倒霉啦。彼奇卡可完蛋啦。

队长把卷头发警察叫过去,命令他将彼奇卡从

头到脚搜一遍。

“搜他一下，”他说，“从头到脚搜搜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凶器或是值钱的东西。正式搜。”

卷头发警察朝彼奇卡走过来了。彼奇卡连心脏都好象停止了跳动，彼奇卡的两条腿象肉冻似地颤颤地发抖。

彼奇卡心想：“值钱的东西呀，永别了！”

但是彼奇卡很侥幸，那个卷头发警察古怪得很，有洁癖。他打量了一下彼奇卡，说：

“队长同志，用手碰这种囚徒，真叫人恶心。劳您驾，免了吧……今天我刚洗过蒸汽浴。新换的衣裳。再说，他身上能有什么东西呢？顶多衣袋里有个虱子，裤腰带上有个跳蚤……不会更多了……”

彼奇卡聚集起最后一点力气，咧嘴苦笑着，眨巴着眼睛，意思说：

“对，您猜的对。”

心里可在想：

“这种跳蚤可真不错。他还以为是跳蚤呢，这么想才好！”

他悄悄地用一个手指头摸摸衣袋。衣袋里有件东西在蹦，在不紧不慢地跳，活象衣袋里有一颗心，

或者有一条活鱼似的。那只表在衣袋里。

也许队长可怜那个警察，也许他觉得无聊了，总之，他只挥了一下手，说：

“好吧。可以取消这个命令。不搜也行。这无关紧要。”

他往公文上写了点什么，盖上图章，交给那个警察。

“给你，”他说，“亲爱的同志，这是公函。你带着公函，到威津大街，把这孩子送到克拉拉·蔡特金少年教养院去。要个回条。”

队长站起身来，打了个呵欠，从屋里走了出去。

队长连跟彼奇卡说声再见都忘了。

卷头发警察把公函塞在文件夹里，叹了口气，将手枪挂在肚子上，又叹了口气，然后戴上帽子。

“得了，”他说，“倒霉孩子，咱们走吧！”

彼奇卡提提裤子，就走了。

他们径直穿过市场，从拥挤的人堆里挤过去。市场上不用说是闹哄哄的……人来人往，吆吆喝喝。有的人在笑，有的人在骂，有的人在唱。什么地方在呜呜地拉手风琴。还有几只鹅在嘎嘎地叫唤。一片嘈杂。只有彼奇卡听不见嘈杂声。彼奇卡心里在打

主意。

他想："我必须逃走!"

他象小狗似的快步穿过市场，一路碰撞着买卖人和闲人，眼睛四面扫视着，不断地想，不断地琢磨：

"一定得跑掉……无论如何得跑掉!"

不过，卷头发警察象尾巴似的在后面跟牢了他，怎么跑得掉呢。卷头发警察一步也不拉地在后面追着，呼哧呼哧直喘气，眼睛死盯住彼奇卡不放。

市场已经留在后面了，彼奇卡也没能够跑掉。

彼奇卡心烦意乱了。他垂头丧气的，步子也慢了下来。

这时卷头发警察追上了彼奇卡。

卷头发警察脚都站不稳了，他哼哼着说：

"唉呀！小土匪，你把我累坏了。怎么能这样跑呢？我可不能这么跑，我的肾脏有毛病。"

彼奇卡一声也不吭，不回答。他才不管警察的肾脏怎么样呢！彼奇卡这会儿顾不上什么肾脏不肾脏，他愁得要命，无精打采地只管自己走着。

警察好容易喘过一口气儿，把步子稳了下来，忽然问了一句。

“你这个小流氓，你凭良心说说，刚才在市场上，你是不是想从我手里开溜？”

彼奇卡打了个哆嗦，抬起头。

“开溜是什么意思呀？”他问道。“这种话我都听不懂。”

“算了吧……别胡扯……你太懂了。刚才你是想逃走吧？”

“逃走？”彼奇卡笑了。

“您想错了，”他说，“我觉得逃走一点意义也没有。就是您逼我逃走，我也不会逃走的……”

“真的？”卷头发警察感到很奇怪，说：“你真的不想逃走？”

他忽然站住了，向四面张望一番，搔搔眉毛，忽然举起文件夹来一挥，说：

“好，跑吧……”

彼奇卡本想拔腿就跑，本能地想拔腿就跑。好象有谁用膝头从后面顶了他一下似的，他浑身一哆嗦。他刚想跑，幸而及时地瞥了卷头发警察一眼，只见他在笑。

“原来如此呀，”他想，“你想设个圈套试试我么？唉，不成的，老哥……这种把戏我们是就知道了，你

骗不了我的!”

他冷笑着，一本正经地说:

“您干吗说这种伤感情的话呀。反正我是不会跑掉的。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跑。我根本不想这样做。”

“为什么呢? ”警察问道。

他不笑了，仔细地打量着彼奇卡。彼奇卡却扯开喉咙嚷道:

“因为,您没有权利逼我跑。您想把我摆脱掉吗? 您摆脱不掉我的。照规矩，您该把我带到哪儿去，就带到哪儿去吧，要不然我就去告您。”

彼奇卡说完，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在说什么呀? !”他心想:“我这个流浪汉，一定是糊涂了……”

但是显然警察发慌了，样子很狼狈，摆着两只手说:

“你怎么啦，我哪儿是认真跟你说这话! ……咱们走吧，我跟你开了个玩笑。”

“我知道这种玩笑是什么样的。”彼奇卡说。“这不是闹着玩儿的。您怂恿我跑掉。对吧? 您懒得把一个人送到少年教养院去。对吧? 这是开玩笑吗? 您

没有权利开这样的玩笑。”

彼奇卡越说越来劲儿。嘴里嚷嚷着，还指手划脚地。连打他们身边走过的行人都惊讶起来。这叫什么怪事？一个棕黄色头发的小毛孩子站在大街当中，敞开嗓门儿大嚷大叫地骂人，旁边站着一个警察，局促不安地，满脸通红地光眨巴眼睛，夹在胳肢窝底下的文件夹一个劲儿发抖。

卷头发警察求彼奇卡别嚷了。他请彼奇卡安安静静地往前走。

“咱们走吧，”他说，“请你往前走吧！”

彼奇卡装疯卖傻地闹了一会儿，又接着往前走。

彼奇卡头也不回地走着，皱着眉头，噘着嘴，自己却觉得好笑，心里偷偷地笑。

“真高明！”他心想，“我吓唬他吓唬得真高明。唉！你这个卷毛儿警察呀！”

卷头发警察可能吓坏了，连步子都迈不动了，勉勉强强才追上彼奇卡。他一声也不响，什么话也不说了，光叹气，不停地擦脸上的汗。彼奇卡还拿他寻开心，催他快点走。

“您怎么走得那么慢呀？”他说，“您是在散步吗？

您不能快一点走吗？”

“我不能，”警察回答，“真的不能。我的肾脏不好。我的肾脏有毛病，怕热。你明白吗？我今天还在澡堂子里洗了蒸汽浴。所以现在我简直觉得口渴得要命。”

说到这里，卷头发警察忽然看见一家茶馆，叫作什么“米兰”的。门口有台阶，还挂着一个花花绿绿的大招牌。

警察停住脚步，说：

“唉，请你进去一下，咱们喝点什么。”

“不进去，”彼奇卡说，“用不着进去。”

“用得着。真的用得着。我心里火烧火燎似的，特别想喝水。在这儿可以喝点矿泉水，或者喝点茶，再不然喝点克瓦斯①。亲爱的小流氓，劳驾劳驾，咱们进去一下吧？！”

彼奇卡想了想，一挥手，说：

“好。您进去吧。不过时间别太长了。”

“你呢？”

“我呀，”彼奇卡说，“我不进去。我不习惯串茶

① 一种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译者。

馆饭店……您一个人进去吧。”

卷头发警察为难起来，犹犹豫豫地说：

“你不会溜掉么？”

“您又来这一套啦？！”

彼奇卡发怒了，说：

“您又来教唆我啦？对吧？……既然这样，那您什么也不用说了，把我一直拖到少年教养院去吧。明白了吗？什么茶也不用喝了！……”

“得了，得了，”卷头发警察说，“别生气。我不过是这么说说，以防万一罢了。我知道你不会跑的。你是个懂事的小伙子。”

“好吧，”彼奇卡说，“我没工夫跟您多罗嗦。别说废话了，您进去吧。”

你们猜怎么着？卷头发警察还真进去了，他把彼奇卡留在大门外，自己进“米兰”茶馆里喝茶去了。

彼奇卡望着他的背影，脸上露出讥讽的笑容。

他笑了笑，一句废话也没说，一溜烟儿就逃走了。

彼奇卡拐了个弯儿，就跑了起来。他飞也似地

跑。活象插了翅膀、装了螺旋桨似地跑。跑得扬起了波浪般的尘土。跑得心怦怦乱跳。跑得风把脸刮得生疼。

彼奇卡不停地跑呀，跑呀。只见房屋、围墙、小巷迎面跑过来。电线杆子闪了过去。还有人啊……山羊啊……母牛啊。

彼奇卡拚命地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跑了多久？——他不知道。往哪儿跑？——他也不知道。总之，跑到市郊的什么地方才停下来，恰好在一所教堂旁边。

他站住，休息了一会儿，才清醒过来。他打量一下周围，自己都不相信："难道说我真跑掉了？"

他这回可高兴了，开心极了，他又想撒开腿跑。因为心里很快活。

他想道："我自由了！……我这个流浪汉自由了！！"突然心里更加高兴起来。他想起了那只表："唉呀，我的表呀，表呀，你在哪儿啊？"他把手伸进衣袋……我的妈呀！表没有了。找这儿，找那儿，哪儿也找不着表。表丢了。这可怎么办？

彼奇卡又把手伸进衣袋里去找。再仔细一看——连衣袋也没有了。本来衣袋就已经很不牢靠，

可能因为放了重东西，所以索性整个脱落了。望了望周围——哪儿也没有。抖落抖落裤子，裤子里也没有。

彼奇卡懊恼得不行，灰心丧气地靠在教堂的围墙上，差一点哭出来。

“唉，活见鬼！怎么这么倒霉！”

在这个世界上，彼奇卡太不走运了。

但是彼奇卡没有哭。不能哭。彼奇卡知道：流眼泪是女人干的事情。一个体面的男孩子是不应该哭的。既然表丢了，就应该找。

于是他又往回跑。

往回跑也没有什么用，——他把路忘记了，不知道是打哪儿跑来的。他刚才只顾直着眼睛跑，迷路了……得找个人问问。

一个大高个儿棒小伙子站在一家大门口，五大三粗的，身穿大兵的军马裤，正在嗑瓜子。彼奇卡向他走过去，叫道：

“叔叔，叔叔！”

“什么事？”大高个儿说。

“叔叔，您知道‘米兰’茶馆在哪儿吗？”

“不，”大高个儿说，“不知道。哪一家‘米兰’呀？”

“就是那家。有个招牌的。”

“有招牌的？那我知道。”

“在哪儿？”

“你问这干什么？”

“需要知道……叔叔，请您告诉我吧。”

“好。那你听着：一直往前走。明白吗？然后向左拐。明白吗？然后向右拐。明白吗？然后再一直走。然后往这边拐。再往那边拐。一直走下去，走到为止。明白吗？”

彼奇卡一点也不明白。

“怎么走？”他问道，“怎么走？向右拐，向左拐，然后呢？”

彼奇卡看了大高个儿一眼，马上就明白了，心想：

“这个没皮没脸的坏家伙，拿我要着玩儿呐！”

彼奇卡生气了，肝火往上撞。他照准那个大高个儿的手就是一巴掌，打得大高个儿手里的瓜子统统见鬼去了。彼奇卡撒丫子就跑。

他跑着，跑着，自己也不知道是往哪儿跑。跑过了一些大街和小巷，还跑过了一座桥。又往回跑。

他忽然跑到一条小街上，瞧见一道围墙上有个

窟窿，于是他忽然想起，他刚才是从这儿跑过的。他记得墙上的这个窟窿。

彼奇卡一边走，一边看脚底下，找那只表。不屈不挠地找。车轮压出的小沟、坑坑洼洼的地上和沟渠里，全找遍了……可是找不着！哪儿也没有。彼奇卡的表一定被谁给捡走了。

彼奇卡连站都站不稳了。他两眼发楞，好容易才慢慢地走到“米兰”茶馆，一屁股坐在茶馆门前的台阶上。他坐在台阶上，低着头，简直不想活了。

彼奇卡象个树墩子似的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满脸凶神恶煞的样子，眉头皱成个大疙瘩，用恶狠狠的眼光凝视着地面。

忽然间——这是什么呀?

彼奇卡弯下身子去。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这是什么呀?

这不就是装着表的那个打了结的袋子嘛！就躺在台阶旁边。真的，真躺在这里。它乖乖地躺在这里。

彼奇卡浑身发抖，一把抓住这个袋子。他刚把袋子抓在手里，卷头发警察从茶馆里出来了。

“你坐在这儿呐？”他说。

彼奇卡吓了一跳。

“我坐在这儿呐。”他说着赶紧把表藏起来。藏到原来衣袋开口的那个破洞里。

“好样儿的，”卷头发警察说，“你老老实实地等我，真好样儿的。我很器重你这样说话算话。我没想到你有这么诚实。”

卷头发警察拿出一块有点烤焦了的甜馅饼，递给彼奇卡。

“给你，”他说，“因为你这样自觉，我给你买了一块甜馅饼。请拿着吧。我特地为你花了十戈比。诚心诚意地。”

彼奇卡把点心接过来，闻了闻，三口两口就吞下了肚，立刻觉得自己恢复了元气。

“好吧，”他说，“甜馅饼归甜馅饼。可是您为什么喝茶喝了这么半天呢？嗯？我可不是您雇来，专为了几个钟头几个钟头等您的。”

“好了，”卷头发警察说，“别生气。我一共只不过喝了六杯茶，吃了一个白面包。现在总算走得动了。请呀，走吧，可爱的小流氓。”

彼奇卡提了提裤子，向前走去。

他们走得很快，精神饱满，特别是卷头发警察。

这回快得跟跑差不多了，也不去理会他的肾脏了。彼奇卡偷偷把表塞进了一个什么地方，可能是塞在一个补丁缝里……他不再发愁了。彼奇卡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知愁。

“反正一样，”他心想，“没有关系。在这儿失败了，在那儿还可以成功呢。到了少年教养院，再跑吧！”

他们走到宽阔的威津大街上。这条街有个很陡的上坡道。

卷头发警察用一个手指头指着说：

“山坡上有一所房子，瞧见了吗？白房子。绿房顶。那所有绿房顶的房子，就是克拉拉·蔡特金少年教养院。总算到地方了。谢天谢地……”

真的，房子是白色的，房顶是绿的。房顶上还有烟囱。各式各样的窗户都带护窗板。甚至还有个小花园。小花园里有几棵布满尘土的杨树。

还有个院子。石头围墙。一个便门……

卷头发警察敲敲便门。围墙里有只狗汪汪叫了起来，铁链子希里哗啦地响。

彼奇卡心里一阵难过。他叹了一口气。



“这是少年教养院么？”他心想。“这少年教养院可真不错。简直象座监牢……到处都锁着。从这儿大概跑不掉了。”

便门上打开了一个小窗——那是个监视孔。一个人从小窗里往外看。两只吊眼梢。不是鞑靼人，就是中国人，再不然就是蒙古人。

“谁呀？”他问道。“谁敲门？”

“开门。”卷头发警察说。“别害怕。没什么特别事儿。我送来了一个小扒手。”

小窗砰地一声关上了。只听得钥匙在孔眼里转动的声音。便门开了，原来吊眼梢是个俄国人……

“您好。”他说。“欢迎欢迎。请进来吧。”

他们走了进去。狗一下子扑了过来。这个坏家伙，一个劲儿叫唤，还咆哮着。

吊眼梢朝它大喝一声：

“回去，‘王爷’！”

“请进去吧，”他说，“请到办公室里去见院长。上楼梯，到二楼。”

他们穿过院子。卷头发警察立刻摆出一副大模大样的神气，扶正了手枪，迈开军人的步子，一、二，左、右、左！

彼奇卡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院子很大，边上铺着碎石；碎石缝里长着荨麻、牛蒡和形形色色不象样子的杂草。

许多孩子在敞开的窗口向外张望，都在仔细看彼奇卡。

彼奇卡听见有人说：

“同学们，带了一个大人物来了。”

“什么大人物？”彼奇卡心里想，“我算个什么大人物？”

他们走上楼梯，到了办公室。一个身材瘦小、黑头发黑皮肤的黑小子坐在办公室里地板上，正用毛笔在很大的一张纸上画一个红五角星。

“你好！”卷头发警察说。

“您好！”黑小子面容严肃地用低音回答。“您找院长么？”

“找院长。”卷头发警察说。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有人找您……”黑小子嚷道，自己却把彼奇卡从头到脚打量着，脸上还露出讥讽的微笑。

院长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从隔壁屋子里走了出来，他有点秃顶，头发斑白，戴眼镜。

“好吧。”他说。“您好。送了一个新的来吗？”

“一个新的。”卷头发警察回答。“您好。请收下吧，给个回条。”

“要回条？好吧……给您。好吧……您可以走了。”

卷头发警察把回条接过去，看了一下。

“再见，”他说，“再见，小流氓。”

卷头发警察走了。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在桌前坐下，打量着彼奇卡。

“你叫彼得？”

“叫彼得。”彼奇卡回答，还告诉了他自己姓什么。

“好吧。”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说。接着又问：

“你是个小偷？”

彼奇卡脸红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脸红。这个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真怪。

“小偷。”彼奇卡回答。

“好吧……”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说，“这没有关系。这种事情是有的。等你再生活几年，就能变成一个有用的人。现在，头一件事情，是得让你有个应

该有的外貌。好吧……米罗诺夫，把这个新来的领到鲁多夫·卡雷奇那儿去。”

黑小子跳起身来，扔掉毛笔，擦了擦手。

“走吧，”他说，“小家伙！”

他们走过了各式各样的走廊。怪黑的。炭精灯勉勉强强发着微弱的光。两边都是白色的门。

“这是我们的教室，”黑小子说，“在这儿上课。”

“现在你带我上哪儿去？”彼奇卡问道。

“到卫生员鲁多夫·卡雷奇那儿去。他给你洗澡。”

“洗澡？”

“可不是嘛。在澡盆里洗。”

黑小子在一扇门上敲了几下。

“鲁多夫·卡雷奇！有个新来的。您收下吧！”

出来一位胖叔叔，身上穿着白罩衫。他有两只特大的耳朵，说话声音怪粗的。大概是个德国人。这是卫生员。

“信的？”[1]他问道，“好的很。我们洗澡间的去。

[1] 这个德国人说俄语时的发音和语法都不准确。他意思是说：“新的？”——译者。

水大大的热。”[①]

他把彼奇卡带到那个洗澡间去。到了地方，他说：

“脱衣哭。”[②]

“什么？”

“脱衣哭。我们洗洗。拿来肥皂和刷子洗洗。”

彼奇卡开始从自己身上往下脱破烂衣服。他轻手轻脚慢慢地脱，心想：

“可别让表掉出来。”

哪知卫生员说：

“这个，你统统溜下。是的。你的衣哭，我们统统埋在火炉里烧火。”[③]

这下子可把彼奇卡吓坏了。他赶紧抓住自己的裤子。

“怎么？”他问道。“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埋在火炉里？”

“你别可怕。我们发给你别的衣哭。干干净净。

---

① “很好。我们到洗澡间去。水很热。”——译者。

② “脱衣裤。”——译者。

③ “你把这统统留下。是的。你的衣裤，我们统统填在炉子里烧掉。”——译者。

干干净净哭挤，干干净净衬酸，还有皮的高靴挤。”①

彼奇卡怎么办呀？！彼奇卡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地坐在那儿，两只手紧抱住自己那一堆脏得要命的破衣烂裤，瑟瑟地哆嗦着。当然他并不是冻得这样哆嗦。洗澡间里很暖和，甚至很热。他是吓得直哆嗦。

“那么，”他心想，“我怎么办呢？完蛋么？”

不过，彼奇卡才不甘心完蛋哩。

总算彼奇卡走运。德国人出去了。彼奇卡毫不犹疑地解开小袋子，把金表拿出来，塞进了嘴巴。好容易才塞进去。金表差一点把嘴给撑破。彼奇卡的两边腮帮子鼓了起来。舌头也被金表挤到一边去了。彼奇卡闭紧嘴巴，忍受着。

彼奇卡刚闭上嘴，德国人就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把大钳子。他用钳子夹起彼奇卡的“衣哭”，拽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又回来时，把水放满澡盆，说：

“爬进去。”

彼奇卡爬进澡盆，泡在热水里。水马上就浑浊了——这可不是说着玩儿的，彼奇卡有五年没进澡

---

① “你可别怕。我们发给你别的衣裤。干干净净的。干干净净的裤子，干干净净的衬衫，还有皮的高筒靴子。”——译者。



堂子了。不错，他在河里游过泳。可是象这样一个身子，靠游泳能洗干净吗?

彼奇卡躺在澡盆里，觉得舒服极了。他舒服得都不想出来了。

倒霉的是那个德国人特别爱说话。他一边往彼奇卡的脑袋上涂肥皂，一边嘴里说呀，说呀，说个没完，活象演讲似的。他什么都问，什么都想知道。他问彼奇卡叫什么名字，父名是什么，为什么被逮起来的，在什么地方失去了父母，还有别的这一类废话。

彼奇卡一声也不吭。他嘴里有个金表呀。

彼奇卡只好用脑袋来回答。摇头、点头，需要的时候还来回地晃头。实在不得已的时候，就“唔，唔”几声。

德国人似乎见怪了，他不响了。

德国人开始换水。他把脏水放掉，换上干净水。他先往澡盆里放凉水，然后往凉水里对沸水。

他自己坐到墙角里一把椅子上，拿起一张报纸，说：

“你在水里泡一泡。水太烫了就告诉我，我关上。”

彼奇卡点点头，表示说：好吧。

于是水流呀，流呀，流个不停。越来越烫。彼奇卡嫌烫了，烫得身子受不了啦。

德国人还专心看他的报，大耳朵一动一动的。

水还流呀，流呀，流个不停。彼奇卡实在受不了啦，焦急不安地折腾开了，却又说不出话来，也不能嚷一声告诉德国人。

彼奇卡再也忍耐不下去了，扑通一头扎进很烫的热水里去，把表吐在澡盆底上。然后象个从瓶子里崩出的瓶塞子似的从水里跳出来，放声大叫：

“烫——死——我——啦！”

德国人一跃而起，把报纸丢在地上，手往澡盆里一伸，尖叫起来：

“唉呀！糊涂孩子！你大概疯啦？爬出来！快出来！”

他抓住彼奇卡的肩膀，把他拖了出来。德国人气得够呛，光嚷嚷：

“你怎么的不说话？这个热水，放个母鸡可以烧鸡汤。没错！……”

德国人把水对凉了一些，又开始用肥皂擦洗彼奇卡。他给彼奇卡往后背上抹肥皂时，彼奇卡只顾用一只手在水里摸。可是怎么也摸不到金表。后来

好容易摸着了，赶紧一撅屁股，把头扎到水里，将那个滑溜溜的圆玩艺儿往嘴里塞。怎么也塞不进去。也不知道是表泡胀了，还是彼奇卡的嘴被搓洗得缩水了……好歹总算塞进去了。牙都差一点给挤掉，才好容易塞了进去。

德国人用水把他冲了冲，说：

“行了。你等一会。我去给你取衣哭。”

德国人出去了。彼奇卡坐在肥皂水里等着，忽然发见澡盆里的水越来越少。

德国人回来时，看见彼奇卡坐在空澡盆里。

他觉得很奇怪，问道：

“你为什么把水放掉？没有水，你光光的，这很有害。”

可是彼奇卡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水流光了。他并没有把水放掉，他根本也不会。他自己还觉得挺奇怪呢。

“好吧，”德国人说，“快穿衣！快要开饭了。别去晚了。”

德国人递给彼奇卡一大堆衣裳——有衬衫、长裤、军便服……还有一双半高腰皮鞋。全是新的，干干净净的。

彼奇卡开始穿衣服。他有生以来头一次穿上了衬裤！德国人笑咪咪地看他穿衣服。彼奇卡也忍不住咧开嘴笑了。

忽然，德国人不笑了。

他怀疑地瞧瞧彼奇卡的脸，说：

“你的嘴里有什么？什么东西那么亮晶晶的？”

彼奇卡吓得一哆嗦，赶紧把嘴巴紧闭上，心里想：

“我这个流浪汉真是个糊涂虫！我干吗要笑呢？”

他转过身去，耸耸肩膀，意思说：

“没什么，不值得注意。”

可是德国人不肯罢休，他用两只手捧住彼奇卡的脸蛋儿，嚷道：

“喂！张开嘴！你藏了什么？那是什么嚼的东西？”

彼奇卡张开颚骨。

“快吐！”德国人喊道。

彼奇卡噎得几乎要闷死了，他用舌头一顶，就把塞在嘴里的那个东西吐在德国人的手心里了。

彼奇卡吐完一看，吓得差一点大叫起来。

原来躺在德国人的手心里的不是表，而是一个大铜塞子，就是用来堵澡盆的放水孔的那个大铜塞子。彼奇卡刚才慌里慌张地把澡盆塞子塞在自己嘴巴里了，怪不得澡盆里的水流光了呢。

彼奇卡吓了一大跳。德国人也吓了一大跳。他以为彼奇卡是个半疯子，因此吓得他嘴里咕噜咕噜地唠叨了半天。

“你告诉我，”他问道，“看上帝面上告诉我，这个澡盆塞子，你为什么吃在嘴里？这是金属，金属吃在嘴里的行不行？”

彼奇卡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瞎编了一句，说：

“我饿了。我想吃东西。”

自己却偷偷地朝澡盆里张望着。表哪儿去了？

怎么回事儿？看不见呀。澡盆是空的。里面只有一个湿淋淋的丝瓜瓤子[①]。表准在丝瓜瓤子底下。要是德国人走开就好了，那就可以拿出来啦。可是德国人不动地方，他满心在可怜彼奇卡。

“唉呀！啊呀！……老天爷呀！”他说。“铜的东西，

① 洗澡时用来擦肥皂的。——译者。

吃的不行。马上要开饭了。给你汤，给你饭，还有果子冻。铜的塞子不好吃，很硬。你看！”

德国人把铜塞子扔在澡盆里，发出当啷一声金属声。彼奇卡看见德国人弯下腰去，要够丝瓜瓤子。他马上要将丝瓜瓤子拾起来了，在那丝瓜瓤子底下可是有……哎呀，不得了！

彼奇卡没考虑很久，就直挺挺地往地板上一倒，要死要活地大嚷大叫起来：

“哎唷，哎唷，哎唷唷！”

德国人急忙转身跑到他跟前来，问道：

“你怎么啦？啊？你怎么啦？”

彼奇卡叫个不停，可怜的家伙象发了急病似地拚命乱挣。

“哎唷唷！哎唷唷！”他不停地嚷着。

德国人慌了手脚，抬脚就往外跑，他撞倒一把椅子，从屋里飞奔出去。

彼奇卡扑到丝瓜瓤子上。果然如此——表就躺在丝瓜瓤子下面。

彼奇卡急忙将表抓在手里，把水擦干，欣赏着，手心里活象是太阳在放光……彼奇卡观赏了一番，把这个小太阳塞在崭新的公家衣服的口袋里。

刚塞进去，德国人就跑回来了，手里攥着一个小药瓶子。

“闻！”他喊道，“快闻，阿摩尼亚水！”

彼奇卡踉踉跄跄的，身子一阵摇晃，闻了闻那只小药瓶子里的东西，打了个喷嚏，就复原了。

他急忙穿好其余的衣服，登上皮靴，“啪”地把两个鞋后跟往一起一碰。这双崭新的半高腰皮靴有点挤脚，不过还能对付穿。彼奇卡这一打扮，简直象个干干净净的漂亮小伙子了。还扎上腰带，抹平了头发。

“唉，”他心想，“可惜没有镜子。我真想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个什么样的男孩子。”

“我们去吃饭吧。”德国人说。

他们刚走到走廊里，就响铃了。铃声响遍了全楼。孩子们吵吵嚷嚷地从走廊里跑过，发出一阵脚步声和喧哗声。

彼奇卡差一点给人撞倒，被大家推挤着，蜂拥着，一块儿往前跑。彼奇卡找不着德国人了。

他心慌极了，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他一眼瞅见黑小子，就是在办公室里画五角星的那个人。黑

小子也瞅见了他。黑小子笑了笑，朝他招招手。

“过来，”他嚷道，“上我们这一组来。”

他们一同跑进少年教养院的食堂。

食堂里已经挤满了孩子们。孩子们坐在桌前，桌子上摆着锡制的汤盆，热气腾腾，香喷喷的。彼奇卡觉得鼻子里发痒，两个膝盖直打战。

他们坐下来吃饭。

孩子们不住地喧嚷，挥舞着匙子，互相扔面包皮。彼奇卡却只顾喝他的汤。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小伙子有两天没吃饭了；两天以来，他只吃了一个果酱馅的馅饼。难怪他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

德国人没有说瞎话：喝完汤，就端上饭来了。是拌了黄油的荞麦饭。彼奇卡把荞麦饭也三口两口就吃光了。又端上了果子冻。彼奇卡吃完果子冻，连碟子都舔干净了。

坐在他旁边的孩子都笑了。特别是有个前额上缠着绷带的独眼龙，笑得最厉害……他索性毫不客气地逗弄起彼奇卡来了。

“大饭桶，”他说，“吃那么多。真的，连大象也没有他吃的多。”

孩子们笑得更欢了。惹得彼奇卡一肚子气。他

憋呀，憋呀，实在憋不住了，于是他舔干净了自己的锡匙子，盯住独眼龙那只无礼的独眼儿，一扬手，把锡匙子敲在独眼龙的脑门子上。

独眼龙尖声怪气地哇哇叫开了。孩子们也闹哄起来。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跑来了。

独眼龙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揉脑门子，脑门子上凸起个大疙瘩。

“谁把你打成这样了？”费多尔·伊凡诺维奇问他。

“他，”独眼龙指指彼奇卡，“就是这个……用匙子打人。”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用严厉的目光看看彼奇卡。

“站起来，”他说，“叫你站起来。”

彼奇卡站了起来，阴郁地望着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意思说：你有什么事？

“好吧，”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说，“好吧。你给我出去吧！”

彼奇卡也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就跟在院长后面出去了。刚走出食堂的时候，听见背后有人说：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新来的人没有错儿。”

这声音很熟悉。是黑小子在说话。

他们来到走廊里。

“好吧。”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说。“你听我跟你说……不许打架。唔，大街上有打架的，我们这儿可不许打架。明白了么？现在罚你站。你就在这儿站着吧，一直站到大伙儿吃完午饭。”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转身向走廊那一头走去了。

这时，正好午饭也吃完了。孩子们从食堂里跑出来，从彼奇卡身旁跑过。彼奇卡把身子贴在墙上……孩子们一个一个跑了过去。独眼龙跑过去时，朝彼奇卡伸了伸舌头。黑小子跑过去时，向彼奇卡喊道：

“游泳去吗？”

彼奇卡乐得跳了起来。

“到哪儿去游泳？”

“到小河里去游，到卡尔顿去……我们这一组人都去。你也去吗？”

彼奇卡已经打好了主意。

他跟黑小子一块儿跑去。黑小子一边跑一边叮嘱他：

“你不要和皮亚塔科夫打架……要是他跟你打架，你别理他，你应该立刻去告诉校务委员会。”

“好吧，”彼奇卡心想，“我可没工夫到校务委员会告状。一会儿到了卡尔顿……就再会吧！”

他们跑进一间宽敞的大厅。这间大厅里孩子多极了。孩子们象兵似的排成两行站着。一位留大胡子的叔叔拿着一根小棍儿喊口令。

“立正！向右看齐！”

彼奇卡也排到队伍里去，也象个兵似的挺直腰板，向右看齐。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走进大厅里来。他把孩子们挨个儿检查一遍，命令这个把腰带扎好，命令那个去洗脸。他一看见彼奇卡，就扬起眉毛问道：

“怎么，新的也去？不行，今天不能让新的去。让他休息一下。”

他看见了独眼龙，便说：

“皮亚塔科夫也从队伍里出来吧。今天他的品行不好，不许去游泳。”

独眼龙哭开了，他从队伍里退了出来。

彼奇卡也出来了，不过他没有哭。

他只是满脸懊丧的样子。

排成一对一对的孩子们齐步从彼奇卡面前走了过去。

“左，右，左!”

等他们走完了，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走到彼奇卡身旁，拍拍他的肩膀。

“好吧,”他说,“别泄气,小兄弟。你会渐渐习惯的。在我们这儿，孩子们生活得很好。就是不许可打架。好吧，你到院子里去玩一会儿吧！得了！高兴一点!”

彼奇卡到院子里去了。

没去游泳的孩子们都在玩打木棒的游戏，他们邀彼奇卡和他们一起玩。彼奇卡笑笑，说:

“我才不玩呢。这是小娃娃玩的游戏。”

彼奇卡踅到一边去，坐在围墙下的石子地上。

他琢磨着:“怎么办呢？应该怎样行动？”

天色慢慢暗下来了。雾气茫茫的。太阳逐渐西沉。远远地，孩子们还在玩打木棒。他们的清脆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来:

“打倒了！把神甫打倒了。”

“瞎扯！神甫在城里呢……”

削得光溜溜的小木棒在空中飞着，带着响声落

在地上，又蹦起来。

彼奇卡心想：

“我跑，当然是能跑掉的。这一点疑问也没有。不过把表带在身上很危险。身上带着这种东西会出乱子的。谁知道会遇见什么……也说不定这里每天都要烧掉脏衣服……不行。现在趁时间还来得及，必须把表藏起来。”

彼奇卡决定把表藏起来。他决定在逃走之前，先把它埋在土里。他准备今天夜里就逃。

他肚皮朝下趴在地上，向四面张望了一下。孩子们还在玩打木棒的游戏，在打什么神甫。一位老师坐在那边看书。没有人看见彼奇卡。

彼奇卡把表掏出来看看。他忽然觉得非常好奇，他想看看表里头什么样儿？

他打开表盖，表盖底下还有个盖儿。盖儿上有两个黑体字母：С. К.[①]。盖儿下面是玻璃。玻璃下面是指针。

秒针在一个小黑圈子里迅速地走动着。时针和分针都走动得叫人看不出：你用眼睛盯着它的时候，

① 这是醉汉谢苗·库德雅尔的姓名的字头。——译者。

它好象并不动。可是如果你隔一会儿再去看时，它们就挪地方了。彼奇卡的表现在是七点差一分。

彼奇卡就在围墙旁，在石子地上挖了一个深到胳膊肘的小坑。他合上表盖，用一块破布把表严严实实包了起来，放在小坑里，把小坑又埋了起来，用手拍结实，重新撒上石子，还插上一根小树枝，免得记错地方。

然后他躺到地上，枕着他那个宝藏上面的碎石堆，胡思乱想起来。

老是想这些事："得买一件外套，带小羊皮领子的。得买一把小刀。也许再买一把手枪……买点带馅的糖。苹果……"

彼奇卡又想入了迷，又不知愁了。

孩子们游完泳回来后，都到食堂里去喝茶。彼奇卡完全不去理会独眼龙，可是独眼龙还来撩惹他。幸亏黑小子挺身出来保护彼奇卡。

"你算了吧，皮亚塔科夫，"黑小子说，"他还没叫你吃够苦头么？你还想挨揍呀？"

独眼龙皮亚塔科夫这才老实了。

喝完茶，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到院子里去打棒球玩。彼奇卡也兴高采烈的。可惜他不会打，要不然

也一定会为他这一伙人打一场。彼奇卡很快活。

天完全黑下来了，天上出现了亮晶晶的星星。这时又打铃了。老师站出来高声喊道：

“孩子们，睡觉去!”

孩子们都懒洋洋地走进卧室。

卧室很大，光线半明不暗的。雪白的墙壁，灯上罩着乳白色的玻璃罩。一排排床铺，象医院里一样。

黑小子指着一张床，向彼奇卡说：

“那是给你预备的床。你挨着我睡。”

彼奇卡看了，心里怕起来，想道：

“难道我真得在这儿睡觉么？”

床上铺着各式各样的床单子、毛茸茸的灰色毛毯子、干干净净的枕头，还罩着枕巾。

彼奇卡脱了衣裳，象个体面人似的躺在床上，盖上毛毯。心想：

“我现在这个样子，要是给卡尔顿的伙伴们看见了，才有意思呢……他们准得乐……不过，这样睡觉还真不错。”

后来彼奇卡又想道：

“无论如何，半夜里也得逃走。”

可是半夜里彼奇卡没有逃走。还怎么逃呀！顾

不上什么逃走了。他这一觉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才醒。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他实在累垮了……

彼奇卡觉得有人揪他的脚。他把脚缩到毛毯底下去，登了几下……可是，又有人来拉他，也不知是谁在拽他的肩膀。彼奇卡抬起头来，睁开瞌睡朦胧的眼睛，看见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站在他的床前。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在叫醒他。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板着面孔，两条眉毛一动一动的。

孩子们还都没醒。卧室里响着一片愉快的鼾声……天还没大亮。

“起来。”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说。“对。起来，有事儿。”

彼奇卡清醒了过来，问道：

“什么事儿？”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说：

“警察局来人接你。”

彼奇卡的头落在枕头上了。他惊叫了一声。

“警察局来人接你。”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又说。“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好吧……起来，穿上衣服。”

彼奇卡穿起衣服来。他的两只手直发抖，腿也发抖。两只脚怎么也伸不进裤腿里去。彼奇卡慌神儿啦。

“警察局干吗来人找我呢?……”他想，“准有什么不妙的事儿啊。”

彼奇卡穿好了衣服，跟在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后面走去。

走到办公室里，一看，有个上年纪、蓄着两撇胡子的警察坐在那儿，腋下夹着一个文件夹。

警察站起来问道:

“就是他吗?”

“就是他。”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回答。

“那么，请允许我把他带走。”警察说。“公民，走吧。”

他们就走了。彼奇卡不知道是上哪儿去，也不知道去干什么。这警察虽然很老了，但是走得很快。而且一个劲儿催彼奇卡快走。

“快点走。”他说。

彼奇卡想问问，为什么带他到警察局去，可是不敢问。这老头儿模样实在太严肃了。后来彼奇卡好容易壮起胆子，问道:

“对不起，您为什么把我带走？”

警察回答：

“你自己知道。”

他回答时的表情是冷冰冰的，完全公事公办的样子。

他们很快就走到了市场。彼奇卡按他的老习惯，又想乘机钻到拥挤的人堆里去，却被老警察一把抓住了肩膀。

“哪儿去？”他说，“往哪儿跑？……我们绕着市场走。不要玩花样。”

他们绕着市场走了过去。到了警察局市场巡查队。

警察把彼奇卡带到队长办公室里。队长坐在桌前吸烟，喷着烟圈儿。一个岁数挺大的红鼻头公民坐在队长旁边。彼奇卡望望这个公民的脸，觉得有点儿面熟……

“是不是上星期我偷了他一瓶果子酱的那个人？要不然就是前两天被我偷了裤腰带的那个人？……不对，不是那个人。”

彼奇卡再仔细看看那个公民的鼻子，猛地想起来了：



“是那只表呀……就是那个醉汉……”

果然是他。正是那个红鼻头，那只斜眼睛；只有胡子不象那一天似的一翘一翘——现在两撇胡子无精打采地朝下耷拉着。

队长开了腔，他说：

“你凭良心回答。你偷没偷库德雅尔公民的表？”

彼奇卡紧张得好象浑身抽动了一下，但是他及时控制住了自己，没有露出马脚。

“哪一个库德雅尔啊？”他问道。

“谢苗·谢苗内奇·库德雅尔。就是这位公民。”

彼奇卡瞅瞅这位公民，摇摇头。

“我头一次看见他。”

“别撒谎，”队长说，“你在撒谎。你是第二次看见他。”

“真是头一次。”

队长象读公文似地说道：

“谢苗·谢苗内奇·库德雅尔公民诉称失去了一只金表，是在我们巡查队的第三号室里被人偷走的。这是实情吧？”

“什么‘实情’呀？”

“就是这样。库德雅尔公民，您认识这个小伙子么？”

“认识。”红鼻头回答。

他用一种尖里尖气的怪声音回答。昨天他还用大粗嗓子嚷嚷，今天却象个小鸟儿似的尖声叫唤。

“认识，”他用小尖嗓子说，“就是他……”

“怎么样？”队长问彼奇卡，“你还不还表？”

“什么表呀？”

“就是那个！”队长发脾气了。“那个！你还不还吧？”

彼奇卡也发脾气了，说：

“我从哪儿给你们弄一只表来？我从来没看见过表，也不想看。我这儿没你们的什么表！”

队长冷笑笑，说：

“我们看吧。”他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喊道：“喂，特卡钦柯同志！”

门开了，彼奇卡的老相识——卷头发警察走了进来。

“来了，”他说，“您叫我有什么事？”

“这件事。你把这小子从头到脚搜一遍。把表搜出来。”

“唉呀，”卷头发警察说，“又是这小子，我认识他。昨天我把他送到克拉拉·蔡特金少年教养院去的。我坦率地说，他的觉悟很高，很诚实。不过，既然您命令我搜他，那就搜吧。这没什么难的，可以搜搜。”

卷头发警察动手搜彼奇卡。这一回彼奇卡一点也不害怕了。他心里非常好笑。他甚至装腔作势地说：

“不，请你们别搜我。我不能让你们搜。你们没有权利搜。”

他故意紧紧地抓住衣袋。

于是队长大吼一声：

“怎么？！”

库德雅尔公民也尖声叫唤起来：

“他害怕了！真的，害怕了！好心人，快搜搜他吧！把我的表搜出来……”

队长跳起来，揪住彼奇卡的胳膊，攥得紧紧的，彼奇卡动也动不了啦。

“特卡钦柯，搜他！”他嚷道。

卷头发警察动手搜彼奇卡，搜他的衣袋，摸他的怀里，哪儿也没有表。

“没有呀。”卷头发警察说。

队长发楞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他问道。“嗯?……库德雅尔公民，也许是您瞎说?”

“当然罗!”彼奇卡嚷道，“他当然瞎说。他根本没有过什么表，也不可能有……”

“不对。”库德雅尔说，他差一点要哭出来了。“不对。我没有瞎说。我确实有过一只带银表链的金表。确实有过……链子还留着呢，您看……”

红鼻头掏出表链子，拎着它，在几个人的面前晃了晃。大家都看见，确实是一根银表链。链子上还有各式各样的小玩艺儿，悬挂着形形色色的装饰物。有这样那样的小象、小马、马蹄掌，还有一块梨形的绿莹莹的绿宝石。

“奇怪!”队长说。“我的确认为您瞎说。这链子能说明什么呢?”

“说明什么?”红鼻头说。“就说明这个。本来表链子上有一只表。表叫谁拿走了?叫他拿走了。他……”

他说着，用一只手指头指指彼奇卡。

彼奇卡大笑。

“完全是胡说八道，”他说，“我是锁在一个单间的禁闭室里的，我怎么拿你的表？那屋里只有我一个人。”

“是这样。”队长说，“这件事情非常可疑。库德雅尔公民，诬告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知道吗？关于这一点，您认为怎样？”

库德雅尔公民当场放声大哭。从他那只斜眼睛里落下了滚滚的热泪。

“随你们去吧，”他说，“不过我的表一去不复返了。不管怎样，我可不愿意打刑事官司，我还是快走吧。”

库德雅尔公民把帽子往头上一扣，向队长鞠了个大躬，就抽抽噎噎地从屋子里走了出去。

彼奇卡一本正经地站在那儿，用恼怒的目光望着。他象是受了很大委屈的样子。一句话也不说。

“请你原谅，”队长说，“搞错了。这是凭空诬告。特卡钦柯同志，你送他回克拉拉·蔡特金少年教养院去吧。我们没有权利扣留他们那儿的学生。”

“好，”卷头发警察说，“我可以送他回去。走吧，小家伙。”

他们走出巡查队，走到市场的广场上。

卷头发警察停住脚步，说：

“小家伙，你一个人回去吧。你认识路，不会走错的。昨天我已经对你的诚实可靠深信不疑了。小弟弟，你走吧……我要回家去一趟，今天我的妻子过命名日。”

卷头发警察转过身，大踏步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彼奇卡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然后向少年教养院走去。

市场已经走过去了，到了大街上。忽然他听见后面有人喊他。他回头一看，只见库德雅尔公民在后面追了上来。库德雅尔公民一边跑一边招手，意思说：等一下。

彼奇卡站住了，等他跑过来。于是就演出了这样一场荒唐戏。

库德雅尔公民跑到彼奇卡跟前，扑到他的脚下，双膝跪着嚷道：

“心肝宝贝！求求你！把我的表还给我吧！我的几个孩子在挨饿，我的老婆还有病……我感激你一辈子。我给你三个卢布。还给我吧，宝贝儿……”

彼奇卡哈哈大笑，什么也没有说，又继续往前走。库德雅尔公民站起身来，跟在彼奇卡后头追，等

追上彼奇卡时，抓住他的肩膀，嚷道：

“还给我！看上帝面上，还给我！……”

彼奇卡挣脱了他，说道：

“走开！别缠着我……你看不见你的表了，就好象你看不见你自己的耳朵一样。你得不到那只表了。明白吗？”

库德雅尔公民惊慌失措地喊叫起来：

“啊，是这样吗？是这样吗？那我就去告你……根据法律条文提出控诉……”

“你告去吧，”彼奇卡说，“请吧，告去吧，反正谁也不信你的话。人家会说：老醉鬼在胡扯。”

彼奇卡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他快活得什么似的，心里好笑极了……一切愁事都算不得什么了。他走着，乐得手舞足蹈地，两只脚跳出这样的节拍：

“对呀对。对呀对……”

彼奇卡满脑子幻想。

“我一有机会就逃，”他想道，“今天夜里就得逃。先偷偷溜到院子里去，把表挖出来，然后从墙上跳出去，一点不费力……溜之大吉……”

彼奇卡想得出了神，没注意已经走到威津大街上了。他走到少年教养院门前时，有意无意地回头

望了一眼。他发现库德雅尔公民正悄悄地尾随着他。彼奇卡又回头望了一眼，——这回看不见库德雅尔公民了，他准在大街拐角后面躲起来了。

“咳，你这个老丑八怪呀……还盯我的梢!”

彼奇卡还想回头看看，可是这当口有人在他头上大喝一声：

“喂！当心!”

一个马头差一点撞在彼奇卡的后脑勺上。

总算彼奇卡走运，及时地跳开了，要不然准被那匹拉货车的大马用蹄子踩个稀巴烂。

满载木柴的大车在大街上驰了过去。车夫们一边用鞭子抽马，一边嘴里骂骂咧咧的……一辆又一辆满载木柴的大车从彼奇卡身旁跑过。

“这是往哪儿拉呢？”彼奇卡想道。“往哪儿拉这么多木柴？”

他很想知道，就跑近最前面的一个车夫，问道：

“大叔，您往哪儿运那么多木柴啊？”

“运到少年教养院去。”车夫回答。“克拉拉·蔡特金少年教养院。”

“好家伙!”彼奇卡心想。他是怀着自豪感这样

想的。于是他说：

“是给我们运木柴。当心一点，一根也不要掉在地上。”

车夫笑起来，举起鞭子抽马。

彼奇卡向少年教养院走去。刚走到大门口，碰见有几辆空大车从院里往外走。彼奇卡觉得很奇怪，心想：

“这也是运木柴来的吗？”

当彼奇卡走进院子的时候，不由得惊讶得瞪圆了眼睛。

他的两条腿都发软了。

整个院子里都堆满了木柴。从这边围墙到那边围墙，到处都是八俄寸长的桦木柴、松木柴和杉木柴。孩子们喧喧嚷嚷在码木柴垛。院长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搓着手，跑来跑去地嚷着：

“对！孩子们，上点劲儿！……孩子们，加油干呀！”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跑到彼奇卡跟前，拍拍他的肩膀，大声说：

“好吧！看见了吗？……卸了一百立方米。看见了吧？对你们这些小鬼有多么关心！看见了吗？”

“看见了，”彼奇卡说，“谢谢呀！”

彼奇卡说着，踉踉跄跄地向院子顶里面，楼梯的方向走去。他还没走到地方，就趴在木柴堆上哭开了，只说了一句：

“哎呀，表呀……”

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眼泪堵住了他的喉咙。

彼奇卡坐在那儿不停地哭，眼泪象河水似地不停地流，停也停不住了。黑小子跑过来，向彼奇卡弯下身子，问道：

“你怎么啦？谁欺负你了？你为什么哭呀？”

彼奇卡站起来，盯着黑小子的脸，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滚你的蛋！”

彼奇卡扶着楼梯栏杆走上楼去，坐在走廊里的一个窗台上，心里打主意。

“现在怎么办？”他心想。“逃走么？太冤了……”

彼奇卡伤心极了。他坐在窗台上，眼睛望着窗外。孩子们已经码完了木柴垛，从他身旁跑过去。黑小子跑过去时，站住了。他走到彼奇卡面前，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说：

“兄弟，你怎么啦？你心里难过，是吗？我借给

你一本书看，好么？”

“不要，”彼奇卡说，“不想看！你趁早走开！”

黑小子说：

“要是看书，就不会那么难过了。我一定得借给你一本书看。你看过果戈理[1]的《鼻子》么？”

彼奇卡火冒三丈，说：

“我从来没看见过什么鼻子，也不想看。走开！”

这时，别的孩子也过来了，围在彼奇卡坐的那个窗台旁边，听他们说话。黑小子说：

“我一看你这样子……就觉得你这人真是个‘奇种’！……”

“什么？！”

彼奇卡从窗台上一跃而下。他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

“什么？”他说，“你再说一遍！你刚才怎么说的？你说我是个寄生虫！你自己才是寄生虫呢！你知道么？为了你说这种话，我得打掉你的牙！”

彼奇卡握紧拳头，在空中一晃。黑小子微微笑着说：

① 果戈理（1809－1852）是著名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译者。

“你干吗张牙舞爪的。反正我也不准备跟你打架。”

“啊哈!”彼奇卡嚷了起来。“你害怕呀? ”

“是的,”黑小子说,“我害怕。我原则上就害怕。”

彼奇卡又举起拳头,在空中晃了一下。可是不知怎的,他没敢打人,就把拳头放下了,然后踉踉跄跄地走了。孩子们跟在他后面嘻嘻哈哈地乐开了。尤其是独眼龙皮亚塔科夫笑得比别人更响……

这回彼奇卡气得大哭而特哭了一场。他糊里糊涂向前跑去,一头扎到楼梯底下一个小角落里,在那儿一直躲到天黑。连午饭都没出来吃。

晚上喝茶的时候,彼奇卡才在食堂里露面。他喝完他那杯茶,吃完他那半磅面包,就睡觉去了。

……彼奇卡作了个梦。好象他正坐在菲克拉老妈妈的饭摊上吃肉。是猪肉。他把大块的肉往嘴里塞,狼吞虎咽的,噎得喘不过气来,肥油顺着下巴直淌到衬衣里面。菲克拉老妈妈还不住地往他碟子里添菜,说:

“吃呀,吃呀,傻小子,快点吃!”

彼奇卡没来得及定定神，菲克拉老妈妈又端上来一大盆小面包。彼奇卡大口地吃小面包，还喝牛奶，心里想："我一共吃了多少钱的了？"

他刚想算算账，菲克拉老妈妈替他回答了：

"你已经吃了三个多卢布的东西了。我应该向你要……"

彼奇卡站起身，说：

"菲克拉老妈妈，你揍我一顿吧！菲克拉老妈妈，我没有钱。我一分钱也没有。"

菲克拉老妈妈却说：

"你虽然没有钱，可是你有一只表……你拿表抵债吧。"

彼奇卡把手伸进衣袋里去,，掏出一包钱。尽是现货的契尔伏涅支①。有一百块。他给了菲克拉老妈妈四块。

"给你，"他说，"菲克拉老妈妈，拿去吧。"

菲克拉老妈妈对他鞠躬到地，感激他这样慷慨大方。这时候，他在卡尔顿的那一群伙伴不知打哪儿来了。有刺猬米奇卡、大司祭瓦西卡、大法宝、海

---

① 契尔伏涅支是旧俄金币名，每一个值五卢布或十卢布。——译者。

军准尉……大家都对他鞠躬到地。彼奇卡给了每人一个契尔伏涅支，然后自己爬到椅子上去站着，喊道：

“唱吧！请大家唱《跳呀，联合起来！》……”

忽然间，卷头发警察不知打哪儿蹦出来了，他举起文件夹，在空中挥舞着，嚷道：

“喂，跑吧！”

彼奇卡害怕极了，撒腿就跑。

他跑到大街上，拚命地跑。但是脚上的半高腰皮靴太沉了，妨碍他跑……彼奇卡在一个拐角上绊了一交，跌到水沟里去了。跌进水沟里，就醒了。

彼奇卡出了一身大汗。毛毯也掉到地上了。枕头胡乱歪在一边。彼奇卡热得不行，热得喘不上气。月亮朝窗子里窥视着。旁边的孩子们都睡得香香的。黑小子也在他旁边打鼾。通风机在彼奇卡头上嗡嗡作响。

彼奇卡拾起毛毯，躺好，可是再也睡不着了。他苦闷得要命。

彼奇卡想东想西，什么都想到了，不过想得最多的，是自由。他回想起自由的生活，真是伤心……通风机还一个劲儿嗡嗡地响着。

它吵得彼奇卡睡不着觉。

从窗外远远的地方，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彼奇卡紧张得打了个哆嗦。

“唉，”他心想，“现在火车站才热闹呢。这会儿莫斯科开来的火车正到站。咱们的伙伴一定全在那儿。准在掏人家口袋儿……多么愉快！在这里，可得象傻瓜似的睡在褥单子上……”

彼奇卡用胳膊肘撑起上半身，望望周围的孩子们，不禁苦笑起来，心想：

“一个人怎么能忍受这种生活？不过，他们不都在生活着嘛……而且根本不想逃……怎么还打棒球玩呢？”

彼奇卡又躺下。不停地冒汗。怎么也睡不着。通风机还一个劲儿嗡嗡地响着……

忽然，远远地响起了钟声。

是消防队望楼上的钟在打点。

当！

当！

当！

“三点钟。”彼奇卡数着。他猛地想起表来了，不由得浑身发抖。

“不行，”他想道，“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去试试看吧……也许能把表挖出来，也许能把表拿到手……”

彼奇卡悄悄地穿好衣裳，想了想，把毛毯叠得耸起来，仿佛有个人睡在里面似的。把枕头也压压扁……然后蹑手蹑脚走到窗前，小心翼翼地拉开窗闩，打开窗户。

一阵凉风扑面，立刻感到舒服一些。彼奇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从窗口探出身子。

往下跳是危险的。他在二楼上，院里地上的石头在闪闪放光。跳下去，恐怕会粉身碎骨的。

旁边墙上装有排水管。窗户下面有一条窄窄的凸边。离排水管只有三步远。

彼奇卡壮起胆子，爬到凸边上，劈开两腿，一扑扑到排水管上。顺着排水管往下溜，就不难了。哧溜哧溜就滑下去了。两只皮靴后跟着了地，踩在石头上。

彼奇卡到了院子里。他边走边找埋表的地方。他记得很清楚，是在围墙旁边。可是离围墙十俄丈的地上，都满堆着木柴……

彼奇卡这只表被木柴严严实实地给堆积上了。

“不要紧，”彼奇卡想道，“想个办法把它挖出来。”

彼奇卡往手上吐了口唾沫，抓住第一根木柴，往自己身边拖。木柴是潮的，很重。

彼奇卡把第一根木柴拖开，又抓住第二根……然后去拖第三根，扔到一边去。他就象这样拖开了二十来根木柴，累得满头大汗，把自己都圈在木柴堆里了。可是他不顾一切，还拚命地继续拖木柴。

后来他伸手去拉一根很重的圆木头。这根圆木头在木柴垛的顶上面。他两只手没拿住它，圆木头咕咚一下子滚了下来，搞得木柴垛哗啦啦整个塌了。

忽然狗汪汪叫了起来。那只狗不知打哪儿窜出来了。

彼奇卡吓坏了，但是跑也跑不了。

狗却又是吼，又是叫，向彼奇卡直龇牙，一双眼睛象狼眼睛似的闪烁着。

彼奇卡蹲在木柴堆里，瑟瑟地抖着，拚命想啊……想，可老想不起这讨厌的狗叫什么名字……是叫特莱左尔？还是叫巴尔波斯？还是叫沙利克？最后突然想起来了。

“‘王爷’！”他低声叫道。“‘王爷’！傻蛋！去，

回去！……”

“王爷”马上不叫了。它眼睛里的凶光也熄灭了，摇摇尾巴，走开了。

彼奇卡赶紧没命地往排水管那里跑，跑到了，便顺排水管又爬回二楼，从窗户钻了进去。差一点从凸边上摔下来，不过总算爬进去了。

他找到自己的床铺，坐下来脱衣裳。得快一点！得快一点！他浑身发抖，上下牙齿直打架。

彼奇卡脱下头一只皮靴时，不当心扔在地板上。吧哒一响，把黑小子吵醒了。黑小子瞧了彼奇卡一眼，打个大呵欠，问他：

“你上哪儿去来着？”

彼奇卡很窘，回答道：

“上厕所。”

“怎么还穿……皮靴？”

可是黑小子没等彼奇卡回答，就睡着了。

彼奇卡脱完衣裳，钻进被窝，立刻打起呼噜来。

彼奇卡在梦里还哆嗦着呐。

真奇怪，——彼奇卡生病了。

简直奇怪透了。以前不论这小伙子遇到什么样

的艰难处境，从来没咳嗽过一声。尽管他这样瘦弱，可是胸口从来没痛过。

去年十月里，初寒已经开始以后，他还在河里洗过澡，也没闹不舒服。他什么脏东西都吃过，有时一连几个星期饿着肚子，也没患过病。现在他却生起病来了。

彼奇卡被送到少年教养院的病房里。据医生诊断，他患了很厉害的肺炎。

卫生员鲁多夫·卡雷奇服侍他。

彼奇卡病了三个星期。他昏迷不醒地躺了整整三个星期，随时有死掉的危险。

但是他没有死，终于活下来了。这小伙子可不是那么容易死的。他活下来了。恢复了知觉。

在一个阴雨天，彼奇卡清醒了过来。窗外，雨滴滴答答下个不停。病房里静悄悄的，满屋里洋溢着石碳酸的气味。

彼奇卡翻了个身，回忆起来：望楼上敲钟：当，当……后来“王爷”叫起来了。

彼奇卡回想起所有的事，他明白了，自己已经病了很久。

这时候，卫生员鲁多夫·卡雷奇进来了。他看

见彼奇卡还活着，而且见好，高兴极了，拍着手说：

“啊！好容易你活了！你这个可怜的人儿，活了！我全心全意祝贺你！太好了！”

彼奇卡躺在那儿，连笑也不笑一下，一声不吭。

“别说话，”鲁多夫·卡雷奇说，“别说话，你还不能多说话。你应该休息。应该吃饭……喝点鸡汤。”

鲁多夫·卡雷奇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还带着黑小子。黑小子用一只大洋铁托盘端了一盆汤来。他满脸堆笑地大声说：

“你好啊！祝贺你！”

他把汤放在彼奇卡面前。彼奇卡开始喝汤。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一点一点往下咽。黑小子在他旁边坐下，弯下身来和他咬着耳朵说：

“我有事找你。得跟你谈谈。要紧事。”

彼奇卡抬起头来问道：

“什么事？”

鲁多夫·卡雷奇拦住他们说：

“不行，病人应该休息。他说话有害。你走吧！他喝鸡汤，你不要捣乱。”

黑小子站起来说：

“好吧。没有办法。你休息吧。等你身体好一些时，咱们再谈……我来看你。再会。”

黑小子走了。

彼奇卡躺着，心里想：

“他要跟我谈什么呢？他找我有什么事？真奇怪！”

但是接着，彼奇卡又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想到了更加重要的事情。

彼奇卡考虑自己应该怎么办，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是从少年教养院里逃走呢？还是……

不，彼奇卡可不是那种打定了主意，又随便放弃的小伙子。彼奇卡决心重新拿到那只表，就非拿到手不可。哪怕得等很久，也没关系。可以忍耐一下，可以在少年教养院里住一个时期，等那些木柴烧完再说。

彼奇卡开始等待木柴什么时候烧完。同时他的身体也一天天在复原。

木柴有一百立方米。这不是为了烧一个月两个月的，也许够烧一年哩。不过既然彼奇卡下了坚定

的决心等待，他就等待着……耐心等着。

彼奇卡恢复了健康，可以在病房里走来走去了，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这样走动，当然很无聊。

他有时走到窗口，望着大街上。外面阴雨连绵。快进八月了。

有一天，黑小子来找彼奇卡，手里拿着一本书。他打了个招呼，然后坐在彼奇卡的床上。

“你寂寞吧？”他说，“我给你拿来一本书，有意思极了。给你看吧……”

彼奇卡摇摇手说：

“我知道这是些什么书！尽是政治书……有用意的。我不爱看你们这种政治书。”

“不是的，”黑小子说，“这不是政治书。政治书，等冬天上课以后才让你钻呢。这不过是一本有趣的小说。你看完，我再给你拿一本来。”

黑小子把书放在凳子上，又呆了一会儿，就走了。彼奇卡躺下睡觉，一直睡到天黑。晚上鲁多夫·卡雷奇把他叫醒，给他送晚饭来了。

彼奇卡吃完晚饭，又接着睡。这回可睡不着了……

他躺着，两眼望着天花板，望着电灯泡。心里怪不好受的。电灯泡太乏味。

于是彼奇卡又望着地板。地板也没有什么可看的。

他忽然发见凳子上的书，高兴起来。

“反正没事儿干，”他想，“看看书吧。”

这是一本被人看得破破烂烂，又旧又脏的书。不过，还不错，带插图。彼奇卡开始看插图。先是随便翻着，后来被它吸引住了……

插图上画的是一个犯人。

犯人的手脚都用绳子捆着。旁边站着一个手持宝剑的看守人。

彼奇卡心想：“为什么把他捆起来了？”

彼奇卡翻过去一页，看起来了。又接着往下看……这样看没意思，不知道前头怎么回事。于是他从头看起。这下子他可入迷了，整整看了一夜……

这本书很有趣，叫作《亚费特寻父记》。讲的是有一个被药房主人收养的小男孩，名字叫亚费特。他长大以后，就到天涯海角去寻找他的父亲。在寻找的过程中，他碰到许多奇遇，后来终于找到了。这时他父亲已经成了百万富翁，见到自己的亲生儿子，高

兴极了，还送给他一件燕尾服……

彼奇卡看完这本书，甚至觉得很可惜，故事已经完了，下面再没有了。

下一次黑小子来的时候，彼奇卡立刻向他说：

“带书来了么？”

黑小子笑了。

“怎么，”他说，“喜欢看吗？今天我没给你带书来，下次给你带来吧。我找你有别的事，要紧事。我早就想跟你谈谈。一直在等你病好。现在可以谈了……”

“好吧，”彼奇卡说，自己心里想：“他有什么事情找我呢？”

“你坐。”他说着指指床铺。

黑小子坐下来，直视着彼奇卡的眼睛，说：

“你还记得么，那天夜里……就是你生病以前那一天……半夜里你上哪儿去来着？”

彼奇卡打了个寒战，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大概他的脸也发红了。他说：

“我不记得上哪儿去来着……也许哪儿也没去。怎么啦？”

“因为这样一件事，”黑小子说，“我一五一十都

讲给你听。你知道皮亚塔科夫吧？……”

彼奇卡想了起来，问道：

“就是那个一只眼儿的？”

“对……你还跟他打过架哩。现在皮亚塔科夫已经不在我们这个少年教养院了。你明白么？”

彼奇卡当然不明白。

“那又怎样呢？”他问道。“他不在这里了，又怎样呢？我很高兴……没有人再跟我捣乱了。”

“问题是，这件事怪你。”黑小子说。“由于你的过错，把皮亚塔科夫送到少年犯管教所，送到少年监狱去了。”

“为了什么事？”

“为了木柴的事。”

彼奇卡的脸红得不能再红了。

“什么木柴呀？”他问。自己连看也不敢再看黑小子的眼睛了。

“你自己知道什么木柴……”黑小子说。“不过事情是这样的。皮亚塔科夫早就偷木柴卖。他卖给镇上的小贩。叫人逮住了。头一次只申斥了他一顿。他保证不再偷……可是木柴又出了问题。那天夜里，不知道是谁把五俄丈的木柴翻了个乱七八糟。只有

我知道这件事是谁干的。可是别人全往皮亚塔科夫身上想。就为了这件事，把皮亚塔科夫送到少年犯管教所去了……虽然他并没有犯错误，是你犯了错误……”

黑小子不作声了，彼奇卡也不作声。彼奇卡没有勇气坚决不承认，他只有等着听黑小子跟他说什么。黑小子却这样说：

“你应该承认木柴是你偷的，不是皮亚塔科夫偷的……”

“什么？”彼奇卡说，“怎么说我偷了？我才没偷！……你走开吧！……”

“那你怎么一回事儿？……是拿木柴当筹码玩儿吗？”

彼奇卡简直不知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不能说出表的事情。他只好说：

“我不过是随便把木柴堆给弄乱。是为了撒气。”

黑小子笑了笑，说：

“随你怎么说吧。要真是那样，对你就有利一些。不过不管怎样，反正你总得去承认。”

“谢谢吧！”彼奇卡说，“我去承认，我是傻瓜怎么着？……我可不是傻瓜……”

黑小子说:

“一点也不错。如果不为什么，随便跑去承认，那是傻瓜。不过，如果一个伙伴会因为你而毁掉……难道你能够坑害你的伙伴么？”

“不!”彼奇卡说。彼奇卡的脸涨得通红，他觉得很委屈。“不!”他说，“你不要这样说。卡尔顿的那帮弟兄们全知道我。我不是出卖伙伴的那种人。什么时候我都能为伙伴挺身而出，我不是一个卑鄙的坏蛋……”

“那就好了，”黑小子说，“你到费多尔·伊凡诺维奇那儿去，坦白地承认吧。告诉他，你怎样怎样把木柴弄乱了。你这样作，不会把你怎样的。顶多记过一次。可是你能把皮亚塔科夫给救了。皮亚塔科夫在少年监狱里要完蛋的。你去承认，好吗？”

彼奇卡点点头。

“好吧，”他说，“我去承认。我豁出去了。就是把我关进监狱……我也不怕。”

彼奇卡说瞎话了。黑小子刚一出去，彼奇卡就躺在那儿这样想:

“万一为这件事真把我关进监狱怎么办？这样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切都完了！这意味着：我

再也拿不到那只表了……”

彼奇卡想到这里，不由得心乱如麻。他不知道去找院长好，还是不找好。

他想呀，想呀，最后想出一个主意：

“我还是去吧。因为一个人要毁掉了——这的确很不好。尽管他是个寄生虫，也不好。不管怎样，他是个自己人。”

彼奇卡不慌不忙地穿好衣裳，等鲁多夫·卡雷奇来。

鲁多夫·卡雷奇进来时，彼奇卡说：

“请您许可我去找一下院长。请许可我出去一趟。”

“找他干什么？”鲁多夫·卡雷奇问道。“你找他什么事？有人欺负你？我欺负你？也许我给你吃得太少？”

“不是的，”彼奇卡说，“谢谢您，您把我填的都长膘了。谁也没有欺负我。我是为了一件要紧事，必须找院长谈谈。”

“好吧。”德国人说。“很要紧，那就去吧。时间不要太长……你还得隔离一段时间才能出院。”

彼奇卡叹了口气，说：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再会吧!”

彼奇卡又叹了一口气，就去找院长。

他到院长的家里去找，可是他不在，他到管理处去研究事务去了。

院长家里有个男的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一个大皮包，脚上穿着美国式皮鞋。他也在等院长。他咬着自己的指甲。

彼奇卡站在门外等院长回来。

带大皮包的男人不停地咬着指甲。

“这位叔叔是干什么的?”彼奇卡心想。“他为什么事情来找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大概是合作社派来的人，来算供应食品的帐的。再不然就是个装配工人……”

正想着，院长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回来了。

彼奇卡向他打招呼:

“您好!”

“啊,”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说,“病好了?好吧……好样儿的。”

跟着，他就向穿美国式皮鞋的那个人说:

“您好。有什么事?”

穿美国式皮鞋的人站起来，慢慢吞吞地说：

“您好。我是少年犯管教所派来的。为了皮亚塔科夫的事情。您想想看，昨天夜里，皮亚塔科夫从少年犯管教所里逃跑了。”

彼奇卡的心发抖了。他的脑子里乱得象开了锅似的。下面别人说的话，彼奇卡全没听见。他光琢磨：

“我是承认？还是别承认了？”

这时，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已经在握那只指甲咬残缺了的手，说道：

“您到办公室里去拿材料。好吧。再见。”

接着，他立刻向彼奇卡说：

“那么你有什么事呢？你来找我干什么？说吧……”

彼奇卡红着脸说：

“我找您。您有没有什么小书，借给我一本看看？”

“什么？”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说。“小书？好吧。可以找到的。我有不少书可以借给你看。”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打开书柜子，说：

“挑吧。随便你挑几本。”

彼奇卡在书柜里找了一会儿，挑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书。有大书，也有小书。有带插图的，也有不带插图的。他把这些书抱回病房里去，看了整整一个星期。因为反正闲得无聊。

这样，彼奇卡就没有去坦白自己的过错。他认为这样作没有意义了。但是后来黑小子问他：

“你到费多尔·伊凡诺维奇那儿去过了吗？”

“去过了。”彼奇卡回答。他说着，脸红起来。

“好样儿的，”黑小子说，“你是一个好小伙子。快点复原吧。”

他拍了拍彼奇卡的肩膀。

彼奇卡实在惭愧得不行，只好把身子转过去，朝着窗户。

彼奇卡终于出了病房。

这时也开始上课了。彼奇卡通过简单的考试后，被编入“Б”班。跟小不点儿孩子们在一起。

这当然又丢人，又不愉快。

黑小子和别的孩子都在学分数了，彼奇卡却和小不点儿们一起念什么：

“萨莎在玛莎家里，玛莎在萨莎家里。”

这太难受了。

有一天，彼奇卡走到黑小子跟前（黑小子姓米罗诺夫），说：

“让我转到你们这一班里来，行不行？”

“不行，”米罗诺夫说，“兄弟，这不行。你的程度太差了。不过，如果你很想转班，你可以补补课，把所有的课目都赶上，你就可以升到我们这一班来了。”

“还那么多事儿！”彼奇卡说，“我才不希罕呢……我才不需要你们那些课目呢。见鬼去吧！我不干！”

于是彼奇卡就继续和小不点儿们一块儿来来回回地念：

“萨莎在玛莎家里，玛莎在萨莎家里。”

可想不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倒霉事儿。

对有亲属的孩子们来说，每逢星期六，就象过节一样。在克拉拉·蔡特金少年教养院，星期六是休假日，也是和亲属会面的日子。各式各样的妈妈和爸爸，带了大袋小袋、大包小包来看孩子。包包袋袋里当然尽是好吃的东西——馅饼呀，小面包呀，苹果呀……什么的。

可想而知，没有人来看彼奇卡。连米罗诺夫，还有个姑妈从新契尔卡斯克来看过他两次，每次给了他一个卢布。彼奇卡却连个不象样的远房姑妈或姨妈也没有。

可是这一个星期六，值日生忽然跑过来叫彼奇卡的名字，说：

“有人来看你啦！”

彼奇卡听了笑起来，说：

“去吧。别胡扯了。你骗不了我。”

“真的！”值日生说。他是一年级的弗连凯尔。他说：“我不是胡扯。真有人找你。你自己去瞧吧。”

彼奇卡跳起身来，跑去看。他想：

“简直胡说八道！有谁能来看我呢？！”

他跑进大厅，一看，大厅里挤满了人——各式各样的爸爸妈妈，还有他们的亲生儿女。所有的人都在喜笑颜开地谈话。

彼奇卡站在门口，伸长了脖子，用眼睛四处寻找着。

只见库德雅尔公民颠头簸脑、摇摇晃晃地朝他走了过来。

彼奇卡的脸刷地一下发白了，禁不住向门口退

去。库德雅尔公民却一步步逼了上来，他浑身酒气，隔着老远就可以闻到。

“你好，宝贝儿！”他说。“你好，心肝！……我来了……我找着了……我来看你了！……”

他说着，就伸手要拥抱彼奇卡，自己却东倒西歪的，连站也站不稳了。他身上的酒味儿有多么大，就不用提了……连周围的人都忍不住皱着眉头往四外躲。

彼奇卡苍白个脸，低声问道：

“您找我有什么事？”

“来看看你，”库德雅尔粗声粗气地说，“来看看你！我给你带来了糖果……奶油糖……”

库德雅尔公民把手伸进衣服口袋里去，掏出一个脏得要命的纸包，里面是奶油糖，都化得软塌塌的，滚满了灰尘，粘成了团儿……他塞给彼奇卡，说：

“给你，给你糖果！”

彼奇卡用手一挡，说：

“我不要。请您快走吧。”

他说着，照库德雅尔的前胸轻轻推了一下。这一下子可把库德雅尔惹翻了。

“什么？”他说，“走？你叫我走？你还不还给我

那只表？……该死的小扒手！”

忽然他放开嗓门大叫起来：

“妈妈呀！好心的人们呀！救救命吧！小坏蛋把我给抢了！我的表叫他偷走了。妈——妈呀！”

他把奶油糖向彼奇卡扔了过去，正打中彼奇卡的一只眼睛。

彼奇卡捂着那只眼睛，从大厅里飞奔出去，正和院长撞了个满怀。

“怎么回事儿？”费多尔·伊凡诺维奇问道。“出了什么事情？”

这时候大厅里已经轰动了，人们把库德雅尔团团围了起来。

库德雅尔在撒泼，又推又搡地直着脖子乱喊乱叫：

“妈妈呀！抢了我啦！抢了我啦！……”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急忙走过去问道：

“怎么回事儿？这人是来找谁的？”

“找我。”彼奇卡回答，说着垂下了眼皮。“是来找我的。他是我的伯父。刚从疯人院里出来。下一次请再别放他进来了。”

库德雅尔公民被拖了出去。他又是嚷，又是骂，

两只手乱推一气，不过还是被拖出去了……

从那一天起，彼奇卡变得很忧郁。他开始想表的事情。本来因为忙着念书，他把表给忘了。这回又勾起了这件心事……

他开始常常走到院子里去看木柴。木柴还很多，离藏表那块地方还远着呐。

彼奇卡很愁闷，不断地叹气。不过他还能自己安慰自己。

有时他想：

“堆着木柴，这还没关系。木柴算不了什么。要是在这块地方盖上一所四层楼的话……”

他这样一想，心头就轻松一些了。

天气已经很冷——是秋天了。

有一天，下雪了。雪很大，积雪一下子就深得没膝。整个院子都被白雪覆盖起来，不带铁锹，走也走不过去了。

吃午饭的时候，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走进食堂里来，说：

“孩子们，冬天到了！”

大家都拍起手来，嚷道：

“冬天到了！冬天到了！”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在食堂里来回走了几趟，然后站住说道：

“对的。冬天到了……可是，孩子们，我们的木柴还在院子里呢。你们看应该怎么办？木柴放在露天里可不行，要烂的。要是把它们搬到棚子里去就好了。你们看怎么办好？我们要不要组织一个义务星期六？”

“义务星期六！乌拉！”孩子们嚷着，又拍起手来。

彼奇卡比谁嚷得都欢，拍手也比谁拍得都响。

彼奇卡兴奋得象一团火了。

饭还没吃完，彼奇卡就说：

“走，咱们搬木柴去。”

他说着跳起身来。

“搬木柴去！”孩子们也嚷着。

于是大家都胡乱加上件衣服，就往院里跑去。他们跑过洁白的雪地，走到木柴垛旁，开始搬木柴。他们气喘吁吁地三个人拖一根木柴。这时也是彼奇卡干在最前面……他忙得团团转，还指挥别人。

“排成一行！”他喊道，“一个挨一个，把木柴传着

扔过去!”

孩子们就排成一行，从木柴垛旁，通过院子，一直排到木柴棚门口，——可以说，工作沸腾起来了。木柴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快极了！象机器一样。

这时候，彼奇卡也积极极了，催着大家：

“快一点！加油加油!”

大家都很奇怪，说：

“这小伙子怎么啦？怎么变得这么能干活儿？”

孩子们干得很快，板棚里的木柴越堆越多了。

后来，站在排头的人向另一头的人喊了起来：

“够了！满了。”

彼奇卡慌了神儿，说：

“怎么，满了？”

他跑到板棚门口去一看，果然……板棚里已经堆得满满的，连一根木柴也塞不进去了。

彼奇卡楞住不动了。院子里还满堆着木柴。大约有三十俄丈光景。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不知打哪儿出现了。

“没关系。”他说。“好吧。没关系……这些，我们一个冬天就烧完了。孩子们，谢谢你们!”

他还拍拍彼奇卡的肩膀，说：

“彼恰同志，谢谢你。你干得很好。”

彼奇卡只摆了摆手，就走开了……他觉得很遗憾。

这天晚上，校务委员会召开了一个全校大会，选举管总务的组长。黑小子米罗诺夫站了起来，建议选彼奇卡当组长。

“我是根据这些条件，建议选彼奇卡当组长的。”他说，“这小伙子挺积极，干起活儿来生龙活虎似的。你们大伙儿今天都看见了，搬木柴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活跃。他把这个义务星期六安排得很好。是他组织了这个义务星期六。”

于是通过投票表决，彼奇卡被选举当了组长。

彼奇卡当上了少年教养院管总务的组长。

开始的时候，显得挺滑稽。

彼奇卡身上带着一大串钥匙走来走去，活象个市场上的商人。怀里揣着一个帐本，还有一支用绳子系在身上的化学铅笔。腰里扎着一条围裙……

他这样走来走去的，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些什么。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呢？……

但是后来事情就来了。

事情多得堆了起来，把彼奇卡忙得连喘口气的工夫也没有，奔东奔西，前前后后，——一个少年教养院的家务事还少得了么？

日子不知不觉地一天一天过去了。

彼奇卡老是身上带着一大串钥匙走来走去。

总有孩子跟在他后面嚷：

“彼奇卡·瓦列特，领午饭吃的挂面。”

“彼奇卡·瓦列特，领肥皂。”

“彼奇卡·瓦列特，领衬衣……”

“彼奇卡·瓦列特，领面包……”

“彼奇卡·瓦列特同志，要木柴……”

彼奇卡不断地发给他们一些什么东西，不断地收进来一些什么东西，又不断地拨出去一些什么东西，每次都用化学铅笔在蓝色的帐本里记帐，记呀记的，记个不停……

他变成了一个多么自觉的人，简直叫人忍不住好笑！

发木柴的时候，彼奇卡一点也不心疼。他最乐意发木柴了。

“一捆？……可以。两捆？……那更好了。”



在克拉拉·蔡特金少年教养院，以前从来屋子里没有烧得这样热过。真叫热极了。可以说，“Б”教室不象“Б”教室，而象澡堂里的蒸浴室。

孩子们还在继续念：

“萨莎在玛莎家里，玛莎在萨莎家里。在萨莎家里的是玛莎，在玛莎家里的是萨莎。”

彼奇卡却趴在那个蓝色的帐本上，舔着只剩下一小截的化学铅笔头，一个劲儿冒汗。

“四分之三磅，加上四分之一磅，加上半磅，再加上八分之五磅。一共是多少？”

这是分数，分数是米罗诺夫的“Г”班学习的课程。

于是彼奇卡又找到米罗诺夫，拉住他说：

“我一定得上你们那一班去。简直要命啦……我同意加把劲儿，赶一下所有的功课。请你帮助帮助我吧！”

“好，”米罗诺夫说，“我来帮助你。”

他开始和彼奇卡一块儿用功。彼奇卡进步很快，到了年底，快过新年的时候，彼奇卡的程度已经赶上了“Г”班。

于是他就升到米罗诺夫的“Г”班去了。

哪知又发生了一件倒霉事儿。

这件倒霉事发生在三月里，正是巴黎公社纪念日这一天。

红艳艳的冬日在空中照耀着，积雪在脚下沙沙作响。

这一天，克拉拉·蔡特金少年教养院全院的人都列队到市立公园的烈士公墓去。

孩子们朝气蓬勃地齐步走着，大家笑着，唱着：

> 同志们，勇敢地齐步向前……

彼奇卡也和大家一起唱着，笑着。

当他们快要走到公园门口时，迎面走来一个喝得烂醉的人。他歪歪倒倒地走着，两只手高举在头上，扯着沙哑的喉咙，阴阳怪气地唱道：

> 你这美丽的老妈妈，
> 快快把浪子收——下！……

孩子们一齐大笑，朝那个醉汉扔起雪团来。彼奇卡定睛一看，原来是库德雅尔公民。

他认出是库德雅尔公民，立刻吓了一大跳，急忙

躲在一个伙伴的背后，躬着身子走起来，还用手巴掌遮住脸。

孩子们把醉汉推倒在地，用雪往他的脸上揺。库德雅尔尖声怪叫，来回晃动着红鼻子，破口大骂。

忽然彼奇卡觉得醉汉怪可怜的。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他猛然跳出队伍，嚷了一声：

“同学们！别胡闹了！”

孩子们都不笑了。也不去抓雪了。

可是库德雅尔一眼认出了彼奇卡，竟大声咆哮起来：

“骗子手！偷走了我的表！”

彼奇卡垂头丧气地走着。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不唱歌了。

彼奇卡心里惭愧呀。他惭愧，因为他偷了醉汉的表。他自己都很惊讶：这算个什么鬼名堂？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心里这样惭愧？……真不明白！……

时间仍不停地逝去。春天来了。雪开始融化。随着积雪的消失，院子里的木柴也在减少。

有一天，彼奇卡走到院子里去一看，木柴只剩下

很少一点，——只不过有两俄丈了。

彼奇卡吃了一惊。

“嗬！”他心想，“快了！快该把表挖出来了。”

这一天，彼奇卡在走廊里碰见费多尔·伊凡诺维奇，问他：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春天来了。天暖和了。教室里可以不升火了吧？您说呢？”

“好吧，”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说，“不升火也可以了。”

于是彼奇卡就开始节约木柴。别人来领木柴时，他变得很小器。他光发给厨房木柴。还发给洗衣房木柴。

他数着每一根木柴。大家都觉得奇怪极了。

米罗诺夫的姑妈从新契尔卡斯克给米罗诺夫捎来三个卢布。那时正是复活节前的礼拜日。米罗诺夫向彼奇卡说：

“星期日咱们去逛复活节集市，好吗？去玩玩……”

他们好容易熬到星期日，向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请了假，就欢蹦乱跳地到复活节集市去了。

天气非常暖和。雪已经化得干干净净。集市上的人个个春风满面、欢天喜地，到处推推挤挤，喧喧嚷嚷。还有人在演奏音乐。

前后左右，到处都有人在卖形形色色的甜食——各种各样的姜饼、华福饼干、油酥糖……

米罗诺夫一样买了一点，还请彼奇卡吃。

他们俩就象这样脚踩着烂泥，一直逛到天黑。晚上点灯后，音乐演奏得更起劲了，旋转木马也转了起来。

走到旋转木马附近时，米罗诺夫说：

“咱们也转一会儿，怎么样？”

“不值得。”彼奇卡说。“算了。还不如用这钱买糖豆儿吃呢。”

“糖豆儿也买。”米罗诺夫说。“钱够用……糖豆儿咱们也买。”

“那好吧。”彼奇卡说。“不过咱们得骑马，可别坐小船儿。”

旋转木马停下来时，人们蜂拥过去占位子。等彼奇卡和米罗诺夫跑到前面，所有的木马都被人占上了。只剩下一只四个位子的小船上还有地方。两个位子上坐着两个女孩子，还有两个位子空着。……

“上去！”米罗诺夫说。“反正别处也没有地方了……上去吧！”

没有办法，彼奇卡也爬到小船上去了。

音乐响了起来，小船就飘飘忽忽地前进了。越走越快……越转越急……四面的路灯一闪而过。一张张白脸一闪而过。真棒！

他们两个男孩脱下帽子，拿在手里挥舞着。可对面的女孩却吓得吱喳乱叫。

其中一个火红色头发的女孩子，个儿比较高的，一个劲儿眨巴眼睛；另一个，淡黄色头发，个儿稍矮一点的女孩子，缩在她身旁，直叫唤：

“哎呀！噢呀！”

男孩们觉得很可笑，就逗起女孩来了。

“胆小鬼！”米罗诺夫大声说。

“小兔子！”彼奇卡撩惹她们。

女孩子们也不饶，立刻反唇相讥：

“你们才是小兔子呢！”

一边说，一边还嘻皮笑脸地作鬼脸。

旋转木马停下来了。女孩们跳了下去。男孩们也跳了下去。米罗诺夫向彼奇卡说：

“咱们和她们认识认识，怎么样？”

“什么？”彼奇卡说。

说时迟，那时快，米罗诺夫已经追上了两个女孩，他居然象个成年人似的彬彬有礼地说：

“请允许和你们认识认识，好么？”

火红色头发的女孩眨巴着眼睛说：

“可以！很高兴和你们认识。”

淡黄色头发的女孩不作声。彼奇卡也不作声。

于是他们就四个人一块儿逛集市。四个人分成两对。米罗诺夫和火红色头发的女孩走在前面；彼奇卡和淡黄色头发的女孩跟在后头。米罗诺夫买了一包葵花子，请两个女孩吃。他不断地说话，开各式各样的玩笑。彼奇卡却一声也不响。彼奇卡不知道跟淡黄色头发的女孩说点什么才好。淡黄色头发的女孩显得闷闷不乐，仿佛一肚子心事，光象个鸟似的嗑葵花子吃。

于是彼奇卡就问她：

“您为什么总想心事？您尽想些什么？”

“想各式各样的事。”淡黄色头发的女孩回答。跟着，她笑了笑，问彼奇卡：“您尽想些什么呢？”

彼奇卡回答说，他也想各式各样的事情。后来他问淡黄色头发的女孩，她叫什么名字。

“娜塔莎……”

“我叫彼得。”

往下他们俩的话就多起来了。

娜塔莎甚至变得有说有笑了，连嗑葵花子也嗑得比刚才更欢了。

彼奇卡说：

“娜塔莎，您会滑冰吗？”

“滑冰？……夏天滑冰？哈哈哈！……去年冬天我倒滑过冰……还滑得挺不错哩。我们家附近，就在我们家对过，有个市办滑冰场。”

“您在哪儿住？”

“那边……”

娜塔莎忽然张皇失措了，支支吾吾地说：

“那边……不远……”

她又问彼奇卡：

“您在哪儿住？”

“我吗？”

彼奇卡忽然也张皇失措了，说：

“我吗？我在少年院住。”

“哪个少年院？”

“就是少年教……养院。”

“教养院——是什么意思？”

“一种……特别的……少年院。收神经特别健全的少年。”

“孤儿吗？”

“对啦。父母全没有的孤儿。”

“您是父母全没有的孤儿吗？”

“是的。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连个姑妈姨妈也没有。您呢？”

“我有……父亲。我是说……没有，我是说……有。”

娜塔莎又羞得脸通红。

“这是什么鬼名堂？”彼奇卡心里想。

彼奇卡觉得很奇怪。

他们不知不觉逛到了半夜。光葵花子就嗑了有两磅光景。

天色已经漆黑，灯也熄了，一轮明月挂在空中。

两个女孩这才着起急来，说：

“该回家了。”

她们说了再见，就走了。

彼奇卡和米罗诺夫俩在回少年教养院的路上，不说别的，尽谈论这两个女孩。

“挺好的女孩子。”

他们敲院门敲了很久。“王爷”在围墙里叫了很久，扯得铁链子希里哗啦响。好容易那个吊眼梢的管院子人伊凡把院门打开了。他一边打呵欠，一边骂人。

走过院子的时候，米罗诺夫忽然说：

“瞧！……木柴烧完了！……真好！这回可以打棒球玩了。”

彼奇卡仔细一看，果然木柴已经没有了。院子里从这边围墙到那边围墙整个是空朗朗的。

“真的，”彼奇卡说，“可以打棒球玩了。”

彼奇卡一宵没睡着，光想心事了，光盘算怎么办才好。

第二天清晨，彼奇卡早早地穿好衣服，走到院子里。

天气很凉，下雾了，空中洋溢着泥土的气味。围墙外的杨树上，有几只寒鸦在哇哇地叫。彼奇卡缩着脖子沿围墙走了一趟，两只眼睛盯着一扇扇窗户看。

窗玻璃映出一抹早霞的绯红，象小河里的水似

的闪闪放光。窗内一片静悄悄。

彼奇卡顺围墙走着，他在找他自己插的那根树枝。那根树枝已经没有了。地上到处是树皮、木屑和毛蓬蓬的韧皮。

彼奇卡虽然找不到那根树枝，但是他正确地找到了那块地方。他站在围墙旁，仔细地回想：

“那一天，老师就坐在这儿看书。同学们在那儿玩打木棒游戏。我就是在这儿……”

彼奇卡环视一下周围，然后蹲下，用一个小木片在地上挖起洞来。他挖了一个深达胳膊肘的洞，把手伸进去一掏，——果然在这儿。手指头抓住一个滑溜溜的小包。彼奇卡把小包攥在手里，站起来。他用木屑把洞填平后，就快步走回楼里去。

他坐在走廊里的窗台上，歇了一口气，然后打开包着表的小包。

虽然时间已经过了一年，纯金还没有发乌，在彼奇卡的手心里仍旧是一个小太阳在放光。不过，彼奇卡觉得表变小了，变轻了。变得轻极了，轻极了……简直奇怪。

彼奇卡沉思起来，把身子缩作一团。

他把表贴在耳朵上听听，——不响。他打开表

盖一看，——表停了。

黑色的表针停在七点四十分钟的地方。

忽然彼奇卡心里更怕了。

“这是怎么搞的？”他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过了这么长时间，过了整整一年，可是这只表连一个小时也没有走？”

阳光突然穿进了窗户。彼奇卡吃了一惊，把表塞进衣服口袋。表立刻变沉了。口袋往下坠着，一条腿连迈步都不方便了。

彼奇卡顺着走廊走去。鲁多夫·卡雷奇迎面走来，满面春风的。阳光照在他那雪白的罩衫上。他手里拿着一根火钩子。

“你好！”他说，“早晨好！跟我一块儿升炉子去，好么？不去？”

“不去，”彼奇卡说，“我得到管理处去……去称面包。”

他真的称面包去了。

但是彼奇卡并没有逃走。没有……那是去年夏天，他曾经渴望逃走；可是现在……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

现在彼奇卡脑子里想的完全是另一码事。怎么能逃跑呢?——想想都觉得奇怪。

不过，表还在彼奇卡手里。这件该死的值钱东西在他手里。

为了这只表，就不得不动脑筋，不得不想想情况怎么样，应该怎么办!

彼奇卡把表揣在衣服口袋里，揣了一天，揣了两天，——他不断地想，不断地考虑，怎样处理这只表。

他想把表扔掉，——但是没舍得扔，觉得扔掉怪愚蠢的。最好是还给库德雅尔。可是上哪儿找他去呢?库德雅尔公民以后再没有来过。关于他，一点消息也没有了。

彼奇卡揣着这只可恨的表，心里很痛苦。

到了仲夏，少年教养院决定油漆房顶。

有一天，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把彼奇卡找去，向他说:

“请你到列宁大街上的省油脂产品店去一趟，买点绿油漆来。”

他把钱交给彼奇卡，彼奇卡就到省油脂产品店去了。

彼奇卡走过市场时，想起了往事。他想起了他遇到的各式各样的事：秤砣的事、小面包的事、青鱼的事。

他正想着，想着，忽然听见一声呼哨。人们跑了起来。

一群人在市场里跑，疯狂地喊：

“抓住他！小——偷——！抓住他！……”

彼奇卡也跑起来。这时他才看清楚大家追的那个人是谁。那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这个少年跑着，跑着，一回头，——一只包扎着的眼睛在彼奇卡的眼前一晃。

“皮亚塔科夫！”彼奇卡叫了一声，就撒开腿拚命追了上去。

皮亚塔科夫跑得很快。追他的人群早已远远地落在后头，只有彼奇卡一个人紧跟不放。彼奇卡一面追一面叫：

“皮亚——塔——科——夫！”

他追上了皮亚塔科夫。

他一把抓住皮亚塔科夫的肩膀，说：

“站住！你跑不掉啦！……”

皮亚塔科夫一个闪身，回手照彼奇卡的心窝里

就是一拳。

“傻瓜!”彼奇卡嚷道。“傻瓜！别动手。”

皮亚塔科夫跳到一旁，望着彼奇卡。他浑身哆嗦着。

彼奇卡说：

“你怎么？没认出我来吗？”

“不认识。”皮亚塔科夫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在少年教养院……你记得吗？”

“啊，”皮亚塔科夫说，“记得。饭桶……”

他说完又往前跑。浑身还哆嗦着。

彼奇卡跟在他后头，问他：

“你记得木柴的事么？”

“什么木柴？……记得……那又怎么样？”

皮亚塔科夫继续往前跑。他尽往偏僻的地方跑，光往小巷小胡同里钻……往城外，往市郊区跑。

彼奇卡跟住他不放，叫他：

“皮亚塔科夫!”

“你干什么？”

“皮亚塔科夫，等我一下，别跑了。”

皮亚塔科夫站住了，歇一口气，说：

“嗨……真见鬼……你要干什么？”

“你记得木柴的事么？”

“记得。那又怎么样？”

“你心里委屈么？”

“怎么？”

“原谅我吧！”彼奇卡说，“一切都怪我不好。”

于是彼奇卡就向皮亚塔科夫讲起木柴的事。哪知皮亚塔科夫听了哈哈大笑。他笑得前仰后合，扎在一只眼睛上的布带子都滑到鼻子上来了。

“傻瓜！”他说，“怎么怪你呢？……你要知道，我自己……你要知道，那天夜里，我偷出去十六根木柴，卖给小贩了。”

“你瞎扯！”彼奇卡惊讶地说，“瞎扯……难道真有这种事？……”

“真的。十六根木柴。你以为怎么样？你以为我痛痛快快地改过自新了吗？才不会呢，兄弟，我们这种人用吓唬的办法是制不住的……”

“那么你一点也不觉得委屈？你不愿意到少年教养院去了？”

“少年教养院？”

皮亚塔科夫冷笑起来。他摆出一副自高自大的神气，说：

“兄弟，我已经蹲过监狱了。一个蹲过监狱的人，跟少年教养院的小不点孩子们在一起，是没有事情可作的，明白了吗？”

他用手指头弹了彼奇卡的脑门子一下，就摇摇摆摆地走了。

他摇摇摆摆地走着，忽然又转过身来了。

他转过身，那样脸色苍白、蓬头垢面的，一直朝彼奇卡走来。他那只独眼睛一闪一闪的。

彼奇卡自然心安理得地迎了上去。他感到问心无愧。

“什么事呀？”他问道。

“那个，”皮亚塔科夫说着，向彼奇卡逼近过来。“那个，”他说，“给我表！”

他说着，照准彼奇卡的肩膀就是一拳，说：

“给不给？！”

这一拳打得彼奇卡差一点坐在地上。他弯下身子，踉踉跄跄。围墙、房屋、路灯和皮亚塔科夫那个独眼龙的身影都在他的眼前晃着。他话都说不出来了。

“给不给？”皮亚塔科夫又重复了一遍。“听见了没有？把表拿出来！”

“什——什……”彼奇卡说，“么——么……什——么——表？”

“就是那只表。”皮亚塔科夫说着，忽然弯下身子，俯到彼奇卡的脸跟前，很快很快地低声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想错了！兄弟，我知道，库德雅尔什么都告诉我了……完完全全都告诉我了。我和他一块儿蹲了半年监狱。是的。为了酗酒，现在他还关在监狱里。是的。他什么都告诉我了。我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了解了。给我表。听见没有？”

皮亚塔科夫一只手抓住彼奇卡的前胸，另一只手掐住彼奇卡的脖子，嘶哑着嗓子说：

“听见没有？给我表……要不然……你试试看！”

他的手指头紧掐着彼奇卡的脖子，一只污黑的拳头顶住彼奇卡的干干净净的鼻子。

彼奇卡已经把手伸进衣服口袋里，摸着表，想掏出来给皮亚塔科夫。他甚至急于这样做，恨不得快一点把表交给皮亚塔科夫完事。

但就在这时，只听得一片喊叫声、呼哨声、嘲笑声、脚步声。一个警察从街角飞奔而来。后面跟着一群市场上的妇女。妇女们后面还跟着一群形形色色的人。

“啊哈！”他们大声喊道。“在这儿呐！抓住他！”

他们朝皮亚塔科夫扑了过来，抓住皮亚塔科夫的衣领，扑通一下把他按倒在地。

“小偷！揍他！！！”

彼奇卡勉强脱身逃了出来。

彼奇卡接着往前走，走向省油脂产品店。他再一次穿过市场。擦身经过那些卖小面包和青鱼的一排排小摊。那里洋溢着面粉和蔬菜的气味。但是闷闷不乐的彼奇卡拖着脚步有气无力地走着，无精打采的。他恨恨地捏着口袋里的表，想道：

“天呀！我要这样一个包袱干什么？我把这个倒霉玩艺儿揣在口袋里干什么？！”

周围是一片喧嚣和嘈杂声。阳光普照着整个旧货市场。来来往往的人群，熙熙攘攘，推推挤挤。有人在拉手风琴。笼子里的家禽在咯咯叫着。叫化子扯开喉咙大声唱歌。真是热闹极了！

但是彼奇卡心里不快活。今天连太阳也不能使彼奇卡高兴起来。叫化子也不能引他开心。彼奇卡闷闷不乐地走着。

忽然彼奇卡看见一个女孩子。女孩子站在许多

小货摊的中间，手里举着一件东西。

她正想把那件东西卖给一个戴眼镜的棕黄色头发干瘦老大爷。

彼奇卡认出这是娜塔莎，就是和他一块逛过复活节集市的那个淡黄色头发的娜塔莎。这会儿她正在卖什么东西给那个干瘦老大爷。

彼奇卡一见不由得满心欢喜，甚至喜出望外。他把人群向左右推开，挤到娜塔莎跟前。

戴眼镜的棕黄色头发老大爷正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走开了。

“你好，娜塔莎！”彼奇卡说，“你卖什么？”

娜塔莎看见他时，惊叫了一声，立刻把手藏进口袋。

“你怎么啦？”彼奇卡说。“你干吗大吃一惊？你害怕了吗？你是卖偷来的东西怎么着？……”

“不是。不是偷来的。”娜塔莎说。

“那卖什么呢？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给我瞧瞧。”

“不给你瞧。这关你什么事？”

“给我看看。我好奇。”

“不给你看。”



“啊哈！那一定是偷来的了。你是在澡堂子偷了一把桦条帚？或是偷了八张彩色糖纸？对吧？”

娜塔莎不作声。

“要不然就是扒来了你那去世的老奶奶的袜子？对吧？再不然就是抢了你那老爸爸的什么东西？”

娜塔莎忽然臊得脸通红。她几乎要哭出来了，她说：

“我没抢！他自己叫我来卖的。他给我捎来一封信，叫我卖。喏，你看吧！‘偷来的’！”

娜塔莎把手一直伸到彼奇卡的脸跟前。手心上托着一条表链子。表链子上里里拉拉地挂着一串装饰物，什么小狗呀，小象呀，叮叮当当地响着，中间拖着一个梨形的绿莹莹的绿宝石。

彼奇卡全身摇晃站立不稳，差点摔倒。

他本来已经很累，又被皮亚塔科夫当胸打了一拳，现在他完全惊呆了。他把表链子接过来，久久地端详着。

后来他把手伸进衣袋，掏出那只表来，用不听使唤的手指急促地把表挂在表链子上，递给娜塔莎，说：

“给你。”

娜塔莎惊叫起来，连忙接住表。

彼奇卡却迅速一转身，飞快地从喧闹的市场里跑过去了。他跑过桥，跑过广场，到了大街上。……

他头也不回地跑。

他径直向省油脂产品店跑去，去买绿油漆。

文　件

没有过，亲爱的同志们，我想不起在我的生活之中有过什么壮烈的英雄事迹。我的一生相当平凡，可以说是单调乏味。

我小时候当过牧童，为地主兰得谢夫看守外国种的绵羊。后来，我在尼古拉耶夫城里当木匠。以后在船上工作了一个时期。那条船的名字叫作“十二个圣徒”。革命开始后，我当然参军打仗去了。后来别人教我读书写字。我还做过算术习题。

现在我在管理以布琼尼命名的国营畜牧农场。这些事情我以后再讲给你们听。现在我想讲讲，有一天我在前线遇到一件什么样的无足挂齿的小事情。

那是国内战争时期的事情。当时我在布琼尼骑兵集团军当兵，我们的部队属于札瓦鲁辛同志的特种部队。我的岁数还不大，只有二十四岁。

我们的师团驻扎在一个小村庄——台利村里。

我们的情况不大好：希库罗的军队和马蒙托夫的军队对我们左右夹攻，乌拉加依将军从前面进迫。

我们不得不暂时退却。

记得我有两天没合眼。连腿都迈不动了。左脚上磨出了老茧——那时我的两只脚还都健在。

一天，我正坐在大门口一只小板凳上脱左脚上的皮靴。我一边拉脚上的皮靴，一边想："哎呀，我还怎么走路呢？瞧，磨出了多么大的水泡！"

我这样想着，刚脱下皮靴，从我们的司令部来了一个传令兵。

"特洛菲莫夫！"他叫道。"快！到司令部去！札瓦鲁辛同志有事找你。"

"是！"我说。"呸！"

我马马虎虎缠上包脚布，穿上皮靴，用一只脚蹦到司令部去，心想：

"不象话！人家的脚都走不了路了，还得象个小孩子似的跑！"

"报告！"我说。"您好，政委！您叫我来有什么事情？"

札瓦鲁辛坐在窗台上，数他的军上衣上的钮扣。

他总爱数钮扣，神经质极了。他以前是顿河流域的一个矿工。

“特洛菲莫夫，坐在椅子上。”他说。

“是!”我说。

当然我就坐下了。就坐在那儿，轻轻地抖动着那只脚。

札瓦鲁辛从窗台上下来了，站在那儿，摸着钮扣，说道:

“我说，特洛菲莫夫……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委托你办。请你答应我，如果为了革命需要去死的话，你会去死的。”

我站起身，眯起眼睛，说:

“是！我会去死的。”

“你有精神准备吗？”他说。

我该怎样表示呢？我挺直皮靴筒子，把两个后跟往一起砰地一碰，说:

“是的，我有精神准备。我听候您的吩咐。”

“给你这个。”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文件装在一个很大的纸信封里，信封用硕大的两个火漆印封着口。“给你这个，”他说，“拿着！请你骑马到鲁干斯克的骑兵集团军司令部去一趟，把这封秘

密文件当面交给布琼尼同志。”

“是！”我说。“我当面交给他。”

“不过，特洛菲莫夫，”札瓦鲁辛同志说，“你要知道，我们的情况可不妙。形势坏极了……希库罗的军队和马蒙托夫的军队左右夹攻，乌拉加依的军队从前面进迫。你这个任务是非常危险的。我现在等于叫你去送死。”

“没关系，”我说，“我一定完成任务！服从您的命令。”

“你可能被白匪的枪弹打中；也可能被他们活捉。你可要注意，这份秘密文件是一份无比重要的作战报告。”

“是！”我说。“我不会让这份秘密文件落到他们手里的。我宁可跟它一起烧成灰，也不能让它落到敌人手里。”

“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把它销毁。如果你能够到达鲁干斯克，那就简简单单地口头报告一下作战情况。你就说：希库罗和马蒙托夫左右夹攻，乌拉加依从前面进迫。需要从后面打击乌拉加依，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保住中心，防止零散的哥萨克队伍集中。再报告一下我们部队里有多少战士。敌军的人

比我们多一倍。如果不给我们特别的援助，我们就要全军覆没了。”

“明白了，”我说，“全军覆没。把秘密文件交给我吧，同志……”

我把秘密文件接过来，捏了捏，摸了摸，解开衬衫，把它掖在怀里皮带底下。

“再会，政委！”

“再会，特洛菲莫夫！”他说。“希望你活着回来。”

我跑到门廊上，眯缝起眼睛，把两个鞋后跟往一起一碰，打了个立正。

“哎呀！”我心里想，“但愿那个老茧别把我给坑了。鬼东西！”

我跑到放牧场。我们的军马都在那儿吃草。

我选了一匹最好的军马，它的名字叫尼格罗。这真是一匹好马，是从奥国军队缴获过来的。我装好马鞍，飞身上马，弓身，用鞋后跟踢马，于是飞驰而去。

尼格罗跑得赛过一阵风。

我们顺着公路在一行行菩提树下驰骋。大树喧嚣着，只听见耳朵旁沙沙地响。眼看一分钟就跑了一俄里。我的尼格罗一个劲儿在笑，打着喷鼻，抖着

鬃毛……一副剽悍神气!

我们蹄声得得地跑过一座木桥……

我们拐进了一个毁尽烧光了的村庄……

我们进了一片树林……

树林里光线昏暗，非常潮湿。我不断地向上抬头，寻找太阳，因为根据太阳的方向来认路比较容易一些。每次我一抬头，树枝就抽打在我的脸上。我不得不再弯下腰去伏在尼格罗的鬃毛上。

忽然我们跑出了树林，前面拦着一条河。这是什么河? 真见鬼!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我驱马沿河岸向右奔驰，想找过河的桥，找不到。再驱马转身向左奔驰。还是找不到桥。

这是一条很宽的河，黑乎乎的。以后我才知道，是顿尼茨河。

“咳!”我说。“真糟! 尼格罗，没有办法，往水里跳吧!”

我们慢慢下了陡坡，到了水边。

“往前走呀!”我说，并且用马刺轻轻地踢马，还使劲扯了一下缰绳。

尼格罗就是不动地方。

“往前走呀!”我说。“傻瓜! 你怕水吗? ”

尼格罗站在那儿，身子晃来晃去的，耳朵一翘一翘。

“怎么啦？”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发起脾气来……照它身上就是一鞭子，打了个呼哨，说：

“喂，跑呀！……”

尼格罗一跃而起，扑通一声跳入河水深处。

现在我已经完全搞不清，当时自己怎样及时地把两只脚从脚镫子里拔了出来。总之，等我从水里探出头来的时候，发见只有我一个人浮在水面，旁边，在离我两俄丈远的地方，河水起着一圈圈的波纹，从水底一阵阵汩汩地泛出白色的泡沫。

哎！我多么心疼这匹马！……

我围着那块地方来来回回游了一刻钟光景，一心等待尼格罗浮出水面。但是尼格罗再也没有出来。它淹死了。

我忍不住象个孩子似的大哭一场，然后向河那边岸上游去。

我爬上岸时，浑身湿得象落汤鸡一样。帽子也丢了。皮靴涨得鼓鼓的。穿泡得这么软的皮靴走路倒是好走多了。

我沿着一条羊肠小路向前走去。阳光照在我的左颊上。这说明鲁干斯克应该在靠右一些的地方，在鼻子前面的方向。我朝鼻子的方向走去。我身上渐渐地干了。皮靴也渐渐地干了，缩水了，越变越小，开始挤脚。

忽然，不知打哪儿过来一个人，不是军人，身穿农民的衣服，模样儿怪吓人的。

“大兵老爷，您好!”他一边说，一边龇牙直乐。

我问他:“你笑什么呀? ”

我有一点害怕。因为我毕竟不是在乡村里逛谢肉节的集市。这是在前线上。

他说:

“大兵老爷，因为您特别和气，所以我想笑。”

“和气是什么意思? ”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

“我以前是个人。”他说。“现在我是一条无家可归的野狗。您别看我没有尾巴，没有尾巴，我也是狗……”

“你算了吧!”我说。“你说得准确一些。”

流浪汉纵声大笑，说道:

“你们打死了我的老婆，所以刚才我用石头把你们的哨兵给砸死了。”

“什么？”我说，“把哨兵砸死了？”

我立刻攥住我的勃朗宁手枪。他却一手抓住他自己的脖子，一手撕扯自己身上的衬衣，放开嗓门大嚷：

“开枪吧！开枪吧！马蒙托夫的孝子贤孙！……”

我这才恍然大悟。我头上没有军帽，肩上没有红星，所以这人以为我是个白军匪徒，坏蛋，马蒙托夫的哥萨克。于是我问他：

“谁打死了你的老婆？回答我呀！”

“是你们打死的。”他回答道。“是你们这些好心肠的老爷。你们烧了我的房子，还用刺刀挑死了我的老婆子。谢谢你们……”

他说着忽然屈膝跪下，放声大哭。

“呸！”我心想。“碰上个疯子。拿这样一个疯子有什么办法呢？”

“可怜的人，你快起来！”我说。“你走吧！你搞错了：我不是白匪，我是一个真正的红军战士。”

他站了起来，眼睛直楞楞地望着我。那两只眼睛，真叫我终生难忘。两只悲伤的大眼睛，真的象狗眼睛似的。

“请你快走吧！”我说。

但是他还望着我。

“你快走吧!”我又说。“向前走几步。”

我害怕起来。手里攥着勃朗宁手枪，子弹盒里有六颗子弹，可是心里还是发毛。

那个庄稼汉一声也不吭。我便离开羊肠小道，从他身旁绕了过去，加紧脚步赶路。这时候我脚上的老茧又痛起来了。在我站在那儿跟疯子说话的工夫，我的皮靴已经干透了。

老茧痛得走不了道儿了。我勉勉强强地迈着步子。

忽听得背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回头一看，疯子追上来了。他一面跑，一面嘴里直嚷。

哎，可把我吓坏了。我撒腿就跑，可是又跑不动。我只好停下来，举起手枪，扳动了扳机。

我这一枪当然没有放成。因为当我泡在水里的时候，子弹泡湿了，发不出火来了。

这时候，疯子也站住了，大声喊道:

“老爷同志！别往那边坟堆儿上走。到了坟堆儿那边，您要送命的。”

我没听懂。什么坟堆儿不坟堆儿的？瞎胡扯！我又接着往前走。

我当然不知道，那年月他们把任何一个小山头都叫作坟堆。我偏偏就爬到一座小山上去了。我正往上爬着，突然发见一个骑兵侦察班从山顶上直奔我来了。

我马上看出了这是哪一个军队的侦察班。肩章在阳光下闪烁着。还隐约可以看见库班哥萨克式的平顶羊皮帽，哥萨克马刀，长矛……

尽管我脚上的老茧痛得要命，也不得不拚命跑起来。我跑到灌木丛里，赶紧扔掉勃朗宁手枪，然后急忙伸手去掏我掖在怀里皮带下面的那封给布琼尼同志的秘密文件。

我的妈呀！秘密文件哪儿去了？我的手在光溜溜的肚皮上摸来摸去——肚皮倒还在原处，秘密文件却不见了。真没有了！我把秘密文件给丢了！……

那几匹马已经到了山下，已经可以听见哥萨克的喊声：

“喂！站住！……”

连马打的响鼻我都听见了。连马鼻子的嘘气声我都听见了。可是我没法子逃走。我跑不动。脚上的老茧太痛了，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真愚蠢，怎么撞到他们手里了！呸！愚蠢到了什么地步！

哥萨克们把我包围了，跳下马背，向我猛扑过来。

唉，幸亏那时候我还有两只手。我让他们看了看，我们农村里的人会怎样打架。我照这人牙齿上一拳头，照那人耳朵上一巴掌，可是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对准我的脑袋就是一下子。我摔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不过却没有死。

我恢复知觉时，浑身湿淋淋的。水不知打哪儿哗哗地往我身上浇。我的鼻子里，耳朵里，眼睛里，衣领里全是水。呸！

我大叫起来：

“够了！别胡闹了！”

紧跟着，我看清楚了，自己是躺在井旁边的地上，周围有好几个哥萨克军官……一个哥萨克提着水桶，另一个哥萨克手里举着药瓶子，可能是阿摩尼亚水……

他们都弯腰俯在我上面，满脸兴高采烈的样子……还用大皮鞋踢我。

“啊哈！”他们说。“活了！”

“动弹了!”

“喘气了，瞧这副布尔什维克的嘴脸!”

“站起来!”他们命令道。

我站了起来。对我说来，躺着，站着，还是坐在椅子上，反正都一样。我站在那儿，浑身湿透了，直滴答水。

“怎么样? ”他们说。“把他送哪儿去? ”

“跟他还客气什么?”他们说。“把这个坏蛋直接押到司令部去。”

我被押送到司令部。我一边走，一边从我身上往下滴答水。我心里甭提多不高兴了,心想:“彼恰·特洛菲莫夫，你这辈子算完了。你这是走最后几步路了。”

这最后的几步路还真难走。同志们，当时我脚上的老茧真要我的命了。走一步，痛一下，好象在咬我似的。又好象用老虎钳子夹我似的。哎! 多么不好走呀!

“是啊,”我心想,“好彼恰! 你也算游逛够了。得了。你的老茧再痛不了多久了。半个钟头以后，他们就要枪毙你这个布琼尼的战士彼恰·特洛菲莫夫了!”

“哎！……还布琼尼的战士呢！”我心想。“简直象个老娘儿们！大笨蛋！……把秘密文件给丢了！想想看：一个布琼尼的战士竟把秘密文件给丢了！……”

“唉呀！”我又转念想道。“难道我真把它给弄丢了吗？难道我真有那么马虎？不可能呀！不可能丢。我没有权利丢……”

我偷偷地在自己身上来回摸着。一面一瘸一拐地走着，一面小心翼翼地伸手在怀里掏着，裤子里也找过了，两胁也拍过了。哪儿也找不到秘密文件。找不到就算了吧！这还应该说是万幸。如果身上带着秘密文件，情况就更糟了。象现在这样，死也轻松一些。因为我军的秘密文件总算没有落在马蒙托夫的手里。我的良心上是平安的……

“站住！”押送我的白匪说。“布尔什维克，站住！到司令部了。”

我们走上一道楼梯，朝司令部走去。我们先走进一个门堂，然后进入一间黑咕隆咚的屋子。白匪向我说：

“你等一下，我们去报告值班的军官。”

“好吧！”我说。“去报告吧。”

两个哥萨克走了，留下两个哥萨克看守我。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向他们说：

“同志们！不管怎样，咱们几个也是弟兄。不管怎么说，咱们也是老乡。是在一块土地上长大的孩子。你们怎么想呢？我说，二位老乡，请你们设身处地地想想我的处境。同志们，请你们许可我在临死以前脱下皮靴，让我的脚松快松快！我脚上的老茧痛得什么似的。”

一个哥萨克说：

“我们可不是你的同志。坏蛋！把俄国出卖了，还老茧痛呢。不要紧，有老茧，也照样可以放你进天堂。忍耐一会儿吧！”

另一个哥萨克说：

“这有什么舍不得的？就让他脱下鞋来松快松快脚吧。好吧，老乡，你就脱吧！”

我连忙坐到墙角里一条板凳上，拿出吃奶的力气脱靴子。好容易揪下去一只靴子，再去揪第二只……哎，他妈的，光脚丫子，活动活动脚指头有多么美，多么舒服！我用手抚摸着脚丫子，满意得把眼睛都眯缝起来了。真不想再穿上皮靴。

我坐在黑咕隆咚的墙角里板凳上，搔着脚后

跟。这时候盘旋在我的脑海里的，已经完全是另外一些想法了。尽想好事。

“怎么样?”我心想。“弟兄们，我的情况也不算太坏啊！谁能够逮捕我呢？我干了什么事情？我是红军战士么？我身上并没有写着我是红军战士。没有红星肩章，也没有证件。还不知道为了什么可以枪毙我哩。同志们，还得有一番争论呢！……”

没等我搔够脚后跟，门开了，有人大喝一声：

“把俘虏带上来!”

“喂，俘虏，快穿上鞋!”押送我的哥萨克说。

我赶紧穿鞋。先将右脚的包脚布整整齐齐缠上，穿上右脚的皮靴。再缠左脚的包脚布。

我一拿起那条包脚布。忽然间——这是什么东西？我把包脚布攥在手里一捏，觉得包脚布里有一件多余的东西。纸的。是秘密文件。我的妈呀!

秘密文件当然也湿透了，搓弄得破破烂烂的……压成团儿了，变得象块抹布似的。原来它顺着裤腿掉进了皮靴，卡在皮靴里了。

我可拿它怎么办呢?

把它扔了吗?扔在板凳底下？对吗?扔在那儿,会被他们发见的。等他们扫地的时候，就会发见。不

费吹灰之力。

我把秘密文件捏成小团儿，摸着黑儿悄悄塞进口袋里。然后迅速穿好皮靴，站了起来，说:

“穿好了。”

“走吧!”他们说。

我们进了司令部的办公室。

一个军官坐在桌前。没什么。那副嘴脸还挺讨人喜欢的。年纪轻轻的，淡黄色头发。他毫无恶意地望着我。

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块石头。你们明白吗? 一块大鹅卵石。军官笑咪咪地用手摸摸它。

我不由自主地也瞧瞧这块石头。

“怎么? ”军官说。“你认识这块石头? ”

“什么? ”我说。

“是的。”他说。“就是这玩艺儿。这块小石头。”

“不认识。”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它。”

“真的? ”他说。“真不认识? ”

“我一辈子也没跟石头打过交道。”我说。“我是个木匠。我一点也不明白，我干了什么对你们不好的事情。你们逮我干什么呢? 我不过是个木匠。我在小路上走着走着……您明白吗? 忽然……”

“啊哈！”他说。“忽然看见路上站着一个哨兵。对吧？于是木匠就捡起一块石头——就是这块石头，砸在哨兵头上……用石头砸的！”

他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地吼叫起来：

“坏蛋！我不容许你愚弄我！我要拴着你的鼻子把你吊起来！我把你烧死！我用鞭子抽你！……”

“呸！你这个魔鬼……”我心想，“还想用鞭子抽我？！”

“咳，你抽不成的。”我说。“说不定我先把你的两条腿打断！你这个娇生惯养的吃奶娃娃！象你这样的家伙，我已经打了一年半了。明白吗？你这个烂蛋黄酱！”

这几句话准是魔鬼指使我说的！再说，烂蛋黄酱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根本扯不到一块儿去。

他却气得低声咆哮，走过来冲着我的脸怒喝道：

“啊！你是布尔什维克？是同志？是莫斯科派来的奸细？原来如此！好极了！……来人啊！”他大声命令他的哥萨克们。“把他交给你们。把这个坏蛋搜一遍，从头到脚仔细搜！”

可了不得！我当时就打起哆嗦来了。我匆忙往后一闪，眯起眼睛，用力捏紧两个拳头，把指甲都掐

到手心里去了。

幸亏我走运，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门开了，一个青年军官气急败坏地跑进来嚷道：

“各位！各位！对不起，打断了你们……将军来了！”

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脸色煞白。审我的那个淡黄色头发的军官也跳起身来，面无人色。

“哎呀！”他说。“怎么？我的爹呀！……立正！”他扯开喉咙大声喊道。“快派出岗哨！马上都到外面去欢迎长官！快！”

于是他们统统向门外跑去。

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一个穿英国皮鞋的哥萨克看守我。这正是那个对我产生恻隐之心、许可我脱鞋的人。你们还记得他吗？

他站在门口，把枪拿在手里摆弄着，两只眼睛盯着我的脸。他的眼神真叫人猜不透。好象在笑？再不然就是害怕？也许他心里害怕？是怕我逃走吧？

我搞不清。我也没有工夫去分析。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秘密文件，心想：

“这是最后一个难题：怎么处理这封秘密文件？必须销毁。可是怎样销毁？用什么办法销毁？不能

扔掉。理所当然。也不能撕碎它。不行！撕碎了，以后这群恶鬼还能一块块把它拼起来的。不成，得想个好办法。”

我站在那儿，手里紧紧地攥着秘密文件，两眼盯着看守我的那个人。那人还是面带笑容——真的面带笑容！我再一瞅他，他还是面带笑容。那是一种很可疑的笑容。也许是同情，也说不定是嘲笑。真难理解！何况他还不断地摆弄着手里的步枪。

我心里想：“再不然，听天由命，索性把秘密文件交给他，怎么样？我就跟他说：朋友，请你拿去给藏起来。”

但又转念一想：“不行，不行，绝对不行。这人毕竟可疑，非常可疑。”

那么，弟兄们，我把这秘密文件藏哪儿呢？！

我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

我想：“咳！有什么可考虑的？干脆把它吃下去算了！”——你们明白吗？把它吃到肚子里去。

于是我马上从口袋里掏出秘密文件。当然那已经完全不象什么文件了，还什么秘密文件呀！也不过是沉甸甸的一大团烂纸罢了，活象个圆面包似的。又象纸做的馅饼。

我想："哎呀，我的妈呀！我怎么吃呢？从哪一头开始咬好？"

我踌躇起来。怎么说，我也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情。这毕竟是一团纸，不是面包。更不是杏仁冻呀。

我再瞅瞅看守我的那个人。

他还在笑。你们明白吗？那个白匪，还在笑！……

我心想："你怎么？！你在笑啊？"

我作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故意跟他别扭似的，把秘密文件举到嘴边，咬下了头一口，含在嘴里，慢慢地咀嚼起来。我开始吃秘密文件。

我毫无顾虑地吃了起来，甚至还吧哒着嘴唇。

怎么跟你们说呢？因为不习惯，我当然觉得不大好吃。还什么好吃不好吃。简直直打恶心，咽不下去。主要是没有盐，没有东西就着吃，就那么干嚼。

这时，我的看守不再笑了，也不摆弄步枪了。他板起面孔注视着我。后来他忽然开口了，悄没声儿地向我说：

"喂！祝你吃得饱，吃得香！"

我心里奇怪极了。这是怎么回事儿？我甚至停止了咀嚼。

这时窗外大街上的欢呼声响成一片，跟狗叫一样：

“乌拉……乌拉！乌拉！”

好象驰来了一辆四轮马车。响起了丁零丁零的铃铛声。我还没来得及吃惊，就从门厅里传来了嗥叫和枪托互相碰撞的声音。我的看守作出立正的姿势，在门口直挺挺地站着不动了。我也吓了一跳，慌里慌张地把我那块白色的“馅饼”捏紧了，整个塞在嘴里，好不容易才把嘴巴闭上。

我站在那儿，喘不上气来，也咽不下去吐沫。

门开处，一群人蜂拥而入。

走在最前面的是将军，那是一个彪形大汉，两只眼睛往上吊着，活象个头戴毛皮高帽的大狗熊。他身上挂的马刀铿锵作响。后面跟了一群军官、文牍员、传令兵，跑来跑去的，忙作一团，抢着给将军端椅子。尤其司令部的那个值班的军官，更显得忙手忙脚的。他在他的将军面前百般讨好，满脸阿谀奉承的样子。

“请将军大人原谅。”他说道。“我们怎么也想不到您会来。我们以为您正在叶列诺甫卡附近指挥战役。”

“是的，”将军说，“一点也不错。叶列诺甫卡附近的战役已经完成了。打退了红军。我军靠上帝保佑拿下了斯拉维诺谢尔斯克，目前正通过奥尔霍瓦，向鲁干斯克进攻。”

他走到墙边，那面墙上挂着一幅作战地图。他用手指头指着，说明他们的部队向什么地方进军和进军的目的。

他忽然一眼瞧见了我，说：

“这人是谁呀？”

“大人，这是俘虏。”他们说。“半个钟头以前，他用一块石头砸死了我们的哨兵。我们的骑兵侦察队在村外把他逮住的。”

“啊哈！”将军说着向我走过来。他发出了两次咬牙切齿声，然后说道：

“啊哈！我的安琪儿！叫我们逮住了？你睡迷糊了，是不是？审问过了吗？”

“还没有呢。”他们回答。“还没来得及审问。”

“身上搜过了吗？”

同志们！我简直吓得呆若木鸡了。我把牙关咬得紧紧的，心想：哎，说的对呀！我的安琪儿，的确是睡迷糊了。

谁也不说话，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光耸肩膀。意思说：不清楚。我们不知道。

这当口，我的老乡，就是脚穿英国皮鞋的那个哥萨克，挺身出来说：

“大人，是的，搜过了。”

“什么时候？”

“刚才，”他说，“他昏迷不醒躺在那儿的时候搜的。在井旁边。”

“怎么？”将军说。“什么也没找到？”

“不，”他说，“找到了。”

“找到了什么？”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找到一根带子。”

“什么样的带子？”

“嗒。”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带子。老实说，我有生以来也没见过这根带子。一根普普通通的亚麻布带子，一般用来系树皮鞋用的。不过，这的的确确不是我的！……

“不错，”将军说，“这根带子很可疑。这是你的吗？”他问我。

我把头转了转，摇了摇，却没法说不是我的，因为我的嘴里有东西，张不开嘴。

这时候，那个哥萨克又出来解围了。

他说："大人，这根带子并不是什么危险品。这不过是一根木匠用的带子。当地的木匠用各式各样的代用品代替尺量东西。"

"木匠？"将军说。"那么，你是木匠？"

我扬扬头，又点点头，却没法说：对，我当然是木匠，因为我的嘴里有东西，张不开嘴。

"怎么？"将军说。"他是哑巴？"

"不是哑巴。"军官说。"大人，应该向您报告，五分钟以前，这个哑巴还在这儿满口雌黄，为了他说的那些话，就是把他绞死，都不够。而且他还侮辱了我个人。"

"是这样啊，"将军说，"好极了。给我一把椅子，我来审问他。"

将军坐到椅子上，把胳膊支在马刀上，说道：

"我跟你说清楚：如果你不立刻回答我，你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那就叫你靠墙站着。不通过法院，不经过法庭审判，就枪毙你。明白了？"

我当然明白了。这种事有什么可不明白的？明白了。叫我靠墙站着。不通过法院，不经过法庭审判，就枪毙我。

我不吭声。

将军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如果你是布尔什维克派来的奸细，那你就告诉我你们部队的名称，步兵或者骑兵的数量，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如果你是当地的一个木匠，告诉我，你住在哪一个村儿里。”

听见了吗？得告诉他哪一个村儿。哎！……

我心想：“你们知道我是哪一个村儿的。坟地省，坟墓县，棺材村。”

我本来想这样跟他说，可是说不出来，因为嘴堵着呐。我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死了以后，可不能张嘴！一张嘴，秘密文件就掉出去了。那可不得了！”

“不对，”将军说，“显然这是一个军事委员之类的人物，善于回避回答问题。这种人，就是把他自己的舌头咬掉，也不肯说什么的。不过……我有我的决心。你们用通条试试看吧。明白吗？什么时候他想说话了，就把他带到我屋里来。现在我得喝茶去了……”

“不过，当心一点，不要把他打死。”将军又说。“我们任何时候都来得及枪毙他。我们先得问出他

的话来。明白了吗？”

“是，大人。”他们说。“我们狠狠地打他，可是不打死。”

将军喝茶去了。我被带到邻室里去。他们命令我脱下裤子。

“木匠，”他们说，“把你的工作服脱下来！”

我就开始脱工作服，也就是我那条宝贵的布琼尼军队的马裤。

我当然不慌不忙地脱。一个人如果明明知道他脱裤子是为了挨揍，还急急忙忙地脱，那未免也太可笑了。

我慢慢吞吞、迟迟疑疑地解开大大小小的扣子，心里想：“情况很不妙。他们打我的时候，我可能会嚷起来。一嚷，秘密文件准从嘴里掉出来。所以我绝对不能嚷。我一定得闭紧嘴巴。”

这工夫白匪们已经在屋子中间摆好一条板凳，在板凳上铺了一件军大衣，说：

“躺下！”

他们拧下枪上的通条，还往通条上抹了一点什么液体，也许是醋，也许是盐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躺到板凳上。

我肚皮朝下背朝上躺着，光着脊背。我记得，当时立刻有一只苍蝇落在我的背上了。我还记得，我没有把它赶走。它搔了搔我的背，就飞走了。

他们用通条照我的背上抽了一下。

我毫无反应，只把牙关咬得更紧了，心里想："千万不能嚷！只要不嚷出来，就谢天谢地了！"

我嘴里的秘密文件已经泡烂了，我悄悄地开始一点一点往肚子里咽。他们每抽我一下，我不嚷，也不哼哼，而是拚命地咽下一口秘密文件。我一声也不响。痛当然是很痛的。他们狠狠地抽我，残酷无情地抽我……他们抽我的背，抽我的腰和臀部，抽我的两肋，抽我的腿，总之，向我的浑身上下乱抽一通。

我痛极了。可是我一声也不响。

军官们觉得很奇怪。

"真是个怪物，"他们说，"少见的人物！好家伙！……弟兄们，揍呀！……揍他个半死。早晚能叫他开口！这个坏蛋，会唱起来的！……"

于是他们又玩儿命抽我，把通条抡得呼呼直响。

一下！

又一下!

又一下!

我把脑袋从板凳上垂下去，咬紧牙关，一声也不响，一句话也不说。

“不行,”军官说,“这样不行啊。他究竟干了什么事情? 也许他真的示威性地咬掉了自己的舌头? ……喂! 停一停! ……”

他们停下手来，一个个累得呼哧呼哧地喘。可怜虫们，累成这个样子了。

“我说,木匠!”军官说。“你到底回答不回答我? 说呀!”

我这个傻瓜居然回答他:

“不说!”

这样一来，我的牙关可打开了，嘴也张开了。一件东西从我的嘴里掉了出去，吧哒一声落在地板上。

没什么可说的，这一来可真把我给吓坏了。

“喂,”军官说,“从他嘴里掉出一个什么东西? 柯罗列夫，你快瞧瞧!”

柯罗列夫走到跟前去，瞧了瞧，说:

“大人，他的舌头……”

“什么？”军官说。“你说什么？舌头？！”

“一点也不错，”柯罗列夫说，“大人，地板上有一个舌头。”

我吓了一大哆嗦，心想：“老天爷呀！难道说，我真把舌头跟秘密文件一块儿嚼烂了吗？”

我把自己的舌头在嘴里转了几圈，一点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是不是舌头？嘴里简直一塌糊涂，又苦又涩，有墨水味，有火漆味，有血腥味……

我再定睛看看地板上，那里还真的躺着一个舌头。一个普通的湿淋淋的鲜红的舌头。舌头上落了一只苍蝇。你们知道当时我心里有多委屈吗？

同志们！是舌头呀！不是别人的舌头，而是我自己的舌头！主要是上面还落了一只苍蝇。你们想象得出来吗？苍蝇叮在我的舌头上，可是我没办法把它撵走！

哎呀，我心里委屈得什么似的，我憋不住哭起来了。真的，我象个小孩子似的哭起来了……我就躺在军大衣上呜呜地哭。

白匪们围着我站在那儿，都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终于军官开了腔，说道：

“柯罗列夫，你给弄走吧！”

“是。”柯罗列夫说。“把谁弄走？”

“把舌头弄走呗！傻蛋！你听不懂吗？”

“唉！”我心想，“我才不干呢！你们拿我寻开心！我可不容许你们拿我的舌头开玩笑！”

我匆忙把眼泪连同我嘴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起咽下肚，抢过那个舌头，就往嘴里一塞。

这下子，差一点把牙都给撞掉。

我的妈呀！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舌头。硬得要命，简直象块石头，不象舌头……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该死！”我心想。“赶情不是舌头。是火漆。”你们明白吗？是札瓦鲁辛同志——就是我们的政委——的火漆印。

嗬！我心里马上好笑得什么似的！

我用牙咬碎了这个火漆制的舌头，悄悄地吞到肚里去了。

我仍旧躺着不动。我觉得太可笑了。

我的后背痛得火燎似的，浑身的骨头也都痛得不行。可是我几乎要笑出声来了。你们猜我笑什么？

我笑白匪们被我的舌头吓成那个德行！这回将军可不饶他们了。将军怎么吩咐他们来着？他命令他们把我完整地押送到他屋里去。可是他们呢？……

军官抱着脑袋直发愁。

“哎!”他说。“咳！真不可想象！……他干了什么事呀？他把他自己的舌头给吃了！你们明白吗？他销毁了他自己的舌头！我的天呀！真卑鄙!”

他这回改变态度，向我说:

“兄弟！你怎么啦？啊？你哭什么？”

其实我已经不哭了。我在乐。

“啊?”他说。“也许你躺得不舒服？那你言语一声。可以给你拿个枕头来。你要枕头吗？说呀!”

我回答他:

“没……没……背……背……”

“什么？”他说。

我说:

“背……背……”

我一面说，一面摇头。你们明白吗？我假装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哑巴。

“果然如此。”军官说。“他把他自己的舌头给吃了。弟兄们，快把他送到医疗站的医生那儿去。也

许还可以想想办法。也许他还没有把整个舌头咬下去。也许还能缝上。”

“穿上衣服!”他说。

自匪们七手八脚地帮我穿衣服。他们给我披上军大衣，又替我扣扣子，就好象我是个小孩子，自己不会穿衣裳似的。可是我把他们统统推开了，自己穿上衣服，自己扣上扣子，用自己的脚站了起来。

当然，我所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摸摸自己的后背。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呀。

怎么跟你们说呢?我觉得后背怪痒痒的。整个后背火辣辣、粘搭搭的。腿也是那样。两只脚几乎站不稳了。哎呀，腿都成了什么样子的呀!

“得了，走吧!”他们说。

我们就出去了，来到一块空地上。军官跟在我旁边走着。你们猜怎么着?——那个穿英国皮鞋的哥萨克也跟着。他姓翟科夫。

军官说:

“我说，翟科夫!请你快把他送到医疗站去。我随后就到。我得去向将军大人报告一下。”

他用手提着他那把骑兵用的大马刀，三步并作两步的跑了。

我和翟科夫两人穿过那块空地。我在前头，翟科夫在后头。

他端着步枪，默不作声。

我却开口了：

“我说，老乡……”

他回答我：

“住口！”

我说：

“兄弟，你算了吧！……”

他说：

“不许你说话！老老实实地！”

这个白匪多怪呀！

我不再跟他说话了，默默地往前走。

我一瘸一瘸地走着，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心想，这回我可完了。说什么也没救了。

你们想想看，我还有什么办法呢？逃走么？后面有人端枪跟着我。反正逃不掉的。

我的情况真糟糕！太糟糕了！只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就是我把秘密文件吞到肚里去了。这还算不错！不管怎样，我临死以前良心上是说得过去的。

我们来到了医疗站。或者说，救护所，诊疗所。

我不知道应该称它是什么。

反正那是一座小小的木头房子。门口有几磴台阶。有一扇敞开的窗户。台阶上和窗下的土院墙上都坐满了人，在等候看病。

一个病人，一只胳膊用雪白的布带子吊在脖子上，晃来晃去的。另一个病人的脚上缠着绷带。第三个人用手捂着腮帮子，可能是牙疼。第四个人一个劲儿摸自己脖子上的什么伤口。第五个人不知道是瞧什么病，坐在那儿抽闷烟。

那些人正在议论什么，谈什么，有的笑，有的骂……

押送我的那个哥萨克说：

“弟兄们，你们好！”

别人回答他：

“你好！你怎么不挨个儿？坐下，你是十四号。”

他说：

“我们不挨个儿。我们的情况严重紧急。”

“从司令部来？”

“是的，”他说。“你们瞧，这个委员有病了。”

“嗬！”他们说。“什么病呀？”

“牙疼。”他说。“他临死之前，打算镶个特殊的

金牙。”

“真了不起!”他们说。

那些恶鬼们咯咯地笑，拿我寻开心哩。翟科夫也咯咯地笑，说了许多逗乐子的话。

“我说，委员，趁着军官老爷去找将军大人的工夫，你坐下歇一会儿，别客气!”

我客气什么呀。我没坐下，我靠在门口台阶的柱子上站着，闷不开口，根本不去理会那些坏家伙们。

我心想:“他们愿意高兴，就让他们高兴去吧。这有什么舍不得的?都是病人嘛，怪无聊的。”

他们说些什么嘲笑我的话，我连听也不去听。我一心欣赏大自然。

多么美的大自然!我从来没看见过这么美的大自然。真的!连我们村儿里都没有这样的花园和这样茂盛的大树。空气多么清新!洋溢着苹果的香味。天空那么蓝，比亚速夫海还要蓝!我恨不得欣赏一辈子!

不过，我这辈子还能活多久呢?活不了多久了。现在得赶快欣赏，以后想欣赏也欣赏不了啦。我简直欣赏得入了迷，扬着脑袋，凝望着天空。

这时候，那位军官老爷拖着他的大马刀跑过来了。他头发蓬乱，面孔通红，无精打采，好象刚挨了一顿骂似的。他向我说：

“啊！你咬舌头？你咬舌头，咬完了，叫别人替你负责任？是吗？真不是东西！……”

他扬起手来，叭！给我一个大耳光。

我一声也没吭，只咬紧牙关，照准他的头顶就是一拳头捶了下去。

嗬！他立刻敞开嗓门干嚎起来，又是哼哼，又是嚷：

“枪……毙……他！……”

我又使劲捶了他一拳头——嗵！

哼！他象个小孩子似的在台阶旁边蹲了下来。

病人们当然当场抓住了我，捆起我的双手，把手枪戳在我的太阳穴上，扭住我不放。我也不挣扎。反正挣扎也没有用。我不声不响地站在那儿。军官站起来，扶正了自己的军帽，说道：

“先别枪毙他。”

他说完这句话，身子一阵摇晃，闭上两眼，说：

“哎呀……我不行啦……”

病人们忙不迭又把他架到台阶上坐下，每个人

用一件东西在他的脸前面扇起来——有的人用一块破布扇，有的人用一根树枝扇，有的人干脆就用他那缠着绷带的“爪子”扇，抢着问他：

“大人，怎么样？好些了吗？”

“不行，”军官说，“不好受。”

于是他们又扇了一会儿，又问他：

“好了吗？”

“好了。”军官说。“谢谢你们……好样儿的弟兄们！”

那群坏家伙回答他说：

“大人，我们愿意为您效劳！”

又说：

“怎么样？可以枪毙他了吧？”

“不能枪毙。”军官说着站了起来。“不能枪毙。不管我觉得怎样遗憾，也不能立刻枪毙他。得先让医生给他瞧瞧。呆会儿再枪毙也不晚。半个钟头以后，我要拿这小子显显身手的。我亲自来。不过现在得先给他治病……我说，翟科夫，你快带他到医生那儿去。我随后就到。”

你们明白吗？他心里害怕！他不敢挨着我走。连有翟科夫陪着，他都不敢……

“再找一个人……”他说。“费拉托夫，你一块儿去，你带着手枪呢。”

翟科夫用枪托推了我一下，大嚷一声：

“走！快！”

我上了楼梯，走进一间小小的更衣室。

更衣室里的空气别提有多么恶浊了。还有一股臭烘烘的石碳酸味。到处乱丢着玻璃瓶瓶，洋铁罐罐。到处都是灰尘，泥土，别提有多么脏了。

墙壁黑糊糊的。靠着一面墙，摆着一条木板凳。墙上的挂衣架上挂着几件军大衣，还有军帽和带肩章的制服。

我把这些全看清楚了，因为我在更衣室里呆了整整一分钟，那个军官才走上楼来。他又不好受了，又让别人给他用桦树枝扇了半天。

他一上楼来，就说：

“你们站在这儿干什么？快去找医生！快！”

翟科夫又用枪托推我一下。费拉托夫打开一扇门，我们便走进医生的诊疗室里。

这位医生的模样儿也真可笑，简直是一个小老头子，皮肤白白的，个子小小的，他矮小到什么程度呢？矮小到两条腿在白大褂里直绊跟头。他面前站

着一个五大三粗的大汉，光着上半身，挺着胸脯，拚命深呼吸，活象一个大力士。医生正用听诊器给他听胸部。

我们进去时，医生说：

“进来以前应该先敲敲门。”

后来他一抬眼，看见了司令部的军官，马上把态度一变，说：

“对不起，少尉先生。我还以为是病人不挨个儿闯进来了呢。”

“不是的，”军官说，“您搞错了。我们有一件十万火急的事情找您。请您快点瞧瞧这个病人，帮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

“好的，”医生说，“很愿意效劳。”

他赶紧给那个大力士敲了几下，这里那里抹了点碘酒，就让他走了。自己走到洗手盆前，往手上抹肥皂，嘴里说着：

“听候您的吩咐。”

“您看见这个人了吗？”军官说。“几分钟以前，这人示威性地咬掉了他的舌头。”

“好家伙！”医生说。

跟着又说：

“请问，是怎么咬掉的？……整个咬掉了？还是咬掉一部分？”

“不知道，”军官说，“也许是一部分。不过，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我们还需要审问他。所以您能不能采用科学的办法，叫他在临死以前哪怕说出几句话来？”

“试试看吧！”医生说。

他一边用水冲手，一边说：

“试试看吧，这不难。不过，我不得不告诉您，根据我们的科学，一个人如果没有舌头了，那就说不出话来了。当然可以试一试。这不难。不过，从科学角度，我不能向您保证会有什么效果。试试看吧，试试看吧。如果……”

“好吧！”军官说。“您试一试吧。不过，大夫，您能不能快一点？哪怕稍微快一点？”

“可以，”医生说，“为什么不可以呢？也可以快一点……”

他开始用手巾擦手指头。擦完一个手指头，瞧一会儿，打量一会儿，欣赏一会儿，再擦第二个手指头。然后再擦第三个手指头，第四个手指头。就这样慢慢吞吞地擦。

军官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完全沉不住气了，连两只皮靴上的马刺都碰得叮当直响。

医生却满不在乎，继续慢慢吞吞地擦手指头，嘴里还哼哼呀呀的。

最后，他终于走到我面前，说道：

“年轻人……张嘴。”

我真不想张嘴，但是又转念一想：“张嘴就张嘴吧……这有什么？……”我就把嘴张开了。

“张大一点。”他说。“再张大一点！……”

我能张多大，就把嘴张多大。

“再张大一点。”他说。

这回，我把我的血盆大口一直张到耳朵边上了。

“行了。”他说。“好了。谢谢。”

他仔细看了我的嘴里，还用他那几个洗得干干净净的手指头在我的嘴里掏了一阵子，说道：

“不对吧，舌头好好地长在原来的地方。”

“怎么？”军官说。“这不可能！”

医生说：“我保证舌头一点问题也没有，不过舌头是蓝色的。”

“不可能，您搞错了。我亲眼看见他咬掉舌头的。”

“那您自己看看吧。”医生说。

医生让他看我的嘴里。明明舌头好好地在原来的地方动弹着。

哎呀，我的妈！军官惊讶得什么似的，两只眼睛都翻到脑门上去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怎么可能呢？难道说他有两个舌头？”

“不是的，”医生说，“他未必有两个舌头……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舌头。这不符合科学道理。我虽然不打算从科学角度来说明这个事实，可是不管怎样，反正舌头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呸！”军官说。“这么说，是我受他骗了？这么说，他能说话？这么说，你这个坏蛋会说话？”

“是的，”我说，“我会说话。”

于是我就向他说了一句气人的话。对不起，这句话叫人听了足够气得从椅子上摔下来。

你们猜他怎么着？他恼了吗？你们以为他立刻对我大嚷大叫，或者动手打我了吗？根本没有。他笑起来了。他高兴得什么似的。就好象有谁送了他二十五个卢布一样。

“啊！”他说。“我是在作梦吗？我没有听错吧？你

把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再重复一遍。”

我又重复了一遍，而且还补充了一句，说：你这家伙是最坏的败类，比败类还要坏。你……

你们明白吗？他竟没有骂我，也没有打我，只象马嘶似的笑个不停。

“再说一句！”他说。“再说一句！”

我觉得一个劲儿骂街怪无聊的。这算什么？我又不是个留声机。

所以我吼叫了一会儿，就闭上嘴巴不响了。

他也不笑了，扶正了马刀，开始发号施令，说：

“大夫先生，请您照看一下这个患者，让他休息一下，安静下来，然后把他送到我们司令部去。弟兄们，你们要看好这个俘虏。费拉托夫留在这儿。翟科夫到外面去站岗。过一会儿，翟科夫把他押送到司令部去。”

他挂上马刀，急急忙忙地走了。翟科夫拉开门，也跟在后面跑到门厅里去。

这时，忽然从门厅里传来一声惨叫：

“哎呀哎呀！”

“怎么啦？怎么回事儿？”医生问道。

翟科夫大声回答：

“没什么！没什么！别担心。少尉先生绊了个跟头，绊在门坎上了。”

“咳!”医生说。“跑这么快干什么？”

屋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我、费拉托夫和医生。

这位医生的样子太滑稽。

这样一个医生，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他撂倒。用一把木头匙子照他敲一下，就能叫他趴下。

不过，我认为目前我决跑不掉。首先，费拉托夫端着枪，象根柱子似的直挺挺守在这儿。其次，敞着窗户，窗外土墙上坐着不少病人，连他们说话的声音我都能听清，而且窗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破瓶烂罐儿、药水、洗肠器什么的……

不行，既然跑不掉，就只好乖乖地在这儿呆着。

医生开始给我治病。他说：

“年轻人……请张开嘴。”

我说：

“张嘴干什么？您还没瞧够吗？”

“我想再证实一下。”医生说。

我说：“好吧！那您就证实吧。”

我不但把嘴张开了，而且还伸出了舌头。

“是的，”医生说，“舌头一点毛病也没有。可以让您高兴一下。不过，您的舌头颜色太蓝了。好象在钢笔水里泡过似的。年轻人，您没喝钢笔水吗？嘿嘿！……”

“没喝。”我说。

“这样，这样。”他说。“您的牙床子也肿了，吃个匹拉米董药片[①]吧。”

我把药片吃了。这没什么。

你们知道么，我的肚子饿得要命。我恨不得把医生也一口吞下肚去。

“您怎么？”他问我。“是战俘吗？”

“是的。”我说。“我当然不是到这儿来作客的……”

“这么说，您是布尔什维克？”

“以前是布尔什维克。”我说。“现在也是布尔什维克。”

“哎呀，请坐请坐。”他说。“您干吗站着呀？给您凳子，坐下吧。”

“不坐，”我说，“谢谢您。在我用来坐的那块地

① 止痛片。——译者。

方上面，留下了一生难忘的痕迹。我不能用那块地方坐了。如果我能够活下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情况和经过的。我一定牢牢记住。”

我说着，(同志们，请原谅!)就脱下我的裤子，给医生看我身上。

“哎呀！多么残酷!”医生说。

费拉托夫却在一旁咯咯地乐。

“咯咯咯!”

“你怎么啦？”医生问他。

“对不起，先生。”费拉托夫说。“我呛着了。”

医生皱起眉头说：

“好吧，年轻人。如果他们不枪毙您，您就来找我吧。我还给您吃匹拉米董。”

“好吧!”我说。“我来找您。”

我当然是笑着说的。如果我被他们枪毙，我死了干吗还来吓唬小老头儿呢？我完全准备好了要死的。如果我不死，我活着才不想再到这儿来呢。我决不想再来。

“好了，”医生说，“您可以走了。”

他又赶紧到洗手盆前去往手指头上抹肥皂。

费拉托夫命令我：

“开步走!”

他端起了手里的枪。

我们穿过门厅，走到大街上。翟科夫和病人们一起坐在土院墙上，正在讲笑话。听他说话的人都朝他龇着牙齿哈哈大笑。

“噢!”他说，“向军事委员致敬！怎么样啊？装上金牙了吗？”

病人们都笑得前仰后合:

“哈哈哈！……”

这些傻瓜还笑呢!

费拉托夫也大笑。

我说:

“顶好在你的嗓子眼儿里装这样一粒铅牙……这是唐波夫地区的说法!”

病人笑得更厉害了!

“哈哈哈！……说得真妙！好极了!”

翟科夫问我:

“我是唐波夫人，你是哪儿人？”

我说:

“你知道吗？我不屑跟你说话。你是个卖身求荣的坏家伙！白匪!”

我一看，翟科夫的脸臊得通红。他站起来，端起枪，说：

“得了！向后转！开步走！”

他说着，把枪闩弄得咯哒一响！

意思说，你再敢说废话，我就用铅给你补牙！

我向前走去。我们两个人差不多并排走着。我在左边，翟科夫在右边。我忽然发见我们根本不是往司令部的方向走，而是往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已经到了村庄的边上，只剩下最边上的几所房子了。

我心想：“这是玩什么花样？我们是往哪儿走？”

我当然也不乐意问翟科夫。我的自尊心不许可我问他，所以我一声也不吭。

过了一会儿，翟科夫开口了，说：

“我说，你倒是快一点走呀！”

“走那么快干什么！”我说。“我干脆跑得了。”

他说：

“快一点走！傻瓜！”

于是我们走得稍微快一些了，但还不是特别快。我心想：“奇怪！我们这样急急忙忙地上哪儿去？难道说去参加婚礼？”

我刚想到“婚礼”，忽然发见有一个白发苍苍的

老将军朝我们走过来了。活象个穿蓝色衬裤的丑八怪。那个干干巴巴、满脸讨人嫌的小老头子，每迈出一步，就把细瘦的小腿抖动一下。

“哪儿去？”他问道。

翟科夫立刻规规矩矩地打了个立正，答道：

“大人，我押送这个布尔什维克俘虏去执行命令。”

“报销吗？”

“是的，大人。报销。”

“好吧，”将军说，“稍息……过去吧。务必打准了。”

他一边说，一边兴高采烈地瞥了我一眼，就仿佛我是一只鸡，再不然是一只鹅，准备把我宰了给他当午饭似的。

“走吧，”他说，“上帝保佑你……祝你手不发抖。因为你现在不是去枪毙一个人，是去枪毙一个魔鬼。明白了吗？”

“完全正确。”翟科夫说。“我明白了。我是去枪毙一个魔鬼。”

“上帝保佑你！”将军又说了一句，然后抖动着他那两条小细腿就走了。

我们也继续向前走去。

老实说，我真不想走。我的脚不乐意走。

天气好极了。到处是花园，果树的花开得一片烂漫。树叶沙沙地响着。鸟儿飞来飞去。

我们却不得不去干一件极不愉快的事！

哎呀，我的妈呀！……同志们，当时我一边走，一边心里胡思乱想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我都想了些什么……

我走在前面，翟科夫在后头跟着。他把手里的步枪弄得咔嚓咔嚓地响。脚上的英国皮鞋走一步，格吱一声。翟科夫这个坏家伙，一句话也不说……哪怕说一句什么解解闷也好呀。哪怕嚷一声呢！

开始时，我们还没有出村庄。后来我们就到了放牛的草场上。以后我们又顺着一条小路走，两旁是形形色色的菜园和冬季用的菜窖。翟科夫还是闷不开口……光摆弄手里的枪。脚上的皮鞋格吱格吱响得怪叫人心烦的。

咳！多么不愉快！……

我心想："喂，彼恰·特洛菲莫夫！……布琼尼的战士！抬起头来！"

你们明白吗？我竟抬不起头来了。

脑子里尽想追悼会的事情。

我心里想:“彼恰·特洛菲莫夫!你死在异乡,多么可怜!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哪里算我的什么故乡呢?一个木匠、石匠、放牛的,有什么故乡?哪儿有饭吃,就到哪儿去呗。父亲埋在一个地方,母亲埋在另一个地方。只剩下了战友。可是他们能不能突围呢?唉!札瓦鲁辛同志在台利村多么困难。希库罗和马蒙托夫左右夹攻,乌拉加依从前面进迫……也许这都怪我没有完成任务!也许情况都是被我给搞糟的?!”

不过,真见鬼!——我们这是往哪里走?

村庄连影儿也看不见了。也听不见狗叫声了。可是我们还往前走。奇怪!

我心想:“这棵灌木后面,不就挺合适么?那几棵柳树后头,不也挺合适吗?”

同志们,我自己也枪毙过人。

我想:“在这几棵灌木后头,或者在那个峡谷里,收拾人都挺方便的。翟科夫满可以把我带到那个峡谷里去。”

恰好翟科夫就把我带到那里去了。

他说:“站住!”

我停住脚步，心安理得地想道：

“告别吧，布琼尼的战士！……”

可是我向谁告别呢？周围除了青草，还是青草，此外什么也没有。

我回头一看，翟科夫把步枪夹在腋下，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说：

“给你，别在身上！”

这是什么东西？

我仔细一瞧，原来是肩章，带亮晶晶的小牌子的金肩章，还有四个别针。

“拿着啊！”他又说。“快别上。”

“什么？”我说。

你们猜怎么着？——我完全不懂他的意思。我说：

“你算了吧！……别开玩笑了。”

他说：

“糊涂虫！趁别人还没发见我们，快戴上肩章。听见没有？”

我真糊涂了。我象个傻瓜似的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来，我给你别上。”他弯下点身子说。“快！”

我赶紧弯腰。他三下两下就利利索索地用两个别针给我别上了左边的肩章，又用两个别针给我别上了右边的肩章。

“这回，咱们快跑吧！”他说。

“往哪儿跑呀？”我问他。

“往哪儿跑？”他说。“那还用问，当然往布琼尼那边跑呗。”

哎呀，同志们！……我差一点哭出来。真的。我一下子坐到地上，连站也站不起来了。

“兄弟！”我说，“小兄弟呀！翟科夫，你真是自己人吗？”

“当然是自己人，”他说，“千真万确的……快起来，咱们快往布琼尼那边跑。”

“不行，”我说，“等一等……我跑不了。”

“为什么？”他说。“你为什么跑不了？”

“我的肚子里直翻腾。”我说。

你们明白吗？我肚子里别提有多难受了。我心想：准是火漆开始溶化了。我的嗓子眼儿、胸口，特别是肚子里，都象着了火似的火辣辣地痛。肠子好象跳起舞来了，断成一截截的。可痛死我了！我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呸!”我想。“没叫子弹打死，难道说要为这点东西去死吗？不！我可不愿意死。”

我想站起来。我使劲跪起来，却又立刻摔了下去。

“这样可不成。”我向自己说。“你在开玩笑！你能够站起来的！”

我又拚命跪起来，又摔了下去。

不象话！你们想想看：一个布琼尼的战士竟站不起来。

我心想：“这回我可真完了。”我就说：

“翟科夫同志，咱们告别吧！”

他说：

“好。咱们以后还来得及告别。现在我抱着你走，怎么样？你不会生气吧？”

“不用，”我说，“犯不上抱着我走。那样作毫无意义。反正我也得死。”

“别胡扯了。”他说。“也不过是那封电报在你肚子里搔痒痒罢了。”

“什么电报？”我问他。

“就是刚才你吃下去的那封电报。”他说。

“你这人真怪！”我说。“那不是电报，是秘密文

件，是写给布琼尼同志的一封秘密信。我没能够把它送到布琼尼同志手里，我太失职了。我把我们部队的最重要的战报给吃了。为了这件事，把我枪毙都不够。”

我便一五一十全讲给他听了。然后我说：“现在你千万别管我了……趁你还活着，快跑吧！”

他什么也没说，伸手把我抱了起来，象扛麻袋似地把我往肩上一扛，就钻进灌木林里去了。

等我们出了峡谷，他便撒开腿在有许多土墩和树桩的平原上跑起来……真快得吓人！只有马才能这样跑。

我说：

“翟科夫！你太吃力了吧？”

“这有什么稀罕的？”他嘶哑着喉咙说。“比你更重的东西，我也扛着跑过。”

我说：

“你歇一会儿吧！”

我多么不好意思骑着人跑呀！

我说：“你歇一会儿。咱们呆会儿再往前跑。”

“别说废话。”他说。“等咱们跑到那片小树林再说。”

那片小树林可不近。从我们这儿到那片小树林足足有两俄里。

我们跑得快极了，十分钟后，我们已经到了树林里。

我说：

“吁！到地方了！”

翟科夫把我撂在地上。你们猜怎么着？我好好地就站了起来。

多奇怪！

就当我骑在翟科夫身上在田野里奔驰的时候，我的肚子一点一点好起来了。好象舒服一些了，不太痛了。我说：

“好了，咱们继续往前跑吧！”

翟科夫说：

“不行，等一会儿……我跑不了啦。”

“怎么啦？”我问他。“你为什么跑不了啦？”

“我毕竟不是一匹马呀。”他说。“我不能不休息，光往前跑。”

小伙子确实累得满头大汗。

我们两个人就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我躺在草地上，翟科夫掏出荷包，抽起烟斗。

我说：

“翟科夫，我还是不明白……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吗？”他说。“我是个卖身求荣的无耻之徒。我为了一件英国军大衣，就把自己卖给马蒙托夫了。”

“算了吧！”我说，“翟科夫，你瞎扯！”

“也许是瞎扯。”他说。“实际上我是被他们拉壮丁拉来的。我被迫已经在白匪军队里呆了三个多月了。”

于是他就把他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了……

讲他怎样从德国前线回到家里。怎样他的家业整个毁了。怎样他的妻子患伤寒病死了。怎样他去给一个神甫当雇工等等……后来怎样哥萨克把他拉壮丁拉来了，发给他一支枪，命令他打布尔什维克。

“他们对我说：你用不着心疼子弹！因为布尔什维克不是人，他们是人类的敌人……”

我问他：

“你开枪打过吗？”

“没有。”他说。“我是用枪托打的。”

“怎么用枪托打？”我问他。“那么你打死过？”

“凭良心说，我只打死过一个人。”他说。“就是我们这儿的那个军官。陆军少尉吉别尔。”

“哪一个吉别尔？”我问他。

“就是打你耳光的那个人。”

“什么？”我说。“我的妈呀！你什么时候有工夫打死他的？”

“就在医疗站的门厅里……我用枪托打死他的……就在你吃匹拉米董药片的那工夫。”

这小伙子有多么心灵手快！他用枪托一下子就把那个少尉给打死了。你们还记得吗？医生问了句“怎么啦？怎么回事儿？”那是吉别尔惨叫了一声。翟科夫将他打死后，塞在板凳底下了。

“我就是在门厅里给你弄到肩章的……”翟科夫说。“别害怕。这不是死人身上的肩章。那儿挂着一件军医的军上衣。我把军上衣上的肩章摘下来了。你知道你现在的身分么？你现在是军医。”

“呸！”我说。

跟着我又问他：

“翟科夫！小兄弟，那你刚才干吗装傻充楞地跟我吵架？”

“干吗跟你吵架呀？”他说。“怎么——你希望我跟你亲嘴吗？希望我称你‘亲爱的同志’吗？亲爱的朋友，假使那样做的话，咱们两个人会被他们吊在一

棵桦树上绞死的。”

“你说的对。”我说。“翟科夫，你说的对！翟科夫，你这小伙子真精明！”

他却问我：

“对了，我现在有这样一个疑问：等我跑到你们那边去，他们会不会枪毙我？”

“别胡想了！”我说。“你是将军吗？你是上校吗？”

“不是，”他说，“我是一个小人物。”

“那他们干吗要枪毙你呢？”我说。“我们只枪毙敌人，枪毙资本家。可你是什么人？你是资本家么？你是资产阶级吗？”

“这些话我根本听不懂。”他说。“虽然我在乡村的教会学校里念过书，毕业了。念了两年。后来我爹送我去当牧童。”

“你看！”我说。“这么说，咱们俩是一个阶层的人。我也当过牧童。还不仅我一个人当过牧童。我们军队里尽是些牧童呀，油漆匠呀，石匠什么的。你到了我们那儿，大家会欢迎你的！你是自己人。是农民。你不到布琼尼那儿去当兵，还到哪儿去当兵呢？”

“对，”他说，“哥萨克军队不是我应该呆的地方。我早想投奔布琼尼的部队。我特别想看看布琼尼本人什么样。你见过他吗？”

“见过。”我说。“见过挂在墙上的布琼尼的像片。我们司令部有他的像片。骑在一匹白马上。”

“他是旧军官出身吗？”

“那又怎么啦！”我说。“你糊涂了？他得指挥整个军哩！”

“那么他是将军出身？”

“不是，”我说，“他是雇农出身。你想想看：从前他就是我们省的一个普通农民。你将来自己能见到他的。如果我们能走到鲁干斯克，等我找到了布琼尼，我一定介绍你和他认识。”

“我说，咱们快点走吧！”翟科夫说。“得找找路。”

“那咱们快点走吧。”我说。

可是我又站不起来了，简直瘫在那儿了。

翟科夫把我架了起来，我勉勉强强迈着步子。我们走出树林，来到一处野花盛开的林边。这时，翟科夫问我：

“你凭良心说说：你干吗要打死我们的哨兵？”

我说：

“怎么说我打死他了？我没打呀。他可能是被一个疯子给打死的。”

你们猜怎么着？我刚说完这句话，只见从灌木丛后走出一个庄稼汉，正是那个吓了我一大跳，我曾经用手枪瞄准他的那个疯子。

他蓬头垢面，衣服破得拖一片挂一片的，径直朝我走过来，脸上还是带着那副莫名其妙的笑容，嘴里嘟嘟囔囔、唠唠叨叨的。

我又吓了一大跳，可是脸上没露出来。

我说：

“啊，啊！熟人熟人！”

“这是谁呀？”翟科夫问道。

我说：

“这就是用石头打死你们哨兵的那个人。”

接着我又说：

“老兄，你干吗打着别人的旗号杀人呀？嗯？为了你，我差一点被人家拴着鼻子吊起来。你知道吗？你干吗打死人？”

他回答：

“不错，我打死人了，而且我还要打，我要把你们

马蒙托夫一伙人消灭光。”

我发见他盯着我左肩上的肩章看。那是一枚亮晶晶的肩章。

他说：

“我决不会心疼你们的。我要让你们这些狗崽子统统上天堂见上帝去！”

他说着，弯下腰，又捡起一块大石头。

“住手！”我嚷道。“住手，无赖汉！”

说时迟，那时快，呼地一块石头从我头上飞了过去，差一点砸在我脑袋上。

我勃然大怒，说：

“喂！疯子！你快住手！”

他拚命朝一条沟渠跑过去，捡了一大把石头，躲在沟里，向我们扔起石头来。有两次打中了我的耳朵。翟科夫被他打中了胸口，再不然就是打中了鼻子。

我说：

“翟科夫，抓住他！还跟他客气什么……”

我们两个人就向这疯子扑过去。翟科夫猛撞他的腿，我抱住他的腰，把他按倒在地上……他的力气大极了。你们知道吗？疯子的劲儿都特别大。他拚

命挣扎，低声怒吼着，还咬人……可把我们累坏了。他不停地破口大骂：

“坏蛋！狗东西！资产阶级的狗奴才！……”

我取下自己腰里的皮带（那是一条特殊的、非常结实的油皮皮带），我们好歹把疯子捆了起来。我们还用一团草堵上他的嘴，免得他嚷……然后就这样把他扔在沟里。让他在那儿躺着休息去吧。

我们刚想继续赶路，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一队哥萨克骑兵朝我们飞驰而来。

“站住！”他们说。“你们是哪儿的？打哪儿来？”

“哎！”我心想。“彼恰·特洛菲莫夫，这下子你可完蛋了！”

我又蹲在地上站不起来了。

翟科夫却一点也没慌神儿，他居然对答如流地回答他们：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们是马蒙托夫将军的私人信使。”

“上哪儿去？”

“上库尔巴托沃村去，给希特普塞尔送情报。”

“这可是个问题。好啦，回司令部去吧！”

“回司令部去干什么？”

“到司令部去搞清楚怎么一回事儿再谈别的。”

我发见说话的那个哥萨克正瞅我的肩章，还皱着眉头偷偷地笑。意思说：我们心里全明白。我们的眼睛是经验丰富的，一眼就把你们看透了。甭想给我们当上。

翟科夫也不傻。他也瞅着我的肩章，装模作样地说：

“你们认识坐在那儿的那个人是谁吗？这是邓尼金军队的主任医师。他被苏维埃军队俘虏了，刚跑回来。他必须刻不容缓地去见邓尼金。我是他的警卫员。明白了吗？”

他们说：

“你不是在撒谎吧？！”

他说：

“你们要是耽误了我们的正事，马蒙托夫会给你们个厉害看看的。”他又转过脸来向我说：

“医生先生，您说对吗？”

我简直不知所措了，只好说：

“是的，弟兄们，准把你们吊在头一棵遇到的桦树上绞死。你们这群愚昧无知的畜生。你们有什么权力这样对待一个高贵的人物？”

我还补充了一句：

“科学是不容许这样做的。”

他们听到这里，竟一齐脱下帽子，抓起后脑勺来。算我们走运，这时又过来一个骑马的哥萨克。他认识翟科夫，一见他，就打起招呼来：

“啊！翟科夫！”

翟科夫说：

“你好，彼特罗夫（也许是伊凡诺夫）！你瞧，象话么？——他们不肯承认我。”

那人说：

“弟兄们，你们怎么啦？这是翟科夫。骑兵一连的。跟我们这儿的中士是同乡。”

这样一来，那些白匪就完全相信我是军医，相信翟科夫是我的警卫了。

“请吧！”他们说。“你们可以走了。”

还向我说：

“大人，请原谅！我们并不是有意这样做。”

我说：

“没关系……好吧，科学容许这样。”

于是我就走了。翟科夫象个警卫似的跟在后面。

这时，他们又在我们背后喊道：

“听着！喂……你们听着！”

我停住脚步。翟科夫咬着我的耳朵低声说：

“唬唬他们！小伙子，唬唬他们……”

他们说：

“医生大人，您别往右侧走。”

“为什么？”

“右侧的小河那一边有布琼尼的军队。”

“布琼尼的军队？”我说。“这太可怕了！好吧，我们不往那边走。谢谢你们。你们可以走了。”

他们上马飞驰而去。

等他们一走，我们立刻跑到沟旁去看那个疯子。

我们以为他准已经憋死了。哪知连他的影儿也找不到了。我们到处找，也找不到，只剩下我的那根皮带丢在沟里，已经断成两截了。

哎，我那时真傻，竟心疼起我的皮带来，心疼得差一点哭出来！我想哭，翟科夫却直笑，说：“那个大力士，劲儿多大呀！”这根皮带是我用四块方糖从我的排长那儿换来的。这么结实的一根猪皮油皮皮带，二十五个人拉它，都不见得拉得断。想不到被一个捆着胳膊的人给挣断了……再不然是他用牙给

咬断的。

我站在那儿直叹气，一抬眼，看见翟科夫也在愁眉苦脸地想什么，就好象他丢了什么东西，或者把什么东西落在家里了似的。

“你怎么啦？”我问他。

“等一下，”他说，“别给我捣乱。”

他从头到脚打量着自己，用手上下摸着，还直揉自己的脑门儿，然后说：

“我忘了……这是左手，还是右手？”

我说：

“左手。”

“这一只呢？”

“右手。”

“好了，”他说，“谢天谢地。来，咱们往这边走。往这只手的方向走。”

“啊！”我说。“我明白了。右手的方向就是小河那边。投奔布琼尼军队去。这才是大事！走吧，瓦西亚！”

我把手里的皮带丢在地上，精神抖擞地向前走去，连我自己都奇怪怎么这样精神。

不过这样走了一会儿工夫，我脚上的老茧又痛

起来了，肚子里也难受极了，而且腰酸背痛。

我拖着脚步勉勉强强地走着，心里想。

“咳！算个什么英雄！太不自量力了。这象用大炮撵蛤蟆似的，一点也不象为了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样子。”

翟科夫走着走着，忽然站住了，说：

“停一下！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没听见。”我说。

我站住，仔细听了一会儿。

果然，远远地仿佛传来豌豆脱粒的声音，劈劈啪啪的。我说：

“什么响？”

“放枪。”翟科夫说。“放机关枪的声音。柯尔特式机关枪。你听得出你们那边怎样打我们这边吗？”

“是的，”我说，“我听出来了。”

我们加快了步伐，匆匆走上大路，在灰尘弥漫的路上，朝太阳的方向走去。那时太阳已经西沉。天黑下来了。越往前走，枪声越响，一会儿来自右侧，一会儿来自左侧——砰！乓！

“行了！”翟科夫说。“可以把这破烂玩艺儿取下来了。”

“什么玩艺儿？”我问他。

“肩章呗。”他说。“让它们见魔鬼去吧。够了！我已经戴了四个月了。大哥，信不信由你，我的肩膀上都叫它磨出老茧来了。”

“可以取下来了吗？”我说。

“可以了。”他答道。“完全可以了。来，医生先生，我先给您摘下来。”

他说着，伸过手来扯我肩上的邓尼金肩章。

我转过头去一看，嗬！他的脸别提有多么凶了，就好象他不是在摘肩章，而是在干什么丑恶的事情似的。偏偏那个别针又是个生了锈的，取不下来。他揪了半天，也拔不出来。

“啊，该死的！”他说。

他使劲一揪，才算把肩章连一块军大衣一起揪下来了。

“得了，取下了一个。”他说。“来，转过身去！”

他刚把第二个肩章揪下来，扔到沟里去见魔鬼，我们就听见传来一阵马蹄声。

你们明白吗？我们还没来得及定定神，也没来得及叹口气，又有一队骑兵急驰而来。

他们径直朝我们跑过来了。

“逃命吧!”翟科夫说。“小伙子，你要是想活下去，那就快逃命吧!”

仿佛被人抽了一鞭子似的，他撒腿就跑。

我也撒腿就跑。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的，反正跑的还挺快，一步也没落在翟科夫后面。

骑兵当然在我们背后紧追。在树林里要想躲开骑兵还不难，在平坦的大路上就不太容易了。毕竟还是马的腿多一些啊。

我听见他们的马蹄声越来越近了。忽然:劈，劈，啪!

一颗子弹嗖地从我头上飞过。

砰！——又是一枪……

等步枪响起来的时候，我感到后背都冒凉气了。

翟科夫向我说:

“亲爱的！大哥!”

我说:

“什么？”

他说:

“亲爱的……同志！你可别落下……”

我一看他，脸刷白刷白，瞪着两只大眼睛，嘴唇上尽是白沫子，象马似的。

“快点跑。”他说。“请你快点跑……别落下。亲爱的！……”

哎，看得出，小伙子决不想再回马蒙托夫那边去了！看得出，他真的还想在未死之前见见布琼尼。

我也不想死。我跑得象奥尔洛夫种的骏马一样快。

我们跑得在周围扬起一片飞尘，就象着火时冒的烟子似的。连路都看不见了。翟科夫，我也看不见了。只听见背后劈劈啪啪的枪声。

突然翟科夫向我说了一句什么。不是说话，是嚷了一声：

“哎呀！”

再不然就是：

“噢呀！”

我记不清了。

总之，我一扭头，看见我的翟科夫仰面朝天摔在地上，躺在路上动弹不得了，脸上尽是鲜血，鼻子上糊着泥土。

后面却还不断地劈劈啪啪放枪。

我又往前跑了几步。不行。跑不了啦。我回转来，叫道：

“翟科夫！起来！翟科夫！”

他怎么也起不来。一动也不动。鼻子上糊着泥土。

我抓住他的肩膀，拚命地摇他。

“翟科夫，”我说，“别胡闹了！快起来！……”

但是就在这当口，有人在我头上大喝一声：

“站住！举起手来！”

我抬起我的昏昏沉沉的头，竟看见……

我的妈呀！我竟看见在那几个兵士的皱巴巴的军帽上缀着红军的红五角星。

记得我当时就坐在翟科夫躺着的那块泥上地上了。我说道：

“同志们！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你们干吗开枪？你们把自己人给打死了！”

“去吧！”他们说。“别胡扯啦。我们这边人的肩章不是亮的。”

“你们别光看肩章呀！”我说。“不管怎么说，他也是自己人！他是我们这边的人！”

“你说的很对，”他们说，“他是你们那边的人……”

头上有一撮额发的一个小伙子是他们的排长。

他笑嘻嘻地向我说：

“瞧瞧，把肩章连衣服一块儿揪下去了。吓坏了吧，你这个白匪？”

“你自己才是匪徒呢。”我说。“告诉你吧，为了你这样侮辱我，我得把你……”

我气得喘不上气来了。我心想：“真见鬼。好容易遇到自己人，可是竟这样对待我。”

我终于说出来了：

“我得把你的牙挨着个儿数一遍！”①

他说：

“好吧！咱们以后再算帐。”跟着，他命令兵士们：“把打死的这个搜一下，把这个算帐的会计押送到邦杜罗沃去见政委。”

我这才明白过来。我说：

“你们怎么，以为我是白色的吗？”

“没以为。”他说。“你大概是灰色，褐色，深红色的。”

翟科夫还躺在泥里。他们把他翻过来，掉过去地搜他所有的口袋，说：

① 俄语这句话的意思是：把你的牙都打掉！——译者。

“他还喘气呢!”

“好吧,”排长说,“就让他喘一会儿气吧。今天天气好极了。”

他们从翟科夫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读着纸上的字:

“瓦西利·谢苗诺维奇·翟科夫,马蒙托夫将军的哥萨克志愿师第一骑兵连战士。”

“是的,”排长说,“是自己人。从哪儿看,也是自己人。得了,小伙子们,上马!”

他向我说:

“喂,战士……前进吧,为了上帝,为了沙皇和祖国!”

“不成,”我说,“我不能撂下我的同志。你们把他带走吧。听见了吗?”

“对不起,”他们回答道,“我们可没带来灵柩车。”

“不带着他,我不走。”我说。

“你不走?真的?你不是说着玩儿吧?如果你这么说,那你就自己掮着他吧。同意吗?”

你们猜怎么着?我使劲一抱,就把翟科夫抱了起来,把他掮在肩膀上。当然很重,可是我总算没有

跌倒，也没有把翟科夫掉在地上，我用自己的两条腿稳稳地站着。

我们就这样动身了。

骑马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侦察兵，左边还有一个，右边也有一个。排长骑白马走在后面，中间是我，掮着翟科夫。当然，我的脚上没钉马蹄掌，我也跑不快。再加上老茧痛，背也痛……你们一定想象得出。我走得挺慢。心里非常不高兴。

我简直象喝醉酒了似的，闭着眼睛，两条腿晃来晃去的，总跟马撞上。他们就嚷：

“喂！白匪！别把马惊着……丑八怪！”

我说：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我继续往前走。对我来说，反正他们嚷什么都一样。我没有什么可惋惜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什么也不愿意考虑了。

我光想：这简直太荒唐。荒唐到了可怕的程度！真可怕，怎么那么荒唐！怎么想象得出：布琼尼的战士竟被布琼尼的军队给俘虏了！

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放心一些了。

真见鬼，还是自己人！好歹是自己人，戴着红五

角星呢。难道我指望过还能看见戴着红五角星的自己人吗？没有，我从来没有指望过。

两旁的马蹄声得得响着。我觉得头里面也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咚咚地敲着。掮在肩上的翟科夫还不断地抽动。我心想：

"咳！可怜的翟科夫！你死得太冤了。你的理想也没能够实现，你没能见到布琼尼同志。"

我要支持不住了。我几乎要摔倒了。我几次三番差一点跌到马蹄下面去。

耳朵里却还听见从旁边传来笑声：

"咳！亏你还是个战士！你稀饭喝得太少了。看来光喝稀饭营养是不够的。对吧？"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连骂人都骂不出来了。我马上要摔倒了。

这时候，有一个人在旁边说：

"来，士兵，把你的朋友放在我的马脖子上吧。"

我把翟科夫放到了那匹马上。记得当时我还说了声"谢谢"，然后就将可怜的翟科夫放在温暖的马脖子上了。他的身子从马脖子两边垂挂下来，两只手悬在空中。我继续向前走。

天已经黑了。我们走进鲁干斯克县马利叶沃乡

邦杜罗沃村的时候，星星已经在上空闪烁着。

记得我们在一个院子里等了很久。院子里有几个哨兵站岗，翟科夫躺在井旁边土地上，我蹲在他旁边哭。

也许我的神经受刺戟了，也许我太累了，同志们，反正当我眼看我的朋友要死的时候，我心里实在太难受了。

他还有呼吸。不过呼吸很缓慢，很微弱。叹一口气，哼一声，脑袋稍微动一动，又没有声音了。太阳穴上的伤口已经不出血了。这不是好兆。

我叫他：

“翟科夫！”

他不回答。不睁眼睛。耳朵也不动弹。

我又叫他：

“翟科夫！……你算了吧！……别伤心了！一切都会很好的。闹了个误会。他们是我们自己人，是布琼尼的战士，戴红五角星的。翟科夫，明天我们也戴上红五角星，我带你去见布琼尼。我就跟他说：‘布琼尼同志，请允许我把我的朋友瓦西利·谢苗诺维奇·翟科夫介绍给您认识。他是我们地球上最伟大的英雄……’翟科夫，你听见了吗？布琼尼会回答

你说：'是的，你是一个挺好的小伙子，瞧你这样子就是有斗志的人，不过你不应该在白匪坏蛋那儿当兵，不应该在邓尼金那儿当兵，你应该在札瓦鲁辛同志的特种部队里当兵。'说完，就把你分配到我们的部队里来。翟科夫，你愿意到我们部队里来吗？"

我当然只不过是随便说说，因为翟科夫根本听不见，他象一段木头似的默默地躺在井旁。

这时候，一扇门打开了，有人从屋里喊道：

"把俘虏带上来！"

说我是俘虏！……你们想想看：一个布琼尼战士居然成了布琼尼军队的俘虏！

我被他们押送到一所小房子里去。那所小房子里什么气味都有，又是面包味儿，又是菜汤味儿，又是煤油味儿。圣像下面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半罐子牛奶和一把英国式毛瑟手枪。桌前坐着一个穿高加索式衬衫的年轻小伙子。旁边坐着一个戴便帽的年轻小伙子。还有一个有连腮胡子的，站在窗口。另外还有几个什么样的人，我就记不清了。

"喂，老兄，"他们说，"过来，走近一点。"

他们把翟科夫放在一条板凳上。我走到桌子跟前去。

他们都仔仔细细地打量我，好象我不是个人，是个怪物似的。后来他们开始填一张表。

“姓什么？”他们问道。

我说：“特洛菲莫夫·彼得·瓦西列维奇。”

“什么？”他们说。

我说：

“我不能大声回答你们，因为我的嗓子眼儿里有好多钢笔水。”

“呸！”他们说。“糊涂虫！”

我说：

“什么？”

他们又问道：

“你是个普通兵士么？”

“是的。”我说。“我是札瓦鲁辛同志的特种部队的战士。”

“怎么？”穿高加索式衬衫的小伙子说。“你是札瓦鲁辛的战士？”

“当然罗。”我说。

“简直是胡闹！同志们，你们在哪儿抓住他的？”

他们说：

“政委同志，他在瞎编谎活。他是个真正的马蒙

托夫部队的侦察兵。喏，这是证件。”

他们说着，把翟科夫的军人身分证放在桌子上。

我说：

“这又怎么样呢？这是翟科夫的。他是个起义的马蒙托夫部队兵士。这一点也不错。可我是札瓦鲁辛的战士。我本来是去给布琼尼同志送一封秘密文件的。”

“你怎么去的？”他们问。

“我骑尼格罗去的。”我说。

“什么尼格罗呀？”他们说。“老兄，你又不是在非洲。老兄，你是在俄罗斯共和国。”

“是的。”我说。“我知道我是在俄罗斯共和国。不过，我说的尼格罗是一匹马的名字。”

“是吗？那么现在你的马在哪里？”

“淹死了。”我说。

“马淹死了？”

“是的。”我说。“你们想想看……我把系马鞍的肚带勒的太紧了，马到了水里就浮不起来了。”

“真是奇谈！”他们说。“那么你的文件在哪儿呢？”

“在哪儿呀？”记得我当时火冒三丈。“哪儿？我

把它吃了!”

他们一齐哈哈大笑:

“呵，呵，呵!”

你们明白吗?他们不信……我说的话，他们一句也不信。他们以为我胡扯。

我说:

“你们看，我的后背也整个被打烂了。看见了吗?难道说，我自己能用通条把自己抽成这个样子吗?”

我掀起衬衫给他们看后背。给那个穿高加索式衬衫的人看，给戴便帽的人看，也给站在窗口的那个有连腮胡子的人看。

站在窗口的那个有连腮胡子的人说:

“这话不假。自己没法把自己抽成这个样子。这一点也不错。把他打成这个样子了!这是谁把你抽成这样儿了?”

我说:

“马蒙托夫的哥萨克。”

“啊。”他们说。“拿他怎么办呢?也许他真是自己人。天晓得……你有证明吗?”

我说:

“没有。全吃了。你们顶好给札瓦鲁辛同志打一个电报问问。他会回答你们的。”

“札瓦鲁辛已经三天没有消息了。”他们说。“他现在在哪儿？情况怎么样？只有天晓得。”

“我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也知道他的情况。”我说。“就是他派我去给布琼尼送作战情报的。请你们放我走吧，我还得继续赶路。”

“怎么办？”有几个人说。

“你们说呢？”另几个人说。

我一看，他们一个劲儿耸肩膀，比手势。我看出来，他们能放我。真的，准能放我走。

可是，你们猜怎么着？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

忽然间从窗外院子里传来一阵喧嚣。有人在说话。甚至在唱歌。不知为什么，我心里立刻非常别扭。我好象有了一种预感似的。我觉得难受极了。

穿高加索式衬衫坐在那儿的那个政委问道：

“外面出了什么事？”

有连腮胡子的那个人向窗外看看，回答道：

“还是那个倒霉的老头儿嚷嚷。”

“哪一个倒霉的老头儿？”

"就是那个养蜜蜂的人，白匪把他的老婆给杀了的那个人。"

"啊。"政委说。"他在那儿干什么？干吗不放他进来？也许他饿了，让弟兄们给他点饭吃吧。"

正说着，门敞开了，于是那个倒霉的养蜜蜂的人闯进了小房子里来。

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我怎么能认不出他来呢，这一天的工夫，他给我惹了多少可怕的事情！正是那个庄稼汉。那个疯子。现在他的样子更吓人了。他的衣裳完全碎成了一片片。两手两脚上全是鲜血，就仿佛他在带刺的野蔷薇灌木丛里躲了三个钟头似的。主要是他的一双眼睛放射出疯狂的光。这样一双眼睛简直能把全副武装的整整一个骑兵团的人都吓倒。吓得我差一点一屁股坐在地板上。他一看见我，可就挥舞着两只手，大声咆哮起来了……

"啊哈！"他嚷道。"他在这儿呐！同志们！布尔什维克们！快揍他！揍这个魔鬼的儿子！马上用最长的步枪向他开枪……"

"怎么，"政委说，"你认识他？"

"认识！"他说。"怎么能不认识他！就是他们，把我的房子给烧了，用刺刀把我的老婆子给捅死了。

后来，他们这些狗东西还在树林里用笼头把我捆起来了……”

“什么？”政委说。“你说什么？”

这时，我就插嘴说：

“哪里是用笼头捆的？他瞎扯，不是用笼头捆的，是用皮带捆的。”

他又说：

“这是马蒙托夫将军的信使。他们是到库尔巴托沃去告密。虽然他们这两个坏蛋用笼头把我捆起来，扔在沟里，可是我亲耳全听见了。”

我说：

“你别胡说八道了！你瞎编些什么？我们根本不是用笼头捆的你。”

政委说：

“住口！别瞎嚷嚷！你这个坏家伙，还是说说，你到库尔巴托沃去干什么？”

我说：

“那又怎么样……不错。我们的确是要到库尔巴托沃去。不过，我们是故意去……我们去……”

我窘得要命。话说得前言不搭后语，而且脸一定还憋得通红。

“我们去，”我说，“我们不是上那儿去，我们是上这儿来。我们去……”

“住口！”政委喊道。“够了。”

政委向老头儿说：

“好吧，老爷爷。谢谢你。你可以走了。你去告诉红军战士，让他们给你点东西吃。再见。”

政委伸出手去和疯子握了握，疯子就走了。……所有的小伙子都坐到墙角里圣像下面去商量怎么办……

当时那个时候是分秒必争的。没有工夫拖延。

小伙子们咬了一会儿耳朵，考虑了一会儿，往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读道：

“将敌方的侦察员和特务特洛菲莫夫·彼得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我——我怎么办呢？记得我只说了一句话：

“是呀！……布琼尼的战士被布琼尼的军队给俘虏了……”

大家都站了起来。有几个人走出了屋子。有几个人谈起军事问题。三四个人从两边扭住我，架了出去。走到院子里，他们叫我靠墙站着。

记得当时我向他们说：

“不值得在院子里干这种事。同志们，干吗把院子搞得挺脏的？过后，老乡看了怪不舒服的。你们还不如到一边去另找个地方，应该爱清洁……”

“得了。”他们说。“站好吧。没有工夫爱清洁。”

我说：

“那就这样吧……等我把衣服脱了。”

“用不着脱衣服。”他们说。

“怎么，”我说，“白糟蹋衣裳啊？不行，那可不好……弟兄们，我还不如把我的衣服送给你们呢。我的皮靴可太讲究了。真叫人心醉！怎么样？”

“用不着。”他们说。“我们从来不稀罕英国皮靴。让协约国的人去穿它们吧。”

“你们是一群傻蛋！”我说。“‘协约国的人’！你们才是协约国的人呢！再说，这双皮靴根本不是英国皮靴，是莫斯科皮靴。‘勇士’工厂出的。”

我急忙坐到地上，脱下我脚上的这双勇士皮靴。

“拿去，”我说，“弟兄们，给你们穿，留个永久的纪念吧。”

我把皮靴扔给他们，然后开始解下我的包脚布。

你们猜怎么着？唉，这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发现在我的破破烂烂、被汗浸透了的包脚布里有一小团东西。是个小纸团儿，上面还有一些字迹。

我打开小纸团儿一看，有几个字母。究竟是一些什么字母，可惜那时我还不认识。

我说：

“弟兄们，我可不识字。你们看看这上面写着什么？”

他们说：

“给我们看什么！我们用不着看。你靠墙站好！”

我说：

“你们看看又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还来得及靠墙站呢。你们先看看这上面写着什么。也许有要紧的话。”

总算有一个人接了过去，他划着一根火柴，念了起来，他蠕动着嘴唇，认一个一个的字母。然后说：

“这上面写着‘海洛’。”

“什么？”我说。“哪一个海洛？”

“是的，”他说，“海洛。”

另外一个人走了过来。第三个人也走了过来。一块儿念。

“是的。”他们说道。“总而言之，是‘恩米，……海洛……俄……’”

后来又说：

“还是挺可疑的。还盖着章呢……弟兄们，咱们把别洛波尔斯基找来看看吧。”

他们走进了农舍。过了不一会儿工夫，跟政委一同出来了。政委——就是穿高加索式衬衫的那个人——嘴里骂骂咧咧的。

“还什么海洛？给我瞧瞧。”

他把我那一小块破破烂烂、皱皱巴巴的小纸片接过去，念道：

“‘致……第一骑兵军……长……恩·米海洛维奇·布琼尼……工农骑兵军第六师司令部’。”

以后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政委别洛波尔斯基抱住脑袋说：

“这是什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我说：

“秘密文件就剩下这么一小块了。就是我应该送到鲁干斯克去的那封秘密文件。给布琼尼的秘密文

件。其余部分我全吃了。”

政委别洛波尔斯基大声喊道：

“取消。取消判决！”

然后他走到我面前，弯腰抓住我的肩膀，说：

“同志，请你原谅！差一点把你送到天堂里去见上帝。”

我说：

“没关系。请吧。快给我一匹马，我得赶紧去见布琼尼。我必须向他报告非常重要的作战情报。”

实际上，你们知道么，当时我瘫在地上，连站也站不起来了。我坐在地上，光着脚丫，一个劲儿用包脚布擦脸上的汗珠子。我出了一身大汗，你们知道么……那是免不了要出汗的！

五分钟后，一辆双马敞篷马车隆隆地驶到了院子门口。两匹骏马活蹦乱跳地，直用马蹄刨地！他们把我放在马车里，在我的身子周围还堆上稻草。又暖和，又软……

记得我微微地闭上了眼睛，听见别洛波尔斯基同志命令道：

“送到鲁干斯克，布琼尼集团军长的司令部去。”

这时，我抬起头来说：

“我说，把翟科夫也放在车上吧。”

他们就把翟科夫抬过来，放在我旁边。记得我用头顶了一下他的腰。他连动也没动一下。简直象一段木头似的。

赶车的啪地抽了一下鞭子，马车就启程了。我失去了知觉。换一句话说，我睡着了。

记得我还作了个梦。

我梦见仿佛我们在叶丽莎维特格勒城。我脚上穿了一双新皮靴。仿佛我正要买我们的队长万卡·雷奇阔夫的包脚布。他向我要八分之一磅马合烟和三四块方块糖。可是我只给他一份半面包，一点也不能添了，因为我没有马合烟。我不抽烟。仿佛我也不太想买这副包脚布。因为它们挺特别的，挺软，是用老爷用的手巾作的。

我说：

“我给你一份半，这面包可好极了。还挺新鲜。”

雷奇阔夫说：

“不行……不干！”

不记得我们是怎样谈妥的，反正结果我还是换了。我把这副包脚布买了来，就往脚上缠。

我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缠着，这时候忽然札瓦

鲁辛同志来了。他一边走，一边数他的军外衣上的钮扣，嘴里说道:

“特洛菲莫夫，我们得到了情报，说你脚上磨出了老茧。是真的吗? ”

“不错,”我说,“有几个小老茧。”

“好吧,”他说,“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的特种部队决定枪毙你。”

我说:

“随您怎么决定吧，札瓦鲁辛同志。札瓦鲁辛同志，这是您的私事。枪毙就枪毙吧!”

我就开始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把我的包脚布解下来。我一边往下拿包脚布，一边想:“是的! 一个人一辈子里说不定会碰到什么倒霉事儿……”

在这当口，我醒了。

我躺在敞篷马车里。不知为什么,马车停住了。周围很黑。前面是一座桥，要不然就是一个关口。马车夫坐在前面抽烟。

翟科夫躺在旁边。

我的翟科夫依靠最后一点力气，嗓子里呼呼地作响，他的整个脸上都是鲜血。血不停地从太阳穴处往外流，往外冒。

我想爬起来告诉马车夫，请他对翟科夫采取一点什么措施，但是我心里忽然怕起来，于是又丧失了知觉，又躺下去睡着了。

等我再一次醒来时，已经在另一个地方了。

我躺在一张软绵绵的床上。一盏灯静静地在我的头上面放着光。肚子上捂着一个热水袋。旁边椅子上坐着一位穿白围裙的红褐色头发老大爷。

我说：

“红头发，你是谁呀？”

他说：

“我是医生。”

“我呢？”

“你在医院里。你病了。请你好好地躺着，别动弹。我们刚才在你肚子里找到了火漆、墨水，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我说：

“是的。还找到纸了吗？”

“找到了，”他说，“很多。”

我说：

“你们全明白了吗？”

“什么？”他说。

我说：

“你们看懂了上面的字了吗？也许有些字已经泡掉了？”

“没有，”他说，“已经成了一大团乱七八糟的东西。”

“真可惜。”我说。

他说：

“现在你需要治疗。你需要好好地医治医治你的肚子，要治很长一个时期。给你，请你先吃个匹拉米董药片以防万一吧。”

我吃了。他在旁边坐了一会儿，放正了热水袋，就走了。

我转过头去看看这里的情况。只见床上躺着好多病人，都睡着了。有的病人在呻吟。有的病人在睡梦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和我隔着两张病床，紧挨着壁炉，躺着一个我认识的人。

你们想想看——那是翟科夫！

不过，他在那儿干什么呀？

他的头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个鼻子翘在外面。就是这个翟科夫，他正把身子从病床上弯下来，用手往地板缝里塞什么。

我叫道:

“翟科夫!”

他抬起只露出一半的头来，说:

“什么? ”

我说:

“你在那儿干什么? ”

“我吗? ”

“是呀,”我说,“你!”

“我呀,”他说道,“我要把匹拉米董药片塞进地板缝里去。我对于匹拉米董已经腻透了，腻得没法再忍受了。大概所有的军队都用匹拉米董治病。我想，大概基督诞生以前，医生们就光给当兵的吃匹拉米董了。”

“你真是个怪物!”我说。

接着，我问他:

“你还活着? ”

“怎么不活着!”他说。

我说:

“高兴么? ”

“怎么不高兴!”他说。“唐波夫的傻瓜!”

我想痛痛快快骂他几句，甚至还想把枕头扔在

他身上，可惜忽然浑身无力，衰弱得一阵哆嗦，就跌在这个枕头上，昏昏入睡了。

早上，太阳把我唤醒了。炙热的阳光照在我的眼睛上。记得我扭过身子，转过头去，这时我猛然一睁眼，看见一张熟悉的脸。

一位个子不高、肩膀很宽、有两撇胡子的男子汉站在门口，朝我望着。

我立刻认出他来了。尽管我一次也没见过他，可是我立刻认出他来了。

“哎呀，”我心想，“这不是我们的布琼尼大哥吗！你留着那两撇胡子够多神气……”

有两撇胡子的布琼尼本人走到我的床边，脱下他那顶布琼尼式的盔形帽，说道：

“你好！”

我稍微抬起点上半身，说：

“布琼尼同志……”我兴奋得都噎住了。“布琼尼同志！札瓦鲁辛同志的特种部队被敌人包围了。希库罗和马蒙托夫左右夹攻。不对。马蒙托夫从左边……左边是乌拉加依……对不起，右边是乌拉加依……”

我全忘了。我的脑子里乱成了一团糟。我说不

出话来了，又躺了下去。

记得布琼尼同志用一只手摸摸我的前额，说：

“发烧了。必须冷敷一下。”

这时候，我想起了一件事情，便使出九牛二虎的力气，又抬起上半身，说：

“布琼尼同志！请允许我把我的朋友瓦西利·谢苗内奇·翟科夫介绍给您认识。他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英雄。”

布琼尼笑了起来，说：

“你说的是哪一个英雄呀？”

“那一个，”我说，“就是半个脑袋上都缠着绷带的那个。您看，他正朝您笑哩。”

“是他呀。”布琼尼说。

他走到翟科夫的床跟前去。

他们究竟是怎样打的招呼，我可不记得了。说得更简单些，我根本没看见，因为我又睡着了。

两个星期以后，我出院了，又回到了部队。

后来冬天来了。新年前夕，我收到从莫斯科捎来的一份礼物——一枚红旗勋章。

干吗要给我勋章呢？——你们想想看……

表　附《文件》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字数 9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7\frac{1}{8}$　插页 2

197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79 年 8 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01－150,000

书号 10019·2763　定价 0.44 元

书　　号：10019・2763
定　　价：0.44　元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晨晨 OCR、校对

2008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五

09:26:07

观者二校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14:16:31

ljctt@263.net